Lingnan University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Theses & Dissertations

Department of Cultural Studies

7-2011

民粹主義與政治主體的生成：社民連的個案

Chak Sang PANG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s://commons.ln.edu.hk/cs_etd

Part of the [Political Theory Commons](#)

Recommended Citation

彭澤生 (2011)。民粹主義與政治主體的生成：社民連的個案 (碩士論文，香港嶺南大學)。檢自 http://dx.doi.org/10.14793/cs_etd.1

This Thesis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 Department of Cultural Studies at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in Theses & Dissertations by an authorized administrator of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Terms of Use

The copyright of this thesis is owned by its author. Any reproduction, adaptation, distribution or dissemination of this thesis without express authorization is strictly prohib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民粹主義與政治主體的生成

社民連的個案

彭澤生

哲學碩士

嶺南大學

二零一一年

民粹主義與政治主體的生成

社民連的個案

彭澤生

此論文為文化研究哲學碩士學位課程之部分要求

嶺南大學

二零一一年七月

論文撮要

民粹主義與政治主體的生成 社民連的個案

彭澤生

哲學碩士

拉克勞提出民粹主義是集體身份建構過程的理論：人們透過空洞能指扣連社會上的不同訴求，建立人民與權力的對立陣線，生成集體的身分認同。這與把社會上的群體（如階級）簡單地視為分析單位的經典馬克思主義分析方法及理性選擇論等不同。本研究以香港政團「社民連」為個案，分析民粹主義的操作。前設是把人們於社會中的位置及利益與其身分認同脫鉤，視身分認同為話語操作的結果。

本研究將使用這一框架，分析於大眾媒體與網上這兩個不同的公共的討論中，社民連被如何表述，令人們可把不同的訴求扣連到「社民連」這概念之上。本研究將指出，社民連雖然號稱基層黨，但「基層」一詞矛盾重重，社民連只有透過定位為與傳統政治秩序割裂而具多重意義的「激進派」，吸納傳統「泛民」未能吸納的政治能量，進而產生一些與傳統香港政治中泛民對建制的對立不同的新主體。於主流傳媒排斥這一新主體的背景下，人們不但透過互聯網互通消息，甚至以「網民」作為身分認同，與主流傳媒及政治秩序對抗。

關鍵詞：社民連、民粹主義、互聯網、主體、空洞能指。

聲明

本人謹此聲明，本論文為原創性之研究成果，所有已發表或未發表著作之用，均已適當註明出處。

(彭澤生)

二零一一年七月九日

目錄

鳴謝.....	iii
第一章 序言.....	1
1.1 研究動機與問題界定	1
1.2 現有的香港政治研究	5
1.3 身份、文化與政治	8
1.4 空洞能指、民粹	11
1.5 研究目的與重要性	12
1.6 本研究的結構	
第二章 了解民粹主義的理論進路.....	16
2.1 民粹主義作為動員大眾的政治修辭	17
2.2 民粹主義作為政治話語的建構過程	19
2.3 雙支柱模型	20
2.4 三邏輯模型	24
2.5 民粹主義作為政治邏輯	26
2.6 如何評價民粹主義？	28
第三章 互聯網與方法學.....	33
3.1 理論化互聯網	33
3.2 互聯網與多樣的公共	34
3.3 互聯網與書寫民粹主義	38
3.4 研究設計	39
第四章 社民連與基層——一個階級問題？.....	47
4.1 從階級分析到民粹主義	49
4.2 「基層」作為空洞能指	52
4.3 社民連的媒體表述：「基層黨」	53
4.4 新移民與民建聯——「基層」的含糊性	58
4.5 小結：「基層」作為民粹主義	62
第五章 制度危機、情感與「激進派」的生成.....	63
5.1 情感——建構他者與主體的必需元素	63
5.2 回歸後的政治格局、「溫和民主派」與「激進民主派」	65

5.3 政治危機下的話語操作	71
5.4 我們是「激進派」——「社民連」所承載的能量	73
5.5 激進的重要性	84
5.6 小結	88
第六章 網民與另類公共.....	90
6.1 另類公共作為被排斥者的空間	90
6.2 當主流媒體喪失信譽，人們在網上相遇	98
6.3 「網民」與社民連的支持者：身分互換與合流	102
6.4 小結	106
第七章 總結：主體的故事.....	107
7.1 回顧：民粹主義與主體	107
7.2 超越道德譴責的分析	113
附件一：2010年1月28日《AM730》廣告.....	119
附件二：2010年6月22日《AM730》廣告一.....	120
附件三：2010年6月22日《AM730》廣告二.....	121
參考書目.....	122
中文參考書目	122
英文參考書目	124

鳴謝

本研究得以完成，有賴我的論文導師羅永生的指導及意見，我在此表示感謝。文化研究系的導師、職員與同學營造了愉快而認真的學習環境，讓我能重拾學習的興趣，他們是一群了不起的人。我要特別多謝許寶強、陳清僑、陳錦榮、劉健芝、游靜、李小良、梁旭明、陳順馨及葉蔭聰於本研究的不同階段給我有用的建議，讓我完善本研究。And I would like to thank Prof. Morris for her advice when I was facing my most difficult choice in my life。我還要多謝系辦公室的徐惠璇、麥淑儀、文珊珊、袁嘉欣、陳偉文、盧德文及吳少馨為我解決修學其間遇到的各式困難。

我也要多謝我的家人及我的未婚妻，需知這年頭修讀研究生會導致家人反目、情侶分手，幸而我身邊的人對我十分支持，我的未婚妻葉俊淪小姐更為我提供了一些有用的建議，我對此十分感激。

我也要感謝我曾訪問過的朋友，雖然這些訪問沒有成為本研究的一部分，但這些訪談是有啟發性的。最後我要多謝謝雅妍小姐為我進行校對，令本文的文字更精煉。

第一章 序言

1.1 研究動機與問題界定

「社會民主連線由不同界別人士包括議員、社運人士、基層市民等組成。我們是旗幟鮮明的反對派，堅決反對官商勾結造成貧富不均。我們將以社會民主主義為行動目標，完善香港社會。我們認為，只有透過公平的財富再分配，政府積極調節失衡的市場，以及建立公眾可直接參與的民主制度，才可創造一個符合公義的社會。」

《關於社民連》

以上是社會民主連線在官方網頁的自我介紹。於二〇〇六年十月一日創黨的社民連於創黨時就旗幟鮮明的以左派¹及旗幟鮮明的反對派自居，社民連的創黨主席黃毓民於2006年的七一遊行中的演講以左派為建制的對立面，自我定位為左派。這裡的建制所指的不只傳統政治話語的「泛民」／「建制」對立的建制，於上述的演說中，屬於泛民的民主黨及公民黨被指為「中間偏右」，其中一個原因是他們與資本主義的關係。於演講中，黃毓民引用了馬克思抨擊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聲言社民連是社會主義中的溫和派，主張改革，而非革命，維護工人及基層的利益。這於香港是一個不尋常的政治定位，第一，是因為於香港的政治話語中，左派向來所指的都是與中國共產黨關係密切的政黨及團體，如民建聯、工聯會等，社民連把左派的定義「顛倒」（黃毓民語）過來，

---

¹ 《點解你要支持社會民主連線》
(<http://www.youtube.com/watch?v=buayaBSUrW8>) ,accessed on 27/7/2010

作其道德高地，這為當時的政治語景帶來很大的轉變（這於二〇〇七年的區選論壇鬧出了梁安琪質問社民連的陶君行到底是泛民還是左派的笑話），另一方面，於過度期的香港政治話語中，擁抱香港資本主義的「五十年不變」是香港人害怕回歸後政治急速轉變的反應（呂大樂 2002），黃毓民卻反其道而行，引用馬克思抨擊香港的資本主義。他這些一反香港政治話語的表述卻沒有令他成為不受歡迎的政治人物，反之，於 2008 年的選舉中，他以第二得票率多的九龍西選區候選人的姿態進入立法會。

除自我定位為左翼政黨外，社民連的抗爭路線也是其特色之一，創黨之時已是立法會議員的梁國雄及陳偉業於議會內外的抗爭已有一定知名度，梁國雄更曾因於一九九九年犯下「藐視立法會」而入獄（梁國雄當時不是立法會議員）。而社民連的網頁的當眼處有著「沒有抗爭 哪有改變」的口號。社民連的抗爭路線一方面受到不少社會人士，特別是建制派議員、特首及傳媒的非議，同時不少社民連的支持者卻對此抱正面態度。

於二零零八年的立法會選舉中，社會民主連線於五區的地方直選中贏得三席，然而，相對於社民連於選舉中全港平均得到 10.1%（蔡子強 2008b）的支持率，社民連的一眾參選名單於互聯網上所獲得的支持度更見觸目。

由 uwants 及香港討論區所舉辦的立法會選舉網上民意調查中，五張社會民主連線（社民連）的名單都獲得的相當高的得票率，甚至比真實選舉高²。而社

---

² 於該選舉中香港島的曾建成有 12.94%，九龍西的黃毓民名單有 34.52%，九龍東的陶君行有

民連主席黃毓民於選舉論壇中叱喝民主建港聯盟（民建聯）候選人的一段影片被瘋傳³，梁國雄於選舉後揶揄民建聯的影片於影片分享網站 youtube 中有超過十萬的點擊率⁴，而留言回覆多為支持社民連的候選人。但是為什麼社民連於多個包括 youtube 及多個本地討論區在內的互聯網平台中獲得相當的支持（至少看來如是），暫時未有定論。

和互聯網上的高支持度相反，坊間有不少人對社民連作負面評論，其中不少論者指社民連的成功意味民粹政治的興起，這尤見於一些對社民連有三人進入立法會感到不安的評論（余柏全 2008；《明報》 2008-9-10），這些評論的民粹多指福利主義及激進，余柏全（2008）提出了一種簡單的經濟決定論，他指因低下階層生活困苦，所以支持社民連；但蔡子強分析票站數據後指，社民連於這次選舉的成功雖部份源於香港貧富懸殊惡化、階級矛盾加劇等經濟因素，但這不意味社民連的左翼路線只受低下階層歡迎，事實上這一路線在中、上階層一樣有市場（蔡子強 2008a）；另一種分析的面向是青年論，有論者認為社民連的成功是由於青年對建制的不滿（陳光輝 2008；蔡子強 2008a）；與簡單的訴諸反叛不同，有評論人以具體的歷史分析指出社民連的成功源自社民連切實的與青年人或網民站到同一立場（林輝 2008；馬嶽 2008）；第三種分析面向是抗爭論，有論者指社民連的成功是由於不少人認為香港需要抗爭來改變，而非人們支持社民連的政治理念（奕民 2008）；與只看重「抗爭」，不看理念的抗爭論不同，的另一個版本的抗爭論更重視的是

25.02%，新界西名單的陳偉業得 13.71%，新界東的梁國雄有 34.64%。

³ <http://www.youtube.com/watch?v=tWH37Z-ewGQ>

⁴ <http://www.youtube.com/watch?v=JSWxumRxmbg>

社民連的政治論述，馬嶽指不少人認同社民連一套以組織群眾抗爭，反抗政制不民主和官商勾結的，以改善社會基層困苦、貧富懸殊的左翼政治論述（馬嶽 2008）。馬嶽的解釋的確有效地切中了社民連如何建構其政治論述，以這為起點，我們可以進一步去思考一個問題：為什麼社民連這一立足於基層的政治論述會得到不同階層的人的支持？

本研究希望把分析問題的重心放在互聯網上。互聯網於研究社民連的高支持度的重要性，除了社民連於網上有高支持度外（馬嶽(2008)稱之為「網上最受歡迎政黨」），更在於互聯網容許於傳統媒體不具生產力的人發聲的特色，形成另類的公共領域，產生新的政治話語。政治話語所生產的意義對於個人決定支持或不支持什麼政黨起了關鍵作用（Ross 1997, Laclau 2005a），而互聯網的高互動性使少數的話語更易被觀察，如欲透過政治話語的流通了解社民連的高支持度，注意互聯網上的話語生成過程比單單分析大眾媒體的政治話語更有效。

本研究雖然以互聯網為起點，但並不會只著眼於互聯網的話語，根據過往經驗，大眾媒體往往為互聯網的話語提供大量的資源，因此大眾媒體的話語也是我的研究範圍。

本研究並非旨在研究為什麼社民連於互聯網的支持度比其他媒體的高。探討人們於互聯網上表述社民連的意義生產過程，它又是如何促成社民連的興起呢？才是本文的要旨。

爲了解答以上問題，我劃分了兩個副問題：

- 1． 社民連的支持者把什麼訴求和希望投射到他們對社民連的支持當中？
- 2． 對社民連的支持生成了什麼主體？

1.2 現有的香港政治研究

香港政治研究的一個主要課題是民主政治的發展不足（Ma 2007），其中一個進路爲政治「文化理論」，這一進路過度簡化地視香港的文化爲儒家化爲主軸，並以此爲基礎分析爲什麼香港的民主發展爲何停滯不前。其中亨廷頓（Huntington 1991）及白魯恂（Pye 1985）都認爲香港傳統的儒家文化強調和諧而非競爭及衝突，強調權威而非個人權利，因此不利香港的民主發展。

文化理論中，不少後來的政治研究都會提及劉兆佳的功利家庭主義（Lau 1984），他的分析揉合了家庭本位思想及香港低度綜合的社會政治系統的特質，指香港華人強調家庭價值多於社會價值，他們多動員家庭網絡而非通過政治參與去解決他們的困難，令香港人甚少參與政治。這一進路後來受到對香港人政治態度研究的挑戰。劉兆佳本人與關信基合作的研究（Lau & Kuan 2002）指於一些範疇上，香港人的態度比民主的台灣更開明或更「現代」。這結果顯示七、八十年代的「文化理論」對了解香港人的政治態度已無甚大作用。我們該如何填補理論失效所帶來的空間？

也許最直接的做法是研究時下的文化，以更新文化論，但我們必須面對一個理論及方法學上的問題：文化可被實證及量化地被研究嗎？谷淑美（1999）指劉

氏的研究方式把文化視為一致而穩定的，而漠視了文化中的衝突。香港政治研究傳統中的另一個進路：階級理論，亦有這一問題。

另一個香港政治研究的進路是階級理論，始於七、八十年代的階級分析論爭其中一個論爭的重點是當時興起的中產階級會如何影響香港政治。揉合馬克思及韋伯的階級理論，呂大樂於《中產階級在想些什麼？》（1998a）中指出，於過渡期，中產階級是一種重要的社會力量，作為社會力量，它的特色是優柔寡斷，缺乏勇氣，沒有作為，對於中方就回歸後的政治建構安排所設的限制，均無法下定決心反抗，只是就眼前所得而作出妥協。

在香港的政治脈絡中，強調中產階級意味什麼呢？中產階級一方面是具體的階級，另一方面是指一套以中產階級代表的意識形態：一種強調社會開放、機會平等的意識形態，儘管這一意識形態承認資本主義經濟制度有其不平等的地方，但總的來說還是可接受的競爭性制度。這套意識形態於香港具普及性，受到其他階級的認同，於九七問題的衝擊下，這意識形態受到了挑戰，中產的焦慮也代表了市民大眾的不安。面對這衝擊，中產階級沒有站起來，反而是自認看透世情，「講多無謂」，犬儒的中產性格令中產搖擺不定，為保全眼前的利益而妥協，無力成為民主化議題上的有力參與者。

呂大樂的批判，固然能指出為什麼中產於香港政治中成為了一股保守的力量，但呂大樂的分析卻沒有清楚指明何謂中產階級。《香港新中階級的特色與前路——與張炳良先生商榷》一文中更指出中產階級的界線難以劃分，而其內部也可

分化，階級不一定會帶來集體行動，形成有內部凝聚條件的社群。要了解社群的形成首先要了解當前的文化（或意識形態）及階級內成員的社會背景。在其《階級分析與香港》（1998b）的最後一章有這樣的延伸：

「...關於在文化、生活方式、社區的組成的方面去看階級構成。明顯地，這裡要問的並不限於一個意識層次的問題。而是從整體歷史環境下的階級狀況來看階級行動的構成與表現。我們認為重要的問題，包括了在特定歷史、社會及政治環境裡，階級利益利的集結及階級社群的形式、階級與性別、種族之互動、階級文化與生活方式（社交網絡社群活動、志願組織、普及文化、鄉族連繫、論述系統、身份認同、行為取向）的建構等。」

這樣，我們必須問的是：階級是一個怎樣的問題？從呂大樂的論述中，我們大概可見到階級構成（class formation）不是源自一群人在生產關係中的位置，文化有著重要作用。或用馬克思的話，即一群於生產關係中的人只是自在階級（class in itself），是不會成為推動歷史的力量，只有他們意識到自己的階級的共同命運，他們才可過渡成自為階級（class for itself）。呂大樂於書中並沒有分析這個過渡。

當我們審視這些研究進路時，會發現從劉兆佳到呂大樂的研究皆未能就階級的構成提出滿意的解釋，它們主要依賴實證主義（positivism）的社會科學，以實證化的形式定義階級（Wong & Lui, 1993）並以去脈絡化的形式及問題調查受訪者的行動（Lau 1984）。這種去脈化的問卷調查把文化抽空成處境式的變

項，然後得出大多數被訪者籠統的傾向，並視之為香港社會具主導性的文化。谷淑美指出，文化不是單一的，亦不能以去脈絡化的形式調查，這樣的研究往往會令我們錯過具體歷史情景中各種力量的互動與身分認同背後的多元意義（谷淑美 1999）。黃偉邦與呂大樂本人也曾指出這一點：於一些範疇，這種去脈絡化的社會科學研究是顯得力有不逮，黃偉邦與呂大樂於（1993）對香港人的道德觀展開研究時就指出社會科學—特別是量性的進路—往往無法了解個人的內在世界。因此，當我們思考意義及身份認同的生成時，我們不可依賴社會角色及社會類屬等抽象概念（abstractions）去探究人們如何理解社會（Luke 1985, in Wong & Lui, 1993），更遑論社民連的興起是一個跨階級的現象。

1.3 身份、文化與政治

雖然呂大樂於《階級分析與香港》（1998b）的最後一章提到我們必需從「文化、生活方式、社區的組成的方面去看階級構成」，但他於這一合輯中尚未從這一角度切入階級的生成。以「文化、生活方式、社區的組成的方面去看階級構成」與文化研究的議程有一定的相合之處，文化研究的其中一個重要議題是對馬克思主義的經濟決定論的不滿，馬克思主義認為無產階級最終會因生產關係中的不平等而與資產階級對抗，但這預言沒有發生。

香港的文化研究學者由語言及論述系統入手，展開了香港政治文化的研究。文化研究來說，文化不是一個穩定而一致的體系，文化研究視文化為一系列表述實踐的競爭及衝突的場所，文化中有著多樣及異質的邊界。於文化中，多元權

力與特權之間，不同歷史、語言、經驗及聲音會攙雜起來（Couldry 2000）。因此我們該著眼香港的文化中多元的聲音及多樣化的衝突。自七十年代以來，一個具主導性的論述是以對立於社會主義中國的殖民地「本土」作為認同（葉蔭聰 1997），「香港人」的身份透過排左恐共來完成，做就了對階級矛盾論述的壓抑（孔誥峰 1997）。與此並行不悖的是城鄉對比，以鄉作為過去的他者，成功的城市作為自身的認同，淡化自身的殖民地角色，並為作為城市管理的行政獨裁與以正當化（羅永生 2007）。乃至 90 年代由彭定康主導的政制改革雖然帶來了公開和立法自主權的精神（Ku 1999），民主不過是以恐共為基礎，而非建立在「一套獨立、富創意、多元化，經過不斷探索的民主綱領上、政府和政黨就有關人權和民主的理解一直只停留在爭取若干直選選席的鬥爭中」（谷淑美 1999）。

論述對香港政治有極大影響。今天「民主」與「中共」及其代理人「建制派」的對立幾乎是香港人的常識。社民連的定位卻是民主派中的左翼，有時，社民連會舉起階級的大旗，有時卻以民主派的身份攻擊其他民主派政黨，可見於十多年後的今天，香港的政治脈絡起了變化。本土／中國、民主／中共、城／鄉的對立已不足以解釋社民連的成功。

因此我們必先回到這些研究的理論根源，再看它們如何幫助我們理解今天的香港。文化研究及好一些後馬克思主義者的問題是在多大程度上，政治及經濟是由文化形成（Valentine 2006）。文化研究抗拒把身分認同視為一個人的社會位置的必然結果，反之，話語的操作於身分認同的生成中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荷爾把集體身分的生成視為利益扣連的結果，荷爾（Hall 1987）於七十年代解釋「搶劫」(mugging)一詞如何被用於政治討論中時，分析戴卓爾夫人

（Thatcher）為何佔有統治地位達十數年及闡明了資本主義的轉變。荷爾指出政治中的工人階級及資產階級並沒有實證地出現，反之，現實的政治分類往往以「人民」對「權力集團」的對立出現。但所謂的「人民」並不是穩固的社會群體，其所指要視乎什麼的主體呼召占優勢。這優勢取決於意識形態之爭，意識形態如何與階級的利益扣連，並把該階級扣連到「人民」，呼召其「人民」主體，並形成統識。

這理論製造了「人民」作為一個開放的類別以被演繹的可能性，並解釋了戴卓爾夫人如何呼召「人民」的主體性，於政治上擊敗英國的左派。這一理論最小的分析單位是社會群體，這些群體會思考他們自身的利益，當戴卓爾夫人的保守黨把這些群體的利益扣連到保守黨的政治議程時，這些群體會受呼召成一種特定的「人民」主體。斯巴克斯（Sparks 1992）指荷爾的理論的主要問題在於他把社會群體視為先於主體的存在，一方面，荷爾借用馬克思及阿爾圖塞的理論指出，主體呼召是取決於社會群體主體理性的考量，那社會群體本身如何意識到自己是一個社會群體？荷爾早年的理論未能為此提供答案。荷爾的人民理論中，構成「人民」的基本組成部分是社會群體，但荷爾的理論卻沒有更進一步檢視這些群體是如何生成一個集體認同，使理論重蹈階級理論的覆轍：視一群人在社會上的位置相等於其身分認同。因此，我們需要一個能把社會位置與身分認同脫鉤的理論。這樣的理論讓我們避免把身分認同視為社會位置的直接

結果，把話語到身分生成的核心，真正地讓文化研究脫離簡單的經濟決定論。

1.4 空洞能指、民粹

拉克勞（Ernesto Laclau）把身分認同的形成視為話語操作的結果，取源自符號學的概念「能指」（signifier）及「所指」（signified）。他用空洞能指（empty signifier）這一概念分析政治身份認同的形成。空洞能指即是沒有所指的能指（Laclau 1996），空洞能指只有透過對立（antagonism），指出自己不是什麼才能產生意義。克拉勞引用羅莎盧森堡（Rosa Luxemburg）指出階級團結往往不是單純的政治或經濟鬥爭的結果，而是各式各樣局部動員的累積，政治鬥爭中往往充滿了矛盾的運動，這些不同的局部動員的矛盾只有透過空洞能指來建立他們之間的統一性，這統一性沒有實質的內容，甚至完整而實質的內容是不可能存在的，克拉勞稱之為統識關係（hegemonic relation），這理論把統識的生產理解為空洞能指的操作。於 2005 年的 *On Populist Reason* 中，克拉勞進一步發展這討論，重新界定民粹主義，指民粹主義並不是指任何特殊的意識型態主張或政策規劃，而是結連不同社會需求的邏輯（Laclau, 2005a）。這一邏輯把不同的訴求（demand）扣連起來，形成集體身分。這一理論視訴求為社會分析的最小單位，而非如荷爾般把社會群體視為最小單位，令拉克勞的理論使其從最根本的層面分析集體身分的形成。簡單來說，拉克勞的民粹主義：「第一是形成一個內部的對立戰線，把「人民」（people）與掌權者（power）分開並對立起來；第二是把「人民」的紛雜多樣需求，扣連成一種共同需求（common demand）；最後是鞏固這民粹需求，成為一個穩定的意義系統（system of

signification)。由於「人民」本身極為多元紛雜，不同的具體訴求難以統一，因此意義含混的空洞能指(empty signifier)...統合地表述『人民』特定而具體的、千差萬別的訴求」（Laclau, 2005a; 許寶強 2007）。

以此為基礎，我可作出以下假說：

社民連的成功是因為它成功地建立對立戰線，把「人民」(people)與掌權者(power)分開並對立起來；第二是把「人民」的紛雜多樣需求扣連成一種共同的需求(common demand)；最後是鞏固這民粹需求，成為一個穩定的意義系統。並以意義含混的空洞能指統合地表述「人民」特定而具體的、千差萬別的訴求

這假說一方面指出社民連的支持者有著多樣的需求，我可借用蔡子強的研究（2008）作為一個簡單的證據：社民連的支持是跨階層（級）的，而社民連的政治論述或有關社民連的政治論述包含了可統合支持者多樣化的訴求的空洞能指，並建立起一個對立的掌權者。於往後的章節我會指出，「草根」、「左派」及「抗爭」是相當有力的空洞能指能統合不少的需求，並於支持者的意義系統中佔重要的位置。

1.5 研究目的與重要性

根據上文，我們大概可預計社民的興起背後有著香港的政治話語的轉變的背

景，而社民連也參與到這個新話語的生成過程中。香港人正尋求改變及其本身正改變，這研究與其說是一個有關社民連的研究，倒不如說是一個透過社民連，折射香港政治的研究，我們大概可預計社民的興起有着香港政治話語轉變的背景：是什麼力量驅使香港人尋求改變？而它們又是如何統合起來？本研究的最終目的不是解釋社民連的成功。我希望在這研究展示的是：社民連對香港政治話語的衝擊及社民連的民粹主義開啓了什麼政治的行動及話語的空間，例如它打破了香港民主派長年不攻擊本地資本家的傳統（Pepper 2008），並把傳統民主派與左派的對立顛倒過來，以泛民一份子的身自號左派，長遠來說，社民連開始了一些更具持續性的社會行動的可能，如維園行動及一些調侃官員的行動。

我會借用克拉勞的理論框架，他指民粹主義是政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是扣連不同訴求以生產政治身份認同的邏輯。以此為基礎，本研究將探究社民連生成了什麼政治主體。雖然本研究以「民粹主義」的框架審視社民連的成功，但並不意味本研究如一些本地評論家一般指責社民連「民粹」。長久以來，民粹主義被視作對理性社群的威脅，但「民粹主義」一詞意義鬆散，它未必有一個意義一致的所指，一套具體的內容（Laclau 2005a）。本研究的第二章將回顧一系列有關民粹主義的討論，以進一步說清本研究的「民粹主義」所指為何。

雖然社民連只是一個人數與支持者不多的政黨，但我相信了解社民連與其支持者是重要的，一方面這是一個全新現象，就社民連的成功我們所知其實不多。對互聯網影響政治的理解，也不見得比前者的多。另一方面自 2010 年初起，

反高鐵、五區公投等一系列的群眾運動象徵了新一波群眾運動的來臨，而社民連和這一系列的運動也有著或多或少的關係，了解它如何透過互聯網動員群眾，有助我們思考香港群眾運動的未來。

1.6 本研究的結構

至此，我尚未言明指社民連為「民粹」於本研究有什麼意義，因此在第二章，我會就有關民粹主義的理論展開仔細的討論。與不少現代政治理論不同，我不會視民粹為自由民主制的對立，反之，它們的關係有著更多的可能性，當我們進入克拉勞及穆芙關於對立（*antagonism*）的討論時，我們會發現民粹可與民主共融。

第三章，將就互聯網的研究展開討論，以釐清方法學的問題。互聯網在香港政治佔有獨特的位置，這是回歸後香港媒體受到中共的壓力所致，另一方面，媒體的政治廣告受法例嚴厲監管，互聯網成了政黨爭奪的空間，而它也成了支持社民連話語的重要生成空間，其中網台與討論區是十分重要的平台。但這並不意味傳統媒體於社民連的興起是不重要的，我將指出因為互聯網不是獨立的空間，它與「線下」的世界的關係密切，因此本研究不會局限於線上的文本，更會檢視互聯網與大眾傳媒的關係。從以帶出互聯網於社民連興起的作用。稍後我將會交代研究方法。

第四章會是實證研究的開端，這一部份，我將回應把社民連的興起歸因於階級

政治的說法。雖然社民連自號為「基層黨」，但「基層」一詞所指多元，而且包含了多元而互相衝突的訴求，我們不可以實證化的方式理解基層。我會借用拉克勞的理論，說明「基層」不是一個實證的存在，而是一個統合不同訴求的空洞能指。因此「基層」政治不是一種階層政治，而是民粹政治。

第五章會分析社民連的政治論述中，另一重要的部分。社民連自詡激進，並以此為綱，展開了一系列的政治行動。但社民連的支持者甚至社民連本身都不太能說出行動如何打破政治困局，因此理性選擇不足以幫助我們理解社民連支持者為何支持社民連。透過引入對情感（affect）的分析，本研究將指出這些行動能吸納民主派過往未能滿足的訴求，於人民主體的生成中起著關鍵的作用。

第六章會進一步把拉克勞的理論複雜化，即主體生成是一個不斷發生的過程。本地媒體與社民連的互動令不少社民連的支持者對一些本地媒體不滿，而這些不滿會於互聯網上與其他訴求結合，產生新的主體。

第七章是本研究的總結，我會為本研究作一個簡要的總結，並說明社民連的民粹主義並不是與民主對立，它所產生的政治主體開啓了香港政治實踐的可能性。

第二章 了解民粹主義的理論進路

於第一章我指出民粹主義的解釋多樣化。有時甚至是互相衝突，民粹主義是一個易於令人誤解的詞語，在香港的政治脈絡中，它往往用以指責訴諸情緒、

「社會主義」的、「福利主義」的政治，不少評論人都以「民粹」評價社民連⁵⁶，如余柏全於《大公報》的文章說「在未來四年，社民連將以民粹代言人的身份出現，福利肯定會成為他們的重要武器，但是若香港發展為過度的福利社會，公平與效率不能取得平衡，香港競爭力便大減，投資者卻步，經濟發展放慢，改善民生亦成泡影，實在非香港之福。」（余柏全 2008）然而，這些評論只是簡單地把社民連和福利主義、激進等於香港「政治不正確」的詞彙連繫起來，而沒有說明民粹主義的所指為何。

上述說法，除了有利於抹黑個別政黨外，對了解民粹主義沒甚作用，事實上好些時候「民粹主義」一詞的主要作用就是抹黑一個政黨的政治人物，它本身就沒有實質的內容，因此往往有「民粹主義」語焉不詳的情況。儘管如此，也有不少人為了解其概念，嘗試為民粹立下定義。

我將於本節回顧一些有關民粹主義的討論，以釐清民粹主義這個概念，及這一概念如何幫助我們了解社民連的興起。之後，我會就如何評價民粹主義而展開討論。於這討論中當中，我會指出民粹主義不一定危害民主，民粹主義與民主的關係是多元的。因此當我指社民連有賴於民粹主義而興起，這不表示我對社

---

⁵ 〈激進現象：疑慮不在議題 關鍵視乎手法〉，《明報》，港聞／A03 11/9/2008

⁶ 余柏全（2008）〈自由黨社民連何去何從〉，《大公報》，大公社評／A18 17/9/2008

民連抱負面態度。我們必須了解民粹主義才能深入了解社民連興起背後的動力和影響。

2.1 民粹主義作為動員大眾的政治修辭

了解民粹主義，首先要明白的問題是它本身不是一個清晰的概念。馬佐雷尼（Mazzoleni）對民粹主義的分析指出，「民粹主義」一詞所指含糊不清，傳媒及學者多用此指一些以「人民」為吸引對象，嘗試網羅不同群體的政治或政黨（Mazzoleni 2003），阿布斯及呂門士（Abts and Rummens）就民粹主義的概念化的路徑分為兩類（Abts and Rummens 2007），第一種路徑把民粹主義理解為以獨特的政治修詞作為政治動員的策略（Betz, 2002; Betz and Johnson, 2004; Canovan, 1999; Kazin, 1995）；第二種則視之為政治話語的建構過程。

第一種路徑把民粹主義理解為以獨特的政治修詞作為政治動員的策略，民粹政黨及領袖透過訴諸大眾權力，挑戰現行的政治體制。卡諾芬（Canovan）（1999）的理論是這一路徑的例子。她指民粹主義的定義應以「訴諸『人民』，反抗具支配性的價值及思想」為中心，民粹主義於不同的社會中有不同的政治議題，而共通元素則是反對精英及具支配性的價值觀，強調「民有」（of people）而非由系統擁有（of system），並以「人民」之名反對建制、精英價值及媒體及學院中的輿論製造者（opinion former），反對個別界別的利益。民粹話語對「人民」的建構有三種特色，第一是訴諸「聯合的人民」（united people），反對黨派鬥爭，透過強大的領袖統合「人民」，甚至透過領袖的魅

力，把不熱中政治的人帶入政治的領域中；第二是強調「我們的人民」（our people），以排斥他者建立「人民」的身份，第三是「一般人」（ordinary people），民粹主義強調他們為一般人，特別是讓「沉默的大多數」發聲。綜合上述話語，民粹主義的修辭有著簡單直接的特色，以迴避精英及政治家的複雜術語，並企圖為各種問題提出簡單的解決方法。

這路徑的另一例子有貝茲及莊臣（Betz & Johnson 2004），他們指出自八十年代起，歐美的激進右翼民粹政黨開始於歐美的資本主義自由民主的政黨政治中佔一席位。在分析他們的壯大時，貝茲及莊臣發現近年激進右翼民粹政黨發展了一套反自由但和民主⁷原則相容的意識形態。它反精英並訴諸常人的「常識」。

貝茲及莊臣引用卡靜（Kazin 1995）指民粹主義是一種政治修辭的風格，目的是動員一般人對抗具支配性的理念及價值，透過建構他們對權力的不滿，激起其對社會不義的憤怒。並以渴求激進改變的形式呈現出來。於資本主義自由民主的政黨政治中，右翼民粹政黨指責只為自己服務的政治及文化精英追求自己狹隘的個別議題，而不在意一般人民的利益，並指這造成了民主政制的倒退，代議政制也只是一場把戲，令選民誤以為自己的選票是有份量。但結果這只是把一般人的聲音拒諸門外，因此右翼民粹政黨把自己塑造成拒絕服從的人，並對政制的慣例置之不理。同時這些政黨強調訴諸常識，並指出這些常識已被政

---

⁷ 「民主」具多重意義，原自希臘語「demo」（人民）及「kratos」（力量）作為一項原則指的是主權在民（popular sovereignty），即國家該由人民統治，作為一種制度，它最簡約的定義是普選的實行（Huntington 1991），本章所說的民主，除非另有說明，否則是指「主權在民」的原則。

治精英拒諸於政治機制的門外。透過操作這些修辭，右翼民粹政黨指出現行的政治建構是不民主，並要求恢復真正的民主。

這一路徑的例子尚有賽林格森（Seligson）、塔格特（Taggart）及塔基（Tarchi）。賽林格森指民粹領袖強調自己「聆聽人民」，並把「拒絕者」排除出「人民」（作為一個想像的共同體（Anderson, 1991））以外（Seligson 2007）。塔格特與塔基則理解民粹主義為一種溝通的風格。是魅力領袖自詡為為人民說話的領袖及人民意志的化身，以進行政治動員。（Taggart, 2000; Tarchi, 2002）。

上述的路徑指出了民粹主義作為訴諸大眾的修詞特質，與此同時，道出了民粹主義需要透過建構「人民」來完成。但本研究認為政治動員及領袖僅是民粹主義背後的意識形態的徵狀及表達，這些可構成一些行動框架（Snow et al., 1986），但民粹主義不可還原為行動框架，反之，阿布斯及呂門士（2007）指出相對強調動員或領袖的路徑，民粹主義背後的意識形態才是民粹主義的中心。

2.2 民粹主義作為政治話語的建構過程

第二種理解民粹主義的路徑把民粹主義理解為政治話語的建構過程。和強調動員或領袖的重要性來了解民粹主義的路徑不同，這一對民粹主義的理解它為稀薄的意識形態（thin-centered ideology）（Freeden, 1998, Canovan 2002），它並不

是一套全面的政治話語，而是透過建構「人民」及其對立的「敵人」，就一套政治話語中的幾個重要概念生產意義（Laclau, 2005），以建構「人民」成爲一個同質的共同體（Canovan, 1999; Taggart, 2000），這意識形態有三個特點。

第一個特點是，民粹主義圍繞著「人民」及「精英」之間的對立關係，指控精英腐敗及未能爲人民負責，異化於一般人的利益、價值觀及意見(Schedler 1996)。

第二個特點是，是民粹主義企圖把權力歸還人民，以回復主權在民（Popular Sovereignty）。民粹主義者相信民主是人民普遍意志的即時表現，民粹意識形態喜歡直接民主的形式，如公投，讓人民的聲音看來似可被當權者直接聽見，而不需要進一步的討論及政黨政治。

第三個特點是，民粹主義視「人民」爲一個單一的整體(Canovan 1999; Taggart 2000)，人民是聯合及不可分化、完成的、具自我意識的及大多數人能認同的，因此人民的聲音是可被直接聽見的。但是民粹主義只指出人民是同質的群體，而沒有指出這同質群體的實質身份認同，因此所有現實中的民粹運動都需要附加的價值或信念來爲這個聯合體加上內容，如左派的階級分析或右派的民族主義。必須同一性也意味著民粹主義會帶來「人民」及異於同一性的人之間的對立，那可能是文化及經濟精英、外國人、少數族裔等。

2.3 雙支柱模型

包括阿布斯、呂門士及卡諾芬等學者對民粹主義的關心者集中於民粹主義與自由民主制之間的關係。於政治理論的範疇中，民粹主義多被視為一種危害自由民主制度的病態，或是社會問題的病徵，卡諾芬卻認為民粹主義不會危害民主（Panizza & Miorelli 2009），兩者是如影隨形的（Canovan 1999），這也就是「雙支柱模型」(two stand model)，這模式把自由民主制理解為自由及民主這兩條支柱的矛盾結合，前者強調個人權利及法治，後者則強調參與及人民的主權(Mouffe, 2000)，而民粹主義則和後者相連。

卡諾芬（1999）指，在西方民主社會，民粹主義的專業是兌現民主給予人民力量的承諾，因此，民粹主義往往指向直接民主，以求為建制排斥的人帶來力量。西方民主國家就民粹主義的討論一直視其為病態，只有少數的政治理論家注意民粹主義的討論。

卡諾芬提出了「民粹是否民主？」這問題。雖然民粹主義強調直接民主，但有不少論者指出，現代的民主所指的是自由民主制度，民粹主義則是反自由的，但民粹並不是單純的反民主，自由民主主義強調言論自由及法治，這會為民主加上限制，同時民粹強調直接民主，往往帶來多數人暴政的危險，因此民主的運行需要自由民主主義和民粹兩者的對立或張力。另一個民主和民粹的關係論述則指民主的實踐有理想及現實的分歧，理想的民主制度和民粹的理想相近，但民主不可能達到其理想狀態。卡諾芬另辟蹊徑，把民粹主義視為我們對民主理解的挑戰。她指出，民粹主義對草根階層具吸引力，不單是因為社會的不公

製造了民粹滋長的土壤，也是因為民主本身具有拯救性（redemptive）及實用性的（pragmatic）兩面。於這基礎之上卡諾芬進一步分析民主的複雜性，指民主具有拯救性及實用性的，兩者是密不可分。

民主的實用性可體會於民主本身是一個不以武力解決紛爭的制度，體現和平、穩定和溫和等價值，這涉及制度的建立及踐行，於現代政治中，這令政治建制更可靠，把更多的利益團體及個人帶進政治制度中。另一方面，民主的拯救性強調對更美好世界的承諾，以換取人民的授權。只具實用性而不具拯救性的民主往往會帶來腐敗，如只有實用性的選舉，卻沒有對美好世界的期望，往往是換湯不換藥，甚至破壞民主的正當性。

民主的拯救性指向人民作為權力的來源，當權者有責任救助人民，但面對實用性時，往往未能兌現拯救性的許諾。這一方面人民未必有一致的利益，另一方面，政府未必能全面控制國家的情況，如經濟情況。民主的拯救性許諾和現實效益的差距，令其成為可被民粹攻擊的目標。然而，卡諾芬指出，民主不一定不敵現實，如果人民能加強他們的參與，而非專注於個人事務，具拯救性的信念往往可令一個國家實踐「不現實」的目標。

第三種關於拯救性及實用性的張力，可體會於民主制度及其不可避免的異化。民主的正當性會被體現於國家是我們的國家，而這國家非異化於我們。為了令民主能好好運行，我們需要令國家運作有效及持續的建制，但建制往往阻礙人民的發聲及行動，造成拯救性及實用性之間的張力，或馬克思所講的異化。

拯救性及實用性的張力會刺激民粹主義的興起，但民粹主義並不是這張力的唯一結果，另一個可能的結果是基進民主理論，於卡諾芬的分類中，前者訴願情緒及粗野的常識，後者則以理性的慎思明辯為核心，不少基進民主理論家認為慎思明辯所產生的力量能抵抗民粹主義，但他們往往對賦權於現在的「人民」感到猶豫，他們只能期望人民受啟蒙後可參加慎思明辯的過程。另一種受後馬克思及後現代理論家歡迎的做法是於檢視民主時脫去其拯救性的部分，卡諾芬指這是沒有基礎的民主，僅視之為一個開放的政治過程，我們對這種民主不應寄予厚望。她認為民主的踐行不應排除其拯救性，縱使這會造成民粹政治的危險，我們仍需接受兩者如影隨形的關係。

阿爾迪蒂（Arditi 2004）對於卡諾芬的分析作提出了新的理解，並把卡諾芬與拉克勞的民粹理論對讀，指出兩者有互補之處，阿爾迪蒂引用卡諾芬指民粹政治與新社會運動一樣，具反系統的特徵，反政治及經濟建制、反學院及媒體中 opinion-formers 的精英價值，其二民粹領袖以簡單直接的修辭表達簡單直接的政治方案。最後，一些民粹情緒涉及領袖的魅力令人對政治恢復興趣。

阿爾迪蒂指出卡諾芬的論點發展自奧克肖特（Oakeshott 1996）的信念的政治（politics of faith）及懷疑的政治（politics of scepticism），前者指相信可靠人力改善將來，後者則指政府可做的僅比維持和平及改善其系統多一點（which reckons that governments can do little more than keep the peace and improve ‘the system of rights and duties and the concomitant system of means of Redress」），還

有構作一個表面的秩序。雖然互相對立，但兩者不能單獨存在，它們只是一項政治活動的兩極，每一項政治活動都含有這兩項成份，卡諾芬把它們重新命名為拯救性（redemptive）及實用性（pragmatic），並指出缺乏拯救性及過度的實用性往往是構成民粹主義的原因。阿爾迪蒂指出民主的這兩項特性的關係，以奧克肖特的話來說，是不調和中的和諧，以卡諾芬的話來說，對於民主的運行，兩者是缺一不可的，防止民粹的興起不能靠平衡兩者於民主政治中所佔的份量，反之，民粹的興起是因為在一個制度中，兩者不能於一個合適的時間相遇，即民主政治充塞過量的實用性時，拯救性卻缺場。兩者不能於一個合適的時間相遇，這是現代政治的一項特色，然而民粹政治不是兩者的空隙間唯一可行的基進政治，當中還有其他的可能性。

這些判斷提供了有別於視民粹為病態的定義，並解釋了公民的民粹情感的來源，但雙支柱模型仍有其缺點，其一是這模型過份強調自由民主制的矛盾性質，但未能掌握其一致性及本質：到底民主是反映大多數人的意志還是包涵所有公民的利益，而代議政制妨礙人民即時表達意志還是必要的建制；其二，這模型強調民粹及民主支柱之間的連續性，這意味民主政治必然包含民粹性質，令分清民粹及民主的概念變得不可行，因此雙支柱模型未能就民粹主義何時會變得危險提供分析的工具。（Abts & Rummens 2007）

2.4 三邏輯模型

三邏輯模型的三個邏輯是指民粹主義、民主及自由主義。發展自施米特

（Schmitt 1928, 1988, 1996）對自由民主制的評擊，及勒福爾（Lefort 1986, 1988）對民主的分析，阿布斯及呂門士指出，自由民主制的特色是把權力場所空置。勒福爾指權力的場所於君主政體中，體現於國王本人身上，國王保證、代表及體現政治社群實際的整體（unity），透過成為神及人之間的中介，國王的權力被正當化。於民主社會中，權力場所必須為空置的，國家的治理者不可以權力場所認同自己，他們不過是暫時佔著公職，需定時參與政治及選舉競爭，但空置不是實質的空置，因為權力的場所是符號性的，它一方面是整體的表述（a representation of unity），另一方面也是他性的指涉（a reference to otherness）。前者指自由民主制中，政治群體是一個整體並非因基於它是同質，而是它們共同分享一個由多樣化社會中的衝突轉化為政治鬥爭的政治舞台。他性所指的不是對立於超然權威的他性，而是對立於符號性的（symbolic）權力場所的空置性，即民主權力的實際行使、所有對身份認同和人民意志的特定演繹。自由民主制假設公民是不斷變化及多樣，公民的身份及意志永不會達致最後的演繹，所以這民主過程永不會到達一個終結（closure），按此理解，權力場所的空置實指權力場所對不同的演繹保持開放，容許政治鬥爭的進行。

因此於三邏輯模型中，自由主義是自由民主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其確保了個人的人權不受多數人的暴政的侵害，造就社會的多樣化。而人民的主權並非指向人民一致的意志，而是指向人民的身份認同，這身份認同所包含的是對個人性及多元性的尊重。只有個人權利及對集體意志的暫時演繹互相獨立，才能建構自由民主制中的和而不同。

這民主邏輯可被兩種模式破壞，一是這場所消失，並被完全的法治取代。因為自由的幻象有時會視個人為先於社會、工具性的行動者，政治鬥爭被理解為個別利益之間的鬥爭，公眾利益這民主的共同目標於這話語中便會缺席，政治整體的維持被忽略，權力場所的符號的空置被理解成實際的空置，或曰消失，社會面臨瓦解的危機。

另一種模式是這場所被視人民為同質性群體的堅固形象所關閉（close），當有機整體的政治群體的幻象，企圖為集體身份提供清晰的定義時，會排除暫時性演繹集體身份的過程，對同質整體的信念會忽視民主核心中的他性觀念，壓制社會中的元性，這意味權力場所被關閉，並會導致民粹主義及極權主義。

2.5 民粹主義作為政治邏輯

我們可見，有關民粹主義的討論，大多是環繞民粹與自由民主制的關係，並把它理解成異於自由民主制。但回到香港的政治脈絡，這分析可能並不適用。社民連的媒體論述幾乎符合所有民粹主義的特徵（往後的章節將會詳述），但社民連的一個核心目標，卻是爭取民主政制，落實普選，那可算是一般意義上的自由民主制。因此，重新了解民粹主義的性質是把民粹主義應用於分析香港政治的必需工作。

香港文化研究學者許寶強於分析香港政治話語時引入了拉克勞對民粹主義的分

析，拉克勞對民粹主義的理解不是把視它為自由民主制的對立，而是把民粹主義理解為一種政治邏輯，拉克勞於其著作 *On Populist Reason* 中，希望找出集體身份認同形成的性質及邏輯，他不滿意社會學分析中要麼視一個群體為分析的基本單位，要麼則以功能主義（*Functionalist*）或結構主義（*Structuralist*）的範式把這單位先驗化。這些範式對拉克勞來說是過於簡化及劃一，而未能捕捉身份建構的不同運動，就算個人主義的分析—包括理性選擇論，也未能解決上述範式過於簡化及劃一的問題。因此他把分析單位由「團體」改為「訴求」。於拉克勞的理論中，這些訴求轉化成集體身份認同的過程就是民粹邏輯（*populist reason*）。如拉爾默及弗雷澤（*Larmer and Fraser 2007*）所指，拉克勞的民粹主義並不是指任何特殊的意識型態主張或政策規劃，而是結連不同社會需求的邏輯（*Laclau, 2005*），「第一是形成一個內部的對立戰線，把「人民」（*people*）與掌權者（*power*）分開並對立起來；第二是把「人民」的紛雜多樣需求，扣連成一種共同的需求（*common demand*）；最後是鞏固這民粹需求，成為一個穩定的意義系統（*system of signification*）。由於「人民」本身極為多元紛雜，不同的具體訴求難以統一，因此意義含混的空洞能指（*empty signifier*）」，例如「基層」、「激進」等，語焉不詳的詞彙，「統合地表述「人民」特定而具體的、千差萬別的訴求。」（*Laclau, 2005; 許寶強 2007*）。

由於香港的政治制度並非自由民主制，採用與自由民主制對立的方式定義民粹主義，以研究香港的政治，討論社民連的興起似乎不會為我們帶來具意義的結論，因此，本研究將採用拉克勞的框架，視民粹主義為政治邏輯及集體身份的

建構，它的優點在於不會如第一章所述的諸多理論般，跌入先驗性的階級框架之中，以階級作為身份認同的單位，而是把眼光放到身份認同生成的過程中，以文化作為研究的途徑，以意義的生產為切入點分析事件發生的原因(Foucault 1972, Ross 1997)，分析不同的社會訴求如何透過「空洞能指」以建立相對於「共同敵人」的身份認同(Laclau 2002)，強調結連不同訴求的方式（Zuquete 2008）。

2.6 如何評價民粹主義？

與阿布斯及呂門士的分析一樣，拉克勞也借用了勒福爾的權力場所概念，他指出於大多情況下，勒福爾指民粹是極權是正確的。但於民粹主義的討論中，可能扣連的，不只極權主義及民主的對立，而是更多元化光譜，勒福爾的分析短處在其只把注意力放於自由民主制政體，而沒有把注意力放到民粹民主主體的建構。兩者的理論不同，導致分析的不同。勒福爾的重點是權力位置的空缺，而拉克勞的重點是這空置是如何於統識的邏輯中生產出來。對拉克勞來說，空置只是一種身份認同，而不是一個建制位置。權力場所不可能完全空置，就算最民主的社會也有一個符號界限，決定誰可佔有權力的位置，於這位置被徹底佔有與被徹底空置之間，不同程度的部份佔有，這部分佔有的形式是統識的踐行。

拉克勞引用穆芙（Mouffe 2000）的分析進一步說明民主的建構過程，她指民主不單是人民行使主權的政治制度，也是讓民主統治於其中實行的符號框架，於

現代的自由民主制是由自由及民主兩者的扣連產生，這框架中自由主義的部份是強調個人自由及人權話語，而民主的傳統則強調的平等、統治者及被統治者之間的認同及人民的主權，穆芙指自由及民主之間沒有必然的扣連，其扣連是偶然的。因此拉克勞得出兩個結論，一是除了自由民主制的符號框架以外還有其他民主制度的符號框架，二是因「人民」的出現不是任何框架的直接結果，因此人民主體生成的問題成為了民主本身的整體問題。

穆芙的著作 *On the Political* (2005)，可進一步幫助我們理解民粹主義與民主的關係，她於書中企圖挑戰「後政治」的視角。於九十年代隨著蘇聯的解體及（以美國為主導的）全球化浪潮中，有不少理論家如紀登斯（Giddens 1994），提出「超越左右」的「後政治」主張。指於蘇聯解體後，左右的界線已變得模糊，西方資本主義成為了唯一可行的模式，傳統的對立政治只會阻礙民主發展，新的民主政治是持份者之間的利益洽談及專業人士的技術處理。

穆芙認為，這種「後政治」的認知，不單無助於了解當前世界面對的挑戰，如國際的恐怖主義及歐洲右翼民粹主義的興起，而且，「後政治」思想及其衍生的政治生態，對於民主化民主（制度）（*democratizing democracy*），這「後政治」念茲在茲的目標不但沒有幫助，反之，缺乏明確的對立選項，政治中被壓迫的人群的聲音往往不能被包含到政治競爭中。

穆芙區分了「政治」（*politics*）及「政治的」（*the political*）這兩個概念，

「政治」指的是政治科學中的實證範疇，而「政治的」指的是政治哲學中，政

治的本質問題，後者是穆芙希望處理的問題，她指出對立是建構人類社會的一個向度。穆芙引用了施米特（Schmitt 1976）的著作，指政治身份認同由幾種不同的我們／他們關係，並可轉化成朋友／敵人的關係，「我們」身份的構作，只有通過構作「他們」來達成，並形成對立關係（Antagonism）。於政治對立之中，一些可能性往往會被排除，一些會被扣連，形成統識

（Hegemony）中的秩序及社會制度，政治的對立可體現於統識的形成過程中，但爲了區分於制度上企圖消滅敵人的敵我的「對立」（Antagonism）及於政治制度中互相競爭統識地位而不企圖消滅對方的民主制度中的「競賽」

（Agonism），穆芙把稱前者爲「對立」，後者稱爲「競賽」。於成熟的議會制度中，競賽容許不同的政治團體競逐統識的地位，把對立方視爲對手

（adversary）而非敵人（enemy），避免不同的團體互相消滅。

按穆芙的理論框架，九十年代的歐洲右翼民粹主的興起的原因是民主政治中缺乏了明確的對立選項。穆芙於九十年代理解奧地利的右翼民粹政黨－自由黨的興起時，指出於二戰後，奧地利一直處於保守的人民黨及偏左的社會黨的共治下，而身爲少數黨的自由黨則透過建構我們一般奧地利人／有權力的人的我們／他們論述，扣連了對共治政府的不滿，把自己塑造成奧地利政治中的另類選擇，使自由黨於一九九九年的大選中超越人民黨成爲國會中的第二大黨。穆芙指正是由於奧地利長年處於人民黨／社會黨共治的模式，令奧地利的政治欠缺異於現存建制的競賽政治的渠道和真正的對立政治，令反現存建制的政黨可透過塑造自己爲建制以外的選擇而興起。

於歐洲，現存建制對右翼民粹主義的反應多是指出其極右的面向，把這些政黨和納粹黨及法西斯掛鉤。穆芙指這反應沒有超出左右對立的範疇，而是建立了「好的民主支持者」與「壞的極右」的對立，這反法西斯的戲碼不是單純的我們／他們對立，也是正邪對立。這道德修辭建底下，其實是政治的對立，但以道德修論述政治對立，偏偏無法終止不少後政治理論家所唾棄的對立政治，而且令對立政治無法轉化成競賽的政治，人們僅視右翼政黨的興起為「道德的病態」，以右翼政黨為敵人企圖消滅之，而不正視與其扣連的聲音，令民主失去基進性。

透過穆芙的分析，我希望指出把民粹置放於民主的對立面並加以取締只會破壞民主本身，拉克勞對自由民主制的分析進一步解決了民粹及自由民主制之間的矛盾。他指所有政治也是民粹的，自由民主制的「自由」本身只是一個空洞能指，它統合了對人權的守護及公民自由等訴求，並產生出自由主義的「人民」及相關的意義系統，形成自由民主制的民粹政治。但這並不是指民粹主義必然是民主的。阿爾迪蒂對拉克勞的民粹主義的討論進一步說明了民主及民粹之間的關係，他指拉克勞的民粹理論中，民粹及政治是兩個可互換的詞語，這說法雖然有一定的吸引力，他直覺上也認為所有政治都含有民粹的成分，但把政治和民粹劃上等號無助於了解政治，不過同時我們也沒有必要把兩者明確分開，反之要接受兩者具互通的部分，正如卡諾芬所指，民粹跟民主是如影隨形般，把拉克勞的政治和民粹兩者可互換改為兩者如影隨形（即政治中必然有民粹的部分）可補足拉克勞的理論的短處。

阿爾迪蒂更進一步引用德里達（Derrida 1994）「幽靈」的說法，指「幽靈」一詞同時指涉探望及縈繞於我們的東西，進一步指出民粹的不肯定性，民粹可協助民主的推行，也可纏繞民主，威脅民主。「幽靈」般的民粹主義可以三種形式出現，第一，民粹主義可以和自由民主制度所理解的代表政府兼容，而非等同。第二，民粹主義作為對政治禮儀的決裂，作為對精英民主／民主精英的不滿。第三是民粹主義作為對民主的危害，例如對建制過程的不信任，追求民粹領袖的帶領，這會做社會由法治過渡成威權政治。因此，簡單的視民粹危害民主是過於草率，我們必須仔細地檢視民粹政治的操作，特別是其話語的建構，才可理解其作用。

以拉克勞的民粹主義思考香港政治會為我們開啓新的思考方向，例如，如果階級分析不足以分析社民連的成功，社民連以階級作主軸的政治論述如何令社民連興起？當我們把民粹主義理解為扣連不同訴求的邏輯，那末，社民連的激進路線為什麼能吸納泛民主派的傳統路線未能吸納的訴求？這一路線於香港的脈絡中又能開啓什麼能動性？如果民粹主義與民主的關是多元的，社民連的民粹主義與民主的關係又是什麼？我將於第四至第七章解答這些問題。

第三章 互聯網與方法學

3.1 理論化互聯網

作為一個有關互聯網的踐行的研究，我們該如何理論化互聯網以便於了解其特性，及為社民連興起的作用呢？這我們先回顧一些有關互聯網的研究的討論，當中我會指出互聯網的好一些特性有利於「另類公共」的踐行，於更後的章節中，我會進一步描述這些踐行對支持社民連的話語的重要性。

網上社區研究開始盛行於八、九十年代，早期的評論家開始提出「賽博空間」(cyberspace)的論調，指其為一個獨立的空間，並視之為挑戰現存大眾媒體壟斷通訊，創造民主公民社會的可能(Rheingold 1993)，然而，隨著樂觀的退卻，不少學者發現互聯網和現實世界是密不可分的，獨立存在的賽博空間不過是一個假象(Hakken 1999)，而單純的認為互聯網會顛覆現有權力關係是低估了不同機構對互聯網的控制(Wilson and Peterson 2002)。

人類學的研究目光由單純的網上研究移到網上行為和其他社會範疇的關係，包括歷史、社會及文化（Brown & Duguid 2000, Garfinkel 2000, Quoted from Wilson and Peterson 2002），這使互聯網被視為一個被各方爭奪的空間(contested space)般研究，而非獨立於社會上其他場域的空間。Appaduri（1991）指出，我們如分隔的去分析社群，將會使我們無視社群中的個人與該社群及其他社群的互動，也會忽略社群本身的異質性。Barthes 明確的指出，一個群體中的個人往往同時是其他互動社群、社會或文化中的一員（Barthes

1992)。近年來人類學對網上社群的研究亦承認個人於不同社會政及文化背景中的多重身分認同，而這些認同往往會影響個人於不同的媒介中的表現，如把線下（offline）的社會角色及文化意識形態如何於網上群體中被再呈現甚至誇大(Correll 1995)。

有別於當初賽博空間的構想，網上群體不再被視為獨立於「線下」（offline）的其他領域，甚至這種線上／線下，虛擬／真實之間的界線不再視為有用的分析手法，Miller and Slater 於其關於人類學路徑的著作 “The Internet: An Ethnographic Approach” 中指出，這些二分對研究人們如何使用互聯網只有十分有限的作用，事實上對更多人來說，與其說互聯網是虛擬或是另一種真實，倒不如是另一種可以應用的媒體(Miller and Slater 2000)。

作為媒體，或稱為新媒體，互聯網令媒體中的發訊者（Transmitter）及收訊者（receiver）的分野變得模糊（Enzensberger 1970, Quoted from Wimmer 2005），其運作模式由以往一對多的溝通演變成多對多的存取、參與及相互性（Jenkins & Thorburn 2003）。而互聯網的這些特性，能把一些爭議傳播到本土社群以外的其他社群，令本土關注不單是一個社群之事，其他社群透過互聯網的討論，可能會把自己扣連到這些關注中（Riley, Klumpp & Hollihan 1995），著名的例子有查巴達運動及香港的反高鐵抗爭。不同社群的扣連過程，如何匯合成對社民連的支持正是本研究的重點。

3.2 互聯網與多樣的公共（multiple publics）

相對傳統媒體，互聯網的多對多溝通特性也為不同的群體提供了溝通媒介，建構更多元的媒介公共領域，即更多元的文本流通空間。多元的公共領域這一概念原自對 Habermas 的公共領域的回應，Habermas 於 1962 年德語版本的《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論資產階級社會的類型》(Strukturwandel der Öffentlichkeit. Untersuchungen zu einer Kategorie der bürgerlichen Gesellschaft) 中提出了公共領域一詞。他仔細闡述了布爾喬亞公共領域的轉型，他認為公共領域是「私的個人」(private person) 聚集起來討論「公共關注」(public concern) 與共同利益的領域。於早期的現代歐洲，公共領域建構起「布爾喬亞公共領域」讓布爾喬亞階級制衡專制的國家 (absolutism state)，讓國家的運作能被布爾喬亞階級監察。以此為基礎，布爾喬亞把「布爾喬亞公共領域」的實踐引申為制度上對言論自由、出版自由及集會自由的保證，最後他們把公共領域轉化成代議政制。這一發展，意味公共領域是一個讓社會上所有人就公共事務參與其中，進行不受限制的理性討論的空間 (Habermas 1989, Fraser 1992)。《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論資產階級社會的類型》一書於 1989 年被翻譯成英語後，於英語的學術圈子引起很大的討論，其中，女性主義學者 Nancy Fraser (1992) 於 Habermas 的基礎之上，提出了反公共的概念，她觀察到當我們把公共領域理解為單一、全面、包羅萬象的公共，弱勢的群體則沒有討論自身需要、目標及策略的場所。現實中，這些弱勢群體，如女性、工人、有色人種及同性戀者重覆地發現建立另類的公共的好處。Fraser 稱這些公共為弱勢者反公共領域 (subaltern counterpublic)，Fraser 以 20 世紀末的女性主義運動為例子，指出這些只由弱勢者參與的公共領域 (反公共)，如期刊、出版公司、書店等，形

成及散播了一些新的概念及詞彙，如男性至上主義（sexism）及性騷擾

（sexual harassment）等。她指這是弱勢群體創造及流傳反話語，以構成關於他們的身份認同、關注及需要的對抗性演繹的平衡話語場域。反公共的反在於弱勢群體於此構成關於他們的身份認同、關注及需要的對抗性演繹。Michael Warner（2002）指反公共不只與具領導地位的群體衝突，也和公共的規範(具領導地位的文化建構)衝突。但反公共不是與公共互不相干的，事實上公共本身的組成中充滿了衝突和反常，因此我們可把反公共理解為一種公共（a public），而反公共話語的流通可視為重新思考社會的工具，是社會改變的動力。

回顧 Fraser 及 Warner 反公共的討論不意味本研究要把互聯網簡單地視為反公共，互聯網可以提供空間讓反公共使用（Wimmer 2005），而本研究所選取的網絡社群並不是反公共，因為這些群體並不要求人們有特殊的身分以參與其中（Hands 2007）。互聯網的一些特性是有利於反公共的踐行。反公共有著另類的媒體內容、媒體踐行（如生產模式），而反公共本身把社會上流通的資料放到不同的話語及脈絡中（Krotz 1993, quoted from Wimmer 2005），因此反公共是一個社會過程（Wimmer 2005）。反公共可使用互聯網以一）表述他們被邊緣化的利益（Siapera 2004）、二）提供論壇予另類媒體的報導（Hamm & Zaiser 2000 quoted in Wimmer 2005, Harding 1998）及三）批判現行的媒體報導。反公共與主流及統治的公共相異，但反公共中的部分目標會被主流接納，接納並非指成為主流的意識形態，而是把反公共的定義及話語擴散到主流之中。

正如 Felski (1989) 及 Fraser (1992) 所言，我們不宜把社會上的公共理解為單一的公共，而是有不同的公共在產生對立或不同的話語，Warner (2002) 亦指有兩種意義上的公共：整體的公共 (the public) 及局部的公共 (a public)，整體的公共是指社會的全體，指人民的整體，而局部的公共則指一些文本的實在的聽眾、讀者或觀眾，這意義上的公共只有聽眾、讀者或觀眾和文本及其流傳產生關係時才形成。不同的網上群體，就意味不同的公共 (publics) 的誕生 (Palczewski 2001)。於互聯網興起的背景之下，大眾媒體對輿論的支配地位受到挑戰 (Mater 2001)，這意味主流媒體以外的公共比以往更有影響力。當香港的媒體開始淪落為政府的傳話人 (Lee & Chu 1998)，在好一些群眾中漸漸

喪失其公信力，與此同時，網絡上民間傳媒興起 (蔡子強 2010)，因此，研究香港的網上媒體則別具意義。

本文中，我將使用「另類公共」(Alternative public) 一詞 代表互聯網社群，「另類公共」和反公共不同之處在於它不一定是由弱勢群體組成，「另類公共」的重要性只在於其相對公共領域的風格、話語的生產方式、議題等 (Wimmer 2005)。

使用 Fraser 的概念理解另類公共時，我們可把它理解成四個面向，第一是話語於公共領域(主流媒介)以外的場域運作，如另類媒體、互聯網等；第二是佔據媒體話語的參與者以外的人可參與另類公共的討論，第三是於另類公共之中，

討論不常被討論的議題，甚至討論從不被討論的議題；第四是於另類公共中使用異於主流的方式或形式，如非議會的直接行動。因此，借用 Fraser 評論反公共的話，另類公共是對更大的公共進行煽動的訓練場所及基地（1992）。

對於研究社民連的政治話語操作，這些互聯網的特性有着不少的作用，本研究會從另類公共的踐行入手，分析一些被大眾傳媒擠壓的話語及訴求如何透過互聯網被提出及討論，以指出社民連支持者這集體身份是如何由互聯網的使用而生成的。因此對本研究來說，劃分主流公共與另類公共領域的是人們參與生產的模式，主流公共指的是以商業傳媒或公共廣播機構主導，以一對多模式生產文本的公共；另類公共則是指同是以商業機構主導，但以「用戶生成資訊」（user-generated content）（Artieri, Rossi & Giellieto 2009）及多對多溝通為主的公共。本研究將分析這兩這的生產方式會產生什麼不同的文本。

3.3 互聯網與書寫民粹主義

互聯網的介入，把書寫民粹的重點由大眾媒體的話語操作過渡到一般人的話語中。了解人們在互聯網提出及討論一些被擠壓的話語及訴求時，如何在傳統媒的公共領域外，梳理符號世界，以建構自己的身份。

人們在互聯網上生產文本，打破了生產者與消費者的二分，這些文本為我們了解社民連的成功提供了新的進路，詮釋它們是不能缺少的工作，以了解有什麼於另類公共中被表達，這些訴求可能因其表述風格、發言者的地位（Hall 1978 et al.）、本港的小報化的媒體生態（彭家發 2002）等原因而被排斥於傳統媒

體之外。如第一、二章所言，民粹主義是扣連多元訴求的邏輯（Laclau 2005），因此，仔細的研究這些多元的話語可讓我們了解社民連扣連了什麼訴求，讓我們更全面地了解第一章提及的「社民連的支持者把什麼訴求和希望投射到他們對社民連的支持當中？」的問題，並了解社會上有什麼不能被滿足的訴求。

3.4 研究設計

本研究試圖透過觀察社民連的話語操作及人們如何把他們的訴求扣連到些話語中，以了解這些話語操作如何促成社民連的興起，但互聯網並非獨立於線下世界的空間，網上的討論需要大眾傳媒所提供的話語進行，因此，我們首要的問題是：當我們把大眾媒體及一些新媒體理解成不同的公共，這兩者是否有著不同政治話語？透過一些初步的觀察，答案是肯定的（這會於往後的章節詳述），對於我們了解人們如何透過互聯網生成及傳播支持社民連的政治話語起著重要的作用，一方面肯定了在互聯網上活躍的人對社民連的話語有雙向的定義能力（Schrøder & Phillips 2007），而我相信這涉及扣連自身經驗及訴求（Kertzer 1988）。有了這前設，我們可問這些經驗及訴求為什麼會形成對社民連的支持。透過引入民粹主義這一概念，本研究假設這集體身分的塑造是透過對立與空洞能指形成。為此，本研究需要透過閱讀傳統媒體與新媒體上有關社民連的話語以尋找這些對立的建構及空洞能指，從中理解這些空洞能指統合了什麼訴求。

由於假設了話語的生成是人們把他們的經驗及訴求扣連到現有的話語中，而當中的經驗及訴求是我們所希望得悉的，因此，以當代詮釋學的方式去理解這些話語於本研究是極具相關性的，這裡，當代詮釋學的方法是指把文本放置到其本身的歷史脈絡中，以明白這些文本是在回答其生產的時代的什麼問題

（Gadamer 1989, Blaikie 1993）。本研究的文本詮釋主要有兩部份，一是大眾媒體的，二是新媒體的。

甲. 大眾媒體的文本詮釋

大眾媒體指的是傳統一對多廣播的媒體，如報章、電視、電台等。本研究所選取的大眾媒體取決於社民連的支持者所選看的媒體，在他們生成有關社民連的話語時它們起直接的作用。於高登討論區及 facebook（見本節乙部）上人們（特別是民連的支持者）多引用《蘋果日報》及《明報》。

人們多引用《蘋果日報》是由於其反建制立場。作為小報的《蘋果日報》往往能夠提供煽情而過度簡化的話語讓人們評論社會上的事務。雖然傳統媒體理論多視小報為病態，但 Örnebring 和 Jönsson（2008）卻指小報的這些特質不一定全然是壞的，並可能為公眾利益服務。因小報可

1. 為不同的參與者提供聲音，涵蓋不同的議題；
2. 小報會對政治、經濟及文化精英及社會現象的批評及質疑；
3. 小報可透過開啓從未被討論的議題，協助社會改變。

《蘋果日報》的這些特質是社民連的支持者常引用《蘋果日報》的原因，而

《蘋果日報》帶來的影響不一定是壞的，我們必需小心評價它的影響。

另一份多被引用的報章是《明報》。《明報》多被引用的原因與互聯網的操作有很大的關係。《明報》是入門網站雅虎（香港）新聞長期轉載的報章之一，另一份是《星島日報》，但社民連的支持者因《星島日報》親建制的立場而不信任⁸，雖然《明報》因它保守的取態而不受社民連支持者信任，但相對於《星島日報》，《明報》仍被視為較可靠而被引用。

《明報》這一特質模糊了大眾媒體與以互聯網為基礎的新媒體之間的分界，不過《明報》的生產不是所有人也可以參與，本研究仍會把《明報》歸入大眾媒體。

除了《明報》及《蘋果日報》外，社民連的支持者也有引用其他報章，本研究也會把這些報導納入分析的文本中。因此大眾媒體的文本分析的範圍如下：

1. 《明報》2006年7月1日至2010年7月1日的新聞報導及社評
2. 《蘋果日報》2006年7月1日至2010年7月1日的新聞報導及社評
3. 其他於互聯網上的討論中被提及的媒體報導

選擇2006年7月1日至2010年7月1日這一時段是因為本研究的目的是透過研究社民連的興起以了解香港的政治情況，這一時段是社民連興起的時段。這

---

⁸ 曾有社民連的支持者因《星島日報》指社民連的立會候選人派衛生紙是賄選而指責《星島日報》為《星狗日報》。（〈黃毓民斥陳太「棄保論」為幫公民黨〉，《星島日報》，要聞／A02，6/9/2008。）
(http://forum5.hkgolden.com/view.aspx?type=CA&message=1352793&highlight_id=0&page=1)

四年間，社民連於立法會中的議席增加、會員人數上升、定義議題的能力亦顯強大，於政改方案通過至 2010 年七一遊行其間，「民主黨出賣港人」這一社民連極力倡導的口號成了當時媒體上一個重要的討論話題。於 2010 年 7 月 1 日後不久，社民連面臨分裂，立法會中的議席數目、會員人數、定義議題的能力銳減，研究這一時段的社民連與本研究的目的不符，因此本研究將以 2010 年 7 月 1 日為界線。

乙. 新媒體的文本詮釋

由於互聯網具多對多溝通的特性，因此其溝通的情景脈絡（Fisher 1978）多變，因此人與人之間的互動是我們詮釋互聯網上的話語時要小心注意的，本研究將會透過考察一些互聯網討論中的互動以了解社民連的支持者如何使用一些工具進行多對多的溝通，以生成他們的話語及身份認同。要研究互聯網上的話語，虛擬民族誌是一個傳統方法，這方法要求研究者處身於研究的現場，並透徹地參與現場的日常互動（Hine 2000）。這一研究方法讓研究者可深入地了解網上的現象，但對深入參與的要求卻限制了分析的對話的數量，加上這方法強調對特定場所的研究，因此未能全面了解特定的討論於網上的發展（Artieri, Rossi & Giellieto 2009）。社民連的討論出現於多個互聯網群，因此會面對虛擬民族誌未能全面了解特定的討論於網上的發展的問題。因此本研究的將採用文本分析的方法以分析不同的互聯網群體中有關社民連的話語的意義。我進行文本分析的時候，會分析互聯網社群的具體互動，如人們如何於網上接觸不同的人以生成新的身分認同（Miller & Slater 2000）。

然而，正如上文所述，互聯網不是獨立於線下的空間，互聯網與大眾媒體上的文本的經常互相指涉、引用（Jenkins 2006），因此，我的分析不限於互聯網上的互動，我也會分析互聯網與大眾媒體之間的關係。互聯網與大眾媒體的文本的互相指涉、引用的特徵令線上、線下的分野變得模糊。互聯網一方面不是一個獨立於線下的空間，大眾媒體的話語生產的互聯網的話語有極大的影響力，而大眾媒體的生產模式往往令大多數人無法發聲，但互聯網多對多溝通的特性容許另類公共的實踐的特質，令互聯網成為被大眾媒體排斥的人表述他們、生成另類話語的空間（Wimmer 2005）。

為了可展現這種互動的複雜性，我的分析不但是文本（Textual）的，我也會分析話語會如何在不同的生產關係中被生產，不同的環境又會生出什麼話語。具體來說，我會分析人們於香港的小報化（彭家發 2002）、中央能操縱媒體（Lee & Chu 1998）的環境中利用大眾與新媒體的資源及限制來生產話語。本研究分析對象是話語，因此我不會採用訪談以收集資料。

分析樣本

本研究選取了四個社民連支持者活躍的網上群體及社民連的官方網站：

香港高登討論區：2000 年成立的討論區，現由活現媒體傳播有限公司（Alive! Media & Communications Limited）營運及管理，每月瀏覽人次 37 萬（香港網絡大典，2010）。有不少社民連的支持者活躍於高登討論區，討論區常有支持

與反對社民連的論爭。我使用站上的搜索功能，以「社民連」及社民連的政治名星「梁國雄」、「黃毓民」及「陳偉業」這些關鍵詞搜索帖子，並閱讀所有帖子。

Facebook：2004 年開始營運的社會性網路網站，使用者可與其他用戶分享訊息、圖片、片段等。並可成立群組，這些群組於不少示威動員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社民連也有開設 facebook 群組，而不少社民連的支持者及黨員也於 facebook 活躍，梁國雄也是筆者的「朋友」。我以站內搜尋引擎搜索「社民連」及社民連的政治名星「梁國雄」、「黃毓民」及「陳偉業」這些字眼，並搜索一些相約參與社民連的活動的群組，如五區總辭運動的群組以搜集其中的文本。

My Radio 及 ourTV：香港人網連繫的網上電台，由蕭若元及黃毓民創辦，三位社民連的議員都會於 My Radio 及 ourTV 主持節目，這些節目不時會於互聯網上的討論中被引用。本研究會分析《毓民踩場》及《向左望》這兩個由黃毓民及梁國雄主席的節目。

社民連官方網站：站上有官方訊息、政策崗領、有關社民連的剪報等訊息，能為社民連的論述提供資訊，我會閱讀整個網頁的內容。

另外，社民連的支持者於上述社群的討論中會引用其他互聯網上的資源，有些是把文章及圖片轉載到這些社群上，有些是以超連結（hyperlink）的形式轉載，本研究亦會把這些超連結的內容納入研究範圍，並以 2006 年 7 月 1 日至

2010 年 7 月 1 日爲界收集資料。

透過搜集研究範圍中的大眾媒體及新媒體的資料，本研究將搜集以下三方面的資料：

1. 社民連如何自我表述
2. 媒體如何表述社民連
3. 社民連的支持者如何於互聯網上互動

透過搜集上述資料，本研究將分析：

1. 社民連的政治建基於什麼對立
2. 社民連的支持者有什麼訴求
3. 社民連的政治論述以什麼空洞能指統合支持者的訴求

最終本研究將以民粹主義的框架分析人們爲什麼會把他們的訴求投資到「社民連」之上，形成他們對社民連的支持及理解其所衍生的主體。

這一質性研究的方法有其本身的不足：本研究不能爲社民連的話語的影響力作出一個全面的計算，如未能統計有多少人認同社民連的話語。但如我於第一章所述，文化不能化約爲去脈絡化的選項，文化中有多元化化的聲音及多樣的衝突（Couldry 2000）。作爲一個文化研究的研究，本研究的重點是分析這些多元的衝突被組織起來的過程。反之，有多少人支持社民連不是本研究所要回答的問題。於一些網上社群中，的確會出現一人分飾多角的現象，但本研究不是要回答誰人或有多少人在支持社民連，而是社民連的話語統合了什麼訴求，形成一種衝突的形態。深入的文本分析的最終目的是把這些訴求發掘出來，並描

述這些訴求被統合的過程。

第四章 社民連與基層——一個階級問題？

「香港現在的政黨大都是親建制的，香港的政黨全都是大右派，我現在告訴大家，我們這一個政黨，將來這一個政黨是一個左派的政黨！我們要把左派這一道理高地顛倒過來，共產黨已不是左派的政黨；民建聯是親建制、親工商派的大右派；自由黨是大右派；民主黨是中間偏右；公民黨是中間偏右。香港缺乏一個捍衛基層利益的左派政黨，所以大家要支持一個真真正正、旗幟鮮明的民主派！要支持一個旗幟鮮明的反對派！我們除了是一個旗幟鮮明的左派政黨，還是一個旗幟鮮明的反對派！」

黃毓民於 2006 年 7 月 1 日的街頭演講

自 2006 年創黨之初，社民連就提出了與香港傳統民主派對建制派的對立不同的政治話語。傳統政治話語中的建制派主要由資產階級及親中的左派組成，而泛民主派則由數個支持民主改革的政黨組成，其中包括民主黨、公民黨、民協、街工、職工盟等政黨及工會組成。雖然於政治光譜中，民主派中的工會如街工及職工盟可被視為左派，但由於建制派中的工聯會及民聯有親中國共產黨的背景，民主派與建制派之爭有時會被化約為民主派與左派之爭。

於 2006 年 7 月 1 日的街頭演講中，前電台名咀，後來社民連的創黨主席黃毓民就提出了要把「左派」這道德高地搶回來。當黃毓民指香港缺乏一個左派政黨時，他一方面指傳統政治話語中的左派為大右派，並指泛民內的民主黨及公民黨為中間偏右，但卻沒有提及泛民內偏左的街工及職工盟。這意味社民連並

不是泛民中唯一的左派，於具體的操作中，社民把「激進」與「左派」扣連起來（見 4.3），有關激進的部份可見於本研究的第五章，現在我們先集中到左派上。

社民連以「左派」作為號召，社會民主主義為名，於香港，這其實不是新的事情，民協早於 1992 年第一期的《新社會論壇》已以社會民主主義為題。是什麼令人們對社民連有著不同的理解？作為第一期的《新社會論壇》的作者之一的周魯逸（筆名魯凡之）對社民連作了以下的評論（阿古 2008）：

「現時的社民連是政治上的激進派，而非社會運動上的左翼，它的群眾基礎是泛民中的激進份子。說到社民連的社會基礎...是中產階級，因此與公民黨近似。周魯逸說，從歐洲經驗看，歐洲社會民主主義的支持者多為中產。在香港，其實中產階級在人數及社會地位上已擁有巨大力量，但主導香港的是反共意識形態，故左翼思想在香港無人問津，也難產出像歐洲的激進中產階級。社民連的支持者，多是希望找人為他們『出氣』，而多於支持『左翼』理念...社民連就是乘著部份中產對泛民不滿，以激進姿態進據左翼戰場。」

媒體對社民連的表述與周魯逸指「社民連的支持者，多是希望找人為他們『出氣』，而多於支持『左翼』理念」這一點卻相當接近，社民連很多時都被指為激進民主派。然而，本研究不能認同周指社民連的社會基礎是中產的說法，按蔡子強（2008）的票站數據研究，社民連是跨階層的政黨。雖然社民連

不如一些人所想，支持者主要是中產或基層，但從大眾媒體及互聯網上的話討論中，社民連的「基層」定位還是重要的。

為什麼一個定位「基層」的政黨會於立法會選舉中得到跨階層的支持呢？回答這個問題前，我們先得回答什麼是「基層」？必須注意，簡單的階級分析未能幫助我們了解社民連的興起。階級不如正統馬克思主義所言般由一群人於生產中的關係決定，而是話語操作的結果。雖然社民連的支持者多以「基層」作為身分認同，但「基層」並不是一個簡單的階級問題，「基層」所指往往含混不清，其演繹一時一地而不同，透過拉克勞的民粹主義，我們將看到「基層」一詞扣連了什麼訴求，成為一種政治能量。

4.1 從階級分析到民粹主義

馬克思與恩格斯的《資本論》（1894）第三卷最後一章明言生產中不同的獲利方式定義了不同的階級，他寫道：

「單純勞動力的所有者、資本的所有者和土地的所有者，——他們各自的收入源泉是工資、利潤和地租，——也就是說，僱傭工人、資本家和土地所有者，形成建立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基礎上的現代社會的三大階級。」

階級是由人們於生產中獲利的方析作劃分，對馬克思主義說，其中一個重中的議題是不同的階級位如何影響人的行動（見《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

（馬克思 1852））。於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社會學出現了一種把階級分

析實證化的方向。一些新馬克思主義如賴特（E. O. Wright）把分析的眼光放到政治經濟學的生產領域中，不同結構位置之間的關係。舉例說，於生產中的管理階層一方面和一般工人般收取工資進行勞動，受資本控制，但他們同時間如資本家一樣進行管理，因此管理階層往往不知自己該與資產階級還是勞工階級站在一起，以至出現模稜兩可的階級行為（Wright 1976, So 1991），生產關係的複雜性令新馬克思主義者不能簡單而僵化地把人們分成資產階級或無產階級，新馬克思主義因此替這些生產中的不同位置繪畫「地圖」，以分析階級生成及階級鬥爭。這一被稱為階級結構分析（Class structural analysis）的分析方法具體的議題有：

1. 定義問題：釐清什麼是社會階級及如何定義社會階級；
2. 界線問題：目的是界劃階級結構，描述階級的數量及界線；
3. 資料擬合過程：把普查及調查資料配對到階級地圖中；
4. 討論政治含意：階級地圖的繪畫如何改變階級運動。

但這一分析方法不無問題，其中來自（新）馬克思主義的批評質疑是否有更好的界定和分類，如卡切迪（1986）批評歐林賴特過度強調微觀的個人邏輯（Micro-individual logic），錯過宏觀社會結構（Macro-social structure）；另一類的批評來自馬克思傳統以外，質疑階級結構分析未能解釋歷史軌跡及社會改變。蘇耀昌（So 1991）指階級地圖只是概念練習，往往具邏輯性、整齊並可以把不同的人放到分類之中，而且階級結構分析中的階級結構是靜態的，但關於階級鬥爭的分析，往往需要對不停轉變的歷史過程、出奇不意的事件作仔細

的分析，於這些情況，因此人們所屬的階級位置往往難以置放到預先以理論設計的階級位置中。而 Wright 的階級分析十分倚賴量性研究來把人置放到不同的階級位置中，但階級分析不可以以量性研究取代具體的歷史分析，因此蘇耀昌指階級分析需由靜態的階級結構繪圖過渡到動態的階層鬥爭，由分類練習到歷史分析（Dawson 1990; So and Hikam 1989）。但蘇耀昌的階級鬥爭分析以階級結構（class structure）為起點，他把階級理解成一連串於生產及再生產中的結構性關係，那是理解階級鬥爭中的政治經濟問題的起點，但就本研究的研究問題而言——「社民連的支持者」的主體生成⁹——這以政治經濟的關係為起點分析尚未能脫離本質論，令我們對「基層」的理解只停留於收入低的人群（這雖然不是蘇的觀點），而人們的身分認同不必然與其社會或經濟地位掛勾（Cloudry 2000），因此階級鬥爭分析未能協助我們把「基層」脈絡化。

後馬克思主義者拉克勞從另一個方向進入或批判階級分析。於他與穆芙合著的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2001）就批評正統馬克思主義中，經濟結構（Base）決定上層結構（Superstructure）的論斷，他們引入葛蘭西統識（Hegemony）的概念：透過扣連不同的利益，統治者成功獲得道德上的領導地位的過程。這一概念把話語拉回馬克思主義的分析中，於 *On the Populist Reason* 中，拉克勞更直接視階級為一種偶然及特定的扣連訴求的形式（2005, p.205）。

---

⁹ 與原自笛卡兒的「我思故我在」不同，拉康認為人類能認識自己的存在不是因為人有與生俱來的認知能力，而是語言建構起人對世界的認知。人類透過語言建構起自己與他者的分別而不完全地認識到自身的存在，成為主體。當人們集體透過語言把自己與他者分割開來（Grosz 1990），對照自身的存在，並以「社民連的支持者」為認同，我們可以說他們形成了？一個名為「社民連的支持者」的政治主體。可以說拉康式的主體是沒有本質的，只是語言操作的結果。

對拉克勞來說，經濟或人於生產中的位置不足以決定人的集體身分，對他來說，集體身分的生成是不同的訴求被扣連的結果，即是民粹主義。這裡，在此必須重覆第二章中對拉克勞的民粹主義的定義：第一是形成一個內部的對立戰線，把「人民」(people)與掌權者(power)分開並對立起來；第二是把「人民」的紛雜多樣需求，扣連成一種共同的需求(common demand)；最後是鞏固這民粹需求，成為一個穩定的意義系統(system of signification)。由於「人民」本身極為多元紛雜，不同的具體訴求難以統一，因此意義含混的空洞能指(empty signifier)，「統合地表述『人民』特定而具體的、千差萬別的訴求。」及身分(Laclau, 2005a; 許寶強 2007)，這裏的「人民」本身就是一個空洞能指，可把不同甚至矛盾的意義投射到「人民」這一身分中，甚至「人民」這一詞可被其他詞語代替，如「無產階級」或本章的「基層」等。

回到社民連的案例中，這意味我們不可簡單地以經濟決定論審視「基層」這一身分，而是把「基層」視為身份建構過程中的空洞能指。

4.2 「基層」作為空洞能指

於大眾傳媒及新媒體的表述中，社民連都被視為一「基層黨」，然而，「基層」包含了各式各樣的群體，這些群體不一定有相同的利益，好些時候，這些群體之間充滿矛盾。表面看來「基層」所指的是一群人的社會或經濟地位，借用呂大樂的分析(1998b)，「中產」這個看似一個社會或經濟地位的指稱本身卻難以界定，「基層」如是。就算就這兩個階層作出明確的定義，這亦不意

味它們會以此為身分認同而凝聚起來。那麼這些充滿矛盾的群體是如何被統合到「基層」這一身分呢？

按 Laclau 對民粹主義的分析，集體身分的生成（Laclau 2005）必須把人們沒有被滿足的訴求用「空洞能指」扣連起來，以構成以建制為對立面的人民身分。Laclau 的「空洞能指」是沒有所指的能指（Laclau 1996），於政治身分的生成中，空洞能指指向的是一種從不可能的完全（Impossible fullness），即政治的集體身分指向的是一群人（如基層）從不存在的、本質上的同質性，進一步來說，這「基層」之所以能共同分享這一身分，不是因為他們具有「基層」的本質，而是因為「基層」這一空洞能指包含了同質性（Homogeneity）與異質性（Heterogeneity）之間的張力（Laclau 2005）。「基層」一方面意味以此為身分的人有著多樣訴求，而這些訴求不足以構成他們的共同命運（異質性），必須以對立的他者來建立等同的串連（equivalential chain）（同質性），讓人們有共同的敵人，並為此聯合起來。

於下一節，本研究將檢視「基層」的含義，並指出「基層」這一詞所指的群體有多樣甚至矛盾的訴求，而這些多樣的訴求會透過與建制派或「右派」這一他者的對立來建立等同的串連，並成為社民連的支持者的集體身分。

4.3 社民連的媒體表述：「基層黨」

於大眾傳媒的報導中，社民連有「基層黨」之稱，2006 年 9 月 26 日《明報》

張寶華對黃毓民的專訪的題目就是《為香港，補上一個基層黨》¹⁰，於訪問中，黃表示「十月一日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日子，中共一向維護工人階級，我們選擇這一天誓師，代表我們是左派組織，為基層人民做事。」一如前文所述，長久以來，與中共有政治聯繫的政黨才被稱為左派，但社民連的政治論述就繪畫出幅不同的政治地圖，黃強調「...經濟政策，偏向工商界的是『右』，偏向基層的就是『左』。」，社民連「是基層主導，為基層打拚，為弱勢發聲。」為了強調社民連與民主黨的分別，他說：「你說民主黨也一樣？兩者的分別是我們有一套理論。社民連的理論基礎是社會民主，在歐洲已盛行多年了。」當被問及與職工盟的分別，黃表示：「（李卓人）組的是工會，我們是政治團體。重點是，我們在政治方面比較激進，要求百分之一百的言論自由、百分之一百的民主，不會跟政府在普選問題上拉鋸，我們不需要時間表，是要你立即做得到。」，這一個訪問中，黃清晰地說明了社民連「是基層主導，為基層打拚，為弱勢發聲。」及「激進」的特色。「激進」這一特色將於第五章有較多的篇幅說明，本節將集中說明「是基層主導，為基層打拚，為弱勢發聲。」黃毓民強調「基層」，那什麼是「基層」呢？黃表示「基層在香港佔多數，（社民連）...正是維護大多數人利益」，但這不足以說明什麼是基層，為了解這問題，本研究會先從媒體報導如何扣連社民連與基層入手。

比對一系列有關社民連與基層的報導之後，新移民、貧困家庭、公屋居民、紮鐵工人、小商戶、勞工等為「基層」，其中例子如下：

於上述張寶華訪問黃毓民的專欄把新移民家庭歸類為「基層」；

---

¹⁰ 張寶華，〈為香港，補上一個基層黨〉，《明報》，世紀 人文·關懷·視野／D04，26/9/2006。

於 2006 年 11 月 17 日¹¹，《明報》刊登了社民連建議從外匯基金撥出 200 億元，成立基層生活改善基金，供長期生活在貧困水平的家庭申請資助的報導，於這報導中，《明報》把貧困家庭視為「基層」；

2007 年 6 月 5 日長毛連同捍衛基層住屋權益聯盟成員就房委會廢除公屋租金與入息比例中位數不得超過百分之十於房屋及規劃地政局長孫明揚門前示威的報導中，公居居民自我表述為「基層」的策略使媒體以「基層」表述公屋居民¹²；

於 2007 年 8 月 30 日李先知的專欄文章就把支持紫鐵工潮的社民連歸類為「基層組織」，紫鐵工人被表述為「基層」¹³；

2007 年的區議會選舉中，社民連就自號為基層民主派，以「濟弱扶傾，義無反顧」為口號¹⁴，按社民連過往的說法，傾指的是政策向工商界傾斜。於 2008 年立法會選舉其間，《蘋果日報》就報導了社民連於論壇中的表現，其中被《蘋果日報》分類為「基層議題」就包括了領匯旗下小商戶的困難及勞工議題¹⁵。

這些報導中，基層包括了新移民、貧困家庭、公屋居民、紫鐵工人、小商戶、勞工等。在此，我們大概有了一幅基層包括了誰的圖畫，下一步就得問基層於香港政治的話語中，有什麼意義？

我們可借鑒社民連所經歷的兩場立會選戰來理解基層所指為何。於 2007 年 9

---

¹¹ 〈多黨促外匯基金收益歸庫房〉，《明報》，政情／A14，17/11/2006。

¹² 〈衝擊孫公家門拘捕 5 示威者〉，《明報》，港聞／A18，5/6/2007

¹³ 李先知，〈職工盟啓動七一機制紫鐵工潮難降溫〉，《明報》，港聞／A06，30/8/2007

¹⁴ 〈社民連 27 人出選〉，《明報》，要聞／A03，27/10/2007。

¹⁵ 〈新界西選舉論壇 被指偏幫商家自由黨遭圍攻〉，《蘋果日報》，港聞／A08，22/8/2008。

月的立法會港島區補選泛民內部初選中，基層議題成為了社民連的勞永樂與陳方安生最大的分野。2007年8月，當時民建聯主席去世，因此要為出缺的立法會議席安排補選。補選之初，泛民中有民主黨的甘乃威、公民起動的何秀蘭及社民連的勞永樂都表示有意參加補選，後來甘乃威及何秀蘭於泛民內部初選階段先後退選，而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後來加入泛民初選，泛民初選後來演變成勞永樂對陳方安生。於這一場選戰中，勞永樂及社民連被定位為「主打基層」¹⁶，《明報》與《蘋果日報》的「基層議題」的例子都包括最低工資，而《明報》的「基層議題」例子還有增加綜援、最高工時、由社會利益太傾向財團的一方過度至社會利益分配更公平、公義¹⁷¹⁸，而於初選辯論會中，勞就強調自己屋邨出身的基層背景¹⁹，於報章的報導中，勞因「表明工資保障運動並不可取、會投票支持平反六四動議、同意鼓勵市民上街是最有效爭取普選的方法等」而被評為「立場鮮明」²⁰，而陳方安生則被視為「傾向中上階層」、不熟悉基層議題²¹、較溫和、保守和親建制²²、重溝通²³，陳太自己也表示「過去對基層問題不認識，但會落區了解」²⁴。於初選後，甚至出現了「基層民主派」，如如民協、前綫、職工盟、社民連等表示與陳太過往關係不好²⁵及沒有

---

¹⁶ 〈勞永樂街頭爭基層票〉，《明報》，港聞／A07，17/9/2007

¹⁷ 〈勞永樂街頭爭基層票〉，《明報》，港聞／A07，17/9/2007。

¹⁸ 〈泛民24日初選不設互辯 勞永樂指偏幫將提陳太「政績」〉，《明報》，港聞／A07，17/9/2007。

¹⁹ <http://www.youtube.com/watch?v=gAg247EBU4I>

²⁰ 〈勞永樂有包袱唔認輸〉，《蘋果日報》，要聞／A06，25/9/2007。

²¹ 〈辯論會只簡述政綱政改民生並重陳太支持扶助基層〉，《蘋果日報》，港聞／A08，22/9/2007。

²² 〈勞永樂有包袱唔認輸〉，《蘋果日報》，要聞／A06，25/9/2007。

²³ 〈與勞永樂初選辯論貫徹溫和溝通理念 陳太盼當港人與中央橋樑〉，《蘋果日報》，要聞／A06，26/9/2007。

²⁴ 〈90分鐘辯論有掌聲有噓聲〉，《明報》，要聞／A02，25/9/2007。

²⁵ 李先知，〈陳太甫勝出初選泛民團結顯裂痕〉，《明報》港聞／A06，2/10/2007。

加入陳太助選團的情況²⁶。值得注意的是，於《明報》的報導中指「陳太在論壇中，將要面對社民連、職工盟等較關注的基層議題，例如最低工資、增加綜援等；然而當她通過初選後，卻要面對較多中產和專業界別的港島區選民，陳太的政綱和她在論壇上的言論，很難完全兼顧這兩方面聲音。」的分析²⁷。

於 2008 年的立法會選舉中，基層與中產的分野再次成為傳媒報導的重點，2008 年 7 月 22 日李先知於專欄中指立法會新界西選區中，分別有街工、職工盟、社民連、工聯會、民協及公民黨走基層路線，由於走基層路線的候選名單過多，雖然這些候選人的政治定位不同，但民生政綱大同小異，而「區內的基層市民未必熱中政治議題」，候選人難以靠政治議題突圍，因此公民黨的張超雄改用知識份子的形像，以「中產」自我定位²⁸。這專欄文章把知識份子與中產掛鉤起來，把中產置放為基層的他者。另一方面，報導把民生與政治分割開來，視「基層市民未必熱中政治議題」。

於媒體的表述中，「基層」常處於「大商家」的對立面，《蘋果日報》於 8 月 22 日就報導了 now 寬頻電視所舉辦的新界西選舉論壇的情形，指自由黨於論壇上受「多名代表基層的候選人圍攻」，議題包括「自由黨支持領匯上市，令小商戶被趕絕」、「自由黨在立法會內，反對將勞工假變成公眾假期」、「質疑自由黨是否支持立法會成立專責委員會，跟進調查梁展文事件」、「缺席長者及基層市民的論壇，忽視基層權益」及「自由黨只重減稅，未有先照顧基層

---

²⁶ 〈陳太公布助選團缺商界基層代表〉，《明報》，要聞／A02，09/10/2007。

²⁷ 〈泛民 24 日初選不設互辯 勞永樂指偏幫將提陳太「政績」〉，《明報》，港聞／A07，17/9/2007。

²⁸ 李先知，〈新界西基層牌僧多粥少張超雄轉攻中產突圍〉，《明報》，政情 港聞／A06，22/7/2008。

利益」²⁹，於這報導中，一直被視為代表工商利益的自由黨（雖然自由黨的周梁淑怡一直否認）成為被圍攻的對象。這選舉論壇突顯了工商界與基層的利益衝突。

以上可見社民連是一個「基層黨」，而基層當中包含新移民、貧困家庭、公屋居民、紮鐵工人、小商戶、勞工等多樣的群體。於香港的政治話語中，基層與中產是不同的群體，但不是相互衝突的，但大商家卻是與基層相互衝突。

可是，一般人是否如報章那樣理解「基層」呢？「基層」是否認同他們有共通的利益呢？人們又是否因社民連是一個「基層黨」而支持社民連呢？於社民連的支持者的網上討論中，我們將會看到一部份社民連的支持者的確因為社民連是一個「基層黨」而支持社民連，但好一些的社民連的支持者對基層的理由卻與大眾媒體的理解頗有分別。

4.4 新移民與民建聯－「基層」的含糊性

互聯網上有關社民連的討論，有不少話語都與大眾傳媒的話語相同的。有不少討論都指社民連是為基層工作，於高登討論區，就有這樣的描述：「親力親為支持立法最低工資只有長毛等人／為淫照受害人站出來說話和幫請律師的又只有長毛等人／站在立場可以最能夠幫到香港基層市民的只有社民連這股不怕

---

²⁹ 〈新界西選舉論壇 被指偏幫商家自由黨遭圍攻〉，《蘋果日報》，港聞／A08，22/8/2008。

強權、政府的政黨」³⁰、「長毛係議員中真正了解及關心基層的」³¹等論述，對於社民連的支持者來說，中產形象的公民黨及偏向商界的自由黨是他們的他者甚至敵人，這一點是十分清楚的。其中有社民連的支持者就指「公民黨 - 披著貴族的豺狼... 自由黨一商家佬，往往犧牲大眾市民利益」³²、「公民黨同自由黨本質上非常相似，根本代表唔到基層」³³及「公民黨班大狀識撚民間疾苦咩／社民連呢 d 就真係做野架喇」。甚至有支持者的網名為「捍衛基層權益」。另一方面，值得注意的是，於互聯網上，有好一部分支持社民連的人對大眾媒體話語中的「基層」中的部分人抱持敵視的態度。上文提到，於大眾媒體的表述中，社民連所協助的基層包括了新移民、貧困家庭、公屋居民、紮鐵工人、小商戶、勞工等，於互聯網上的討論，部份社民連支持者卻仇視新移民，在一個引用了《星島日報》的報導³⁴、討論社民連派袋裝衛生紙是否賄選的帖子中，社民連的支持者除了指責《星島日報》為「星狗日報」外，就有人指「派紙巾就（舉）報（賄選）／人地派米派月餅單程證就當睇唔到」³⁵，這裡的「人地」（他們）指的是派月餅及派米的民建聯，這番話指責民建聯派單程證收買選民，事源於2008年9月5日的《蘋果日報》報導指「與中聯辦關係密切的『家庭團聚互助會』（於08年立會選舉前）不斷致電爭居權者，游說投票支持保皇派立法會候選人...只要介紹越多親友按指示投票，就越快取得單程證。」³⁶，雖然有關方面否認³⁷，但這一件事卻在網上發酵。

³⁰ <http://forum5.hkgolden.com/view.aspx?message=1320982>

³¹ http://forum5.hkgolden.com/view.aspx?type=BW&message=1187304&page=7&highlight_id=0

³² <http://forum5.hkgolden.com/view.aspx?message=1352962>

³³ <http://forum5.hkgolden.com/view.aspx?message=1252956>

³⁴ 〈黃毓民斥陳太「棄保論」為幫公民黨〉，《星島日報》，要聞／A02，6/9/2008。

³⁵ http://forum5.hkgolden.com/view.aspx?type=CA&message=1352793&highlight_id=0&page=1

³⁶ 〈左派聲言投保皇派可打尖 單程證變賄選工具〉，《蘋果日報》，港聞／A04，5/9/2008。

³⁷ 〈蘋果抹黑爭居權惹公憤〉，《香港商報》，香港新聞，6/9/2008

於高登討論區中，經常有大量反內地新移民的帖子，主要論點是新移民佔用香港人的福利。如梁漢柱所言，特區政府於居港權爭議中，把新移民及爭取居港權人士描述成「低素質人口」，並指之為香港不能脫離經濟困境的原因（梁漢柱，2001）。這一話語，對社民連的支持者具有相當影響力。有部份社民連的支持者於其他的討論帖中有反新移民的言論，如用戶「西人姬重耳」一方面於立會選舉期間發帖支持黃毓民³⁸，但於2008年年初他／她於一個轉載新移民爭取取消來港七年才可申領綜援的限制的新聞的帖子中繪畫諷刺示威者貪婪³⁹。可見社民連的支持者中，不一定支持社民連所有的立場。這是因為用戶「西人姬重耳」自覺富有嗎？不，他／她其中一篇帖文的題目是「[窮撚望高處]咁收入地位先買得起 42m 既凱旋門」⁴⁰。我們可看出「西人姬重耳」的不滿不是源自不同階級間的歧視。梁漢柱（同上）以「妒恨政治」理解這現象，指於香港經濟走下坡時，政府為節省福利開支，透過不同的論述，明示使用社會福利的人都是不可信，同時政府引入商業管理，使人們需極力證明自己為何有資格使用一些資源，令人們缺乏安全感，在人們缺乏安全感的情況下，所有人都自以為是受害者，並妒恨使用社會資源的人。

妒恨政治往往使（大眾媒體的話語中的）基層之間互相攻擊，甚至是以「基層」之名，把新移民視作為基層的他者進行攻擊。從用戶「西人姬重耳」的例子，我們可以看到「基層」的所指往往是含糊而充滿不確定性，一些表述

(http://www.hkcd.com.hk/content/2008-09/06/content_2149274.htm), Accessed on 6/5/2011。

³⁸ <http://forum5.hkgolden.com/view.aspx?message=1355618>

³⁹ http://forum5.hkgolden.com/view.aspx?type=BW&message=1099243&highlight_id=0&page=8

⁴⁰ <http://forum7.hkgolden.com/view.aspx?message=1870057>

中，「基層」包括了新移民，另一些表述中，新移民卻被視為「基層」的敵人。新移民的經濟及社會狀況沒有使他們自動被視為「基層」的一員。這一方面展示出「基層」一詞的歧義，但歧義只足以證明「基層」是「浮動能指」（意義浮動的能指）（Laclau 1996），這一情況同時展現了「基層」內部的異質性，「基層」一詞包含了一些難以調和的差異，以致於一些話語中新移民被擠出「基層」以外。只有透過塑造一個他者，以統合不同的社群，讓不同的群體理所當然地投入到「基層」與「基層」的他者的對立中，才可使「基層」成為一個集體身分，在這義意上，包含著難以調和的差異、不可能的完全（impossible fullness）的「基層」是一空洞能指（Laclau 2005）（Laclau 指空洞能指與浮動能指是不可能被分辨）。於上述的大眾傳媒的話語中，「基層」是透過與大商家對立來完成，對新移民的妒恨中，「基層」卻是透過與新移民的對立來完成。雖然於不同的同情況下，「基層」的所指不一，但社民連作為一個「基層黨」這一點卻沒有受到多大的挑戰。再次回到高登討論區的例子，社民連的支持者討厭新移民的討論，往往把新移民扣連到民建聯之上，因此基層的對立面除了新移民外，還有民建聯這一建制派的最大政黨。

於上述多樣的「基層」的扣連方式中（基層 vs 大商家（及自由黨）； 基層 vs 新移民（及民建聯）），值得注意的是，自由黨與民建聯都是「建制派」的成員，雖然上述的兩種「基層」的扣連方式與香港「泛民」對「建制派」的政治話語相當接近，於傳統政治話語中屬「建制派」的自由黨及民建聯同樣被視為他者，這不是又一次重複「建制」與「民主」的對立。而是社民連把「左派」的道德高地奪取過來後的民粹主義，這是本研究列出的第一個關於「社民連」

的民粹主義構成：透過「基層」這一空洞能指，社民連統合了不同訴求，包括對新移民的「妒恨」、對領匯的不滿、對公共房屋政策的訴求、勞工權益的訴求等，獲得不同群體的支持。部分社民連的支持者對新移民的不滿可見之於高登討論區上支持與反對社民連的人互相指責對方是新移民的情況。⁴¹⁴²

4.5 小結：「基層」作為民粹主義

創黨之初，社民連就致力打破傳統的建制派（左派）／民主派對立。一方面他們意圖把「左派」的「道德高地」奪取過來，把由親中共的民建聯、工聯會佔據的左派標籤挪為己用，以「基層」黨自居，並與「中間偏右」的民主、公民兩黨分割開來。但「基層」不是一個經濟的分類，而是「空洞能指」。空洞能指本身沒有所指（Laclau 2005），即「基層」沒有本質上的相一致性，只有透過建構共同敵人，不同的訴求才可被統合到「基層」這一旗幟之下。於社民連的例子中，借助政治傳統中泛民對建制的對立，對新移民的「妒恨」、對領匯的不滿、對公共房屋政策的訴求、勞工權益的訴求等，得以暫時穩定到與建制派對立的「基層」之下。

然而，上述的特色並沒有令社民連與傳統泛民展現多大的分別。傳統泛民中，除了民主黨與公民黨外，尚有左翼工人運動的職工盟及街工等團體，因此社民連不是唯一的「基層黨」，因此，被視為「基層黨」不足解釋社民連為何得到如此大的支持。於大眾媒體的報導中，社民連最廣為人知的特色是「激進」。

---

⁴¹ <http://forum3.hkgolden.com/view.aspx?message=3052737&page=8>

⁴² <http://hkg.westkit.net/?p=v&id=2228261>

這一特色，一如「基層」一樣，包含各樣的意義。「激進」這一詞的意義也是透過排斥他者來暫時固定。於社民連的例子中，社民連透過與民主黨與公民黨等泛民政黨對立來確立激進民主派的自我定位。

第五章 制度危機、情感與「激進派」的生成

於上一章，我們看到「社民連」所代表的，不是簡單的階級政治。於本章，我們會看到社民連的另一特性－「激進」，於社民連的興起中起著重要的作用。與「基層」一樣，「激進」語焉不詳，但有著空洞能指的作用，令人們把訴求投射到社民連身上。

於 2008 年選舉前，社民連集中攻擊民主派政黨，指其對改變現狀無能為力，選舉後，社民連則把他們的力量集中於調侃制度，08 年下半年起，發生了一連數宗社民連的立法會議員於議會內進行抗爭的事件，雖然社民連的支持者對這些行動表示支持，認為這些行動不同於傳統民主派一直以來無效的行動。然而，社民連的支持者甚至社民連本身都不太能說出這些行動如何能打破政治困局，因此理性選擇不足以幫助我們理解社民連支持者為何會支持社民連。透過引入對情感（affect）的分析，本研究將指出這些行動能把民主派過往未能滿足的訴求吸納，並於人民主體的生成中起著關鍵的作用。

5.1 情感（affect）－建構他者與主體的必需元素

傳統笛卡兒的主體理論視主體為天賦的，是意義生產者（Grosz 1990），但拉

克勞與之相反，視之為由話語操作的產物。（註 1）拉克勞反本質論的理論視人們的訴求與他們的集體身分無必然關係，只有當訴求被扣連到這一集體身分之上，兩者的關係才被建立起來。拉克勞的模型大概是這樣：社會上有著各式的訴求，這些訴求互不相干（isolated），拉克勞稱之為民眾訴求（democratic demands）。民眾訴求的英語 democratic 與民主制無關，以 democratic 命名是因為這些訴求是由民眾向權力階級提出的，這一詞語暗示這些民眾是被權力所排斥的（Laclau 2005, p.125）。這一眾訴求中的好一些會被滿足，但一些卻不能。這些訴求會互相相遇，被話語操作統合起來。在這話語操作中，這一系列訴求的其中之一會成為其他訴求的名字，而這訴求的名字是一空洞能指，空洞能字會把一眾訴求統合成一個單一的「民粹訴求」。拉克勞寫道：

「某個訴求，也許在開始的時候是一眾訴求的其中之一，有一刻得到了一個出乎意料的中心性，成為一個超越自身的名字，成為超越自己控制的某物的名字，成為自己不能掙脫的『命運』。當一個民眾訴求經過了這一個過程，它成為民粹訴求。這訴求原來的物質特性不能令這過程發生...（這訴求）的名字與其『概念』分離——所指與能指分離。沒有這分離，沒有民粹主義」（Laclau 2005, p.120）

命名把這政治主體內部的異質性暫時以一個空洞能指統合起來，讓人們把別人或自身獨特的訴求視為共同的訴求，把他們不被滿足的訴求投資（invest）到這一共同訴求上，對這訴求進行情感投資（cathexis），把令這個別的訴求成為多元訴求的化身，產生集體利益的想像，令集體身分變得可能。「這是（拉

克勞)所說的統識關係：一個特定的個別性把自己假裝成(assumes)不可能存在的普世性。」(Laclau 2005, p.115)因此集體身分生成的核心是情感(affect)的投資。一個政治集體沒有任何固有的一致性，人們只可把多元的情感投資到個別的訴求之上，產生他們是一個整體的幻覺，成為政治主體。

拉克勞借用這一分析指政治主體的生成是把部分視為全體過程，這與拉克勞一直以來所專注的統識(hegemony)理論相對應，即把個別的訴求表述成所普及(universal)的訴求，那怕普及的訴求根本不存在。因此，所有整全性也是統識性。

在社民連的例子中，一種對更激進路線的要求統合了一眾多元化的訴求，激進派成了一個政治主體的名字，換個說法，「激進派」作為空洞能指統合了一眾不同的訴求。這是如何完成的呢？社民連以「激進」自居，挑戰現有秩序，令人們可把他們不能被現有政治秩序所滿足的訴求投資到社民連上，但「激進」意義多元，可以是一套政治意識形態，也可以是一套行動的形式，因此，我們先得把這詞脈絡化。本研究發現，人們支持「激進」的社民連不是因為他們視這是一套可改變香港現狀的有效方法，而是「激進」這一能指可讓人們把多元的情感投入到其中。於以下的章節，我將把香港的政治脈絡中「激進」的多元意義展現出來。

5.2 回歸後的政治格局、「溫和民主派」與「激進民主派」

要了解有關「社民連」的討論中「激進」的意義，我們先得了解香港的政治脈

絡，以把「激進」的討論本土化及脈絡化。

於回歸後，香港的民主進程倒退，一方面是源自中央政府及特區政府回歸前後的行動，一方面源自民主派自身的不足。

於中央政府及特區政府的一方，第一，他們致力邊緣化及削弱立法會的權力，根據基本法附件二：

「...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對法案和議案的表決採取下列程序：

政府提出的法案，如獲得出席會議的全體議員的過半數票，即為通過。

立法會議員個人提出的議案、法案和對政府法案的修正案均須分別經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和分區直接選舉、選舉委員會選舉產生的議員兩部分出席會議議員各過半數通過。」

（基本法附件二）

同時間，立法會的選舉安排，包括地方直選的比例代表制、23 個功能組別的公司或團體票安排（2008 年立法會共有 60 個議席，30 個為地區直選議席，30 個為功能組別議席）及 1998 年及 2000 年選舉委員會議席（1998 年立法會選舉中有 10 席由選舉委員會選出，2000 年有 6 席），對「建制派」的民建聯、自由黨、港進聯等政黨有利，成名（2004）指如 1998 年立法會的六十席完全由直選產生，民主派可獲 39 席，但由於 1998 年的選舉中，功能組別佔 30 席、直選 20 席、選舉委員會佔 10 席，最後民主派佔 20 席，建制派佔 40 席，因此，1998-2001 期間，民主派所有要求加快民主化的方案都不能獲得通過；

另一方面立法會議員只有獲得行政長官書面批准才可提交任何可為政府公帑負擔的議案（立法會內務委員會 1998）。上述三項安排，令立法會難以影響政府的施政。

於地區層面，回歸後政府回復區議會委任制，董建華及曾蔭權連續三屆用盡 102 個委任議員的名單，令委任議員佔區議會議員約五分之一，其中不少為建制派的成員。2000 年年底，負責市政事務的市政局及區域市政局被廢除。這一方面減少了民主派的收入，另一方面市政局一直起著監察政府的作用，為不少立法會議員的訓練場，廢除市政局令這一場所消失（同上）。

政府的表現也令市民沮喪。金融風暴後，政府一直表現得無能為力，長時間的失業率高企及負資產問題一直未得到解決；2003 年，特區政府於市民反對下強推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反映了政府往往未能掌握民意。馬嶽指出行政當局是由政府、商人與政治團體所組成的執政聯盟，但三者的利益各異，政府往往要滿足不同的利益而令施政欠理念而混亂；而與政府關係密切的民建聯及工聯會因其親中背景而與好一部份的市民疏離，而未能起反映民意的作用（Ma 2007）。具體來說，對政府的滿意程度由 1997 年下半年的約 40 分，下跌至 2003 年 7 月的約 10 分（Sing 2004, 港大民意網站 2011）。

對政府的不滿及民主的訴求於 2003 年的七一遊行到達了一個頂峰，但這不意味民主運動有所推進。2003 七一後不但沒有出現一場強而有力的民主運動，而 2005 年年底的政改方案也按該年 4 月人大的決定否定 2007/2008 年特首及

立法會普選的可能，也沒提出普選的時間表，這一方案最後於立法會中不受泛民支持而遭否決，香港民主運動並無寸進。

民主派方面，其自身就充滿著各種的不足，例如民主派的政黨規模細小（於2000年，泛民各黨黨員都不足1000人），而且動員能力薄弱，泛民於選舉中所得的選票比例由回歸後開始慢慢下跌，這一方面是源自立法會與政黨對金融風暴後的經濟不景氣顯得無能為力，另一方面，民主黨本身都發生的分裂（其中一部份人後來成為社民連的成員），令民主的發展更艱難。

對民主派來說，更嚴重的問題是他們在傳統議會內爭取、以和平理性、重視與中央溝通的路線面臨一個道德危機。2009年2月黃毓民到台前打斷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宣讀預算案。事後不但傳統的建制派及獨立議員遣責社民連的行動，民主黨及公民黨也召開記者招待會批評社民連，並建議修改議事規則。高登討論區就這行動是否正當而討論，當中有人指責社民連使用暴力，用戶「愁雲慘霧」就回應道：

- 「1.所謂的和平理性反對而家咪公民民主兩黨做緊啦,成效如何?政府重視嗎?
- 2.他們的建議你不如拿出來說那一個沒有建設性?香港最多得就係因為有太多你呢種終日搶佔道德山頭而忽略行為背後的人才會使香港政制一沉不起」⁴³

「愁雲慘霧」的「搶佔道德山頭」所指的是民主黨與公民黨以及其他指責社民連暴力的人強調自己「和平理性」，把自己立於道德山頭。「愁雲慘霧」的回

---

⁴³ http://forum7.hkgolden.com/view.aspx?type=CA&message=1602018&highlight_id=0&page=4

應是對民主派傳統「和平理性」路線的質疑：那是沒有成效的、政府不重視的、使香港政制一沉不起。

「愁雲慘霧」的質疑是典型對「和平理性」路線的質疑。正如前文所言，政制的安排令民主派不可能佔議會內的多數，而議員要提出任何動用公帑的動議也得要獲得特首的准許，就算議案能提出亦不易被通過。「和平理性」路線欠缺有效的工具滿足各式各樣的訴求，令這路線失去道德領導的能力。

我借用拉克勞與穆芙較早期的理論來說明「道德領導」這概念，在他們的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2001) 中指一個行動者如要獲得道德及知性領導 (moral and intellectual)，他們需要讓社會不同的部份分享共同的意念與價值：

「...政治的領導地位可建基於一眾利益的巧遇 (conjunctural coincidence of interests)，當參與的不同部份維持他們分開的身分認同，要獲得道德及知性領導就需要讓幾個不同的社會部份享共同的意念與價值——或者，以我們的術語來說：一個橫跨不同階級的主體位置...」 (Laclau & Mouffe 2001, p.66-67)

我把這一段作一個民粹主義的演繹，拉克勞 (2005) 的民粹主義希望解答的問題是政治集體身分的形成，超越以經濟狀態定義階級的階級理論，因此，一個民粹主義對道德 (及知性) 領導的演繹應該與民粹主義的分析一樣，以訴求作

起點，道德（及知性）領導能橫跨不同的訴求，一個能作道德（及知性）領導的群體，需讓不同的訴求把情感投射到他們之上，讓一眾訴求扣連成一個跨訴求的主體。「愁雲慘霧」的話折射出來的狀況是溫和民主派正失去這一道德領導的位置。即是社會上不同的訴求再不相信溫和民主派能滿足他們的訴求。反之他們開始相信激進強硬的路線可滿足他們的訴求。香港社會出現了一種政治道德秩序的轉變。這可見於政治學者馬嶽於他的評論文章（馬嶽 2008）寫道：「讓我引述蕭若元在社民連造勢大會上的說話作結（這片段 YouTube 上點擊已近 4 萬次）：『有人問社民連的鬥爭手法是否太不守規則。我舉一個例子，如果有兩個人下棋，一個照足規則，一個的象可以過河，還每次可以行兩步；你還規規矩矩的跟他下，還下了 10 年，你就是個傻子，是個白癡！』你不一定認同這個分析，但我得同意，he has a point。」，馬嶽引用蕭若元的下棋論，為的是說明他同意民主派以往循規蹈矩的方式似乎是不智的，正因這判斷，「溫和」民主派的路線漸漸失去道德領導地位。

香港的政治秩序正陷於這樣的危機中：政府的施政不得人心，而立法會受其憲政地立所限，行政只受到立法會十分有限的監察，一直以來身為反對黨的民主派只能對政府作十分有限的制衡。因此，政府施政的問題往往不能靠制度或現行的政治秩序修正。民主派傳統的「和平理性」，議會內爭取的路線受到質疑，慢慢失去其道德領導的地位，特別是社民連的支持者不再以「和平理性」為道德，他們認同另一種更能統合不同訴求的道德綱領，即社民連的激進路線。

5.3 政治危機下的話語操作

這香港的政治危機中，我們可看見一連串不能被滿足的訴求，如上文中對民主的訴求、對財政預算案的不滿（比方說 my radio 上蕭若元批評 2009 年財政預算案沒有解決失業問題的一集《問乾坤》，截至 2011 年 9 月 7 日有約 3000 收看數與 10 個用戶的一致好評⁴⁴）、對民主派批評社民連的不滿、對更強的姿態的渴求等，那還有什麼訴求呢？著名的擲蕉事件透露了一些端倪，黃毓民當選後，2008 年 10 月 15 日，特首曾蔭權於施政報告提出把高齡津貼（生果金）由每月 625 元或 725 元加至一千元，但爲了減少有關開支，要就生果金加設資產審查，在場的黃毓民與陳偉業隨即發難，於議事堂上大罵曾蔭權，因此被立法會主席命令離開議事堂，黃毓民被帶離議事堂前向主席枱投擲香蕉，香蕉沒有擲中任何人，但有關行動的片段及報導被廣泛流傳⁴⁵。擲蕉事件翌日，《蘋果日報》李怡的社評〈特首施政卻不知何謂核心價值〉⁴⁶的開首就提到社民連議會的行動，他寫道：「儘管筆者認爲鬧場不可取，但一句『曾蔭權無能』卻道出了不少市民的心聲。」，他陸續把過往曾蔭權失職的紀錄羅列出來，當中包括處理外傭稅的混亂，控制油價，在迎聖火活動中警方對展示標語者選擇性執法，對民間電台嘉賓的選擇性檢控，淫照風暴的「警」字兩個口等，他續道：「施政報告發表前的民調顯示，只有一成四市民對施政報告有較高期望，而七成半的人則是期望『一般』及『低』。這說明不少市民對政府已到了『哀莫大於心死』階段。激進的社民連反映了部分市民的這種心態。」

⁴⁴ http://www.youtube.com/watch?v=vECoQ_fO3Jw

⁴⁵ 事件發生後不同政黨就資產審機制表示反對，傳媒同時抨擊特首刻薄及黃毓民粗野，一星期後政府宣佈取消入息及資產審查

⁴⁶ 李怡，〈特首施政卻不知何謂核心價值〉，《蘋果日報》，專欄專論/A14，2008 年 10 月 16 日。

李怡的「哀莫大於心死」指的是市民對政府可自我修正沒有希望。於這一脈絡下，社民連強硬、重視動員市民的路線則成了被政府，以至傳統民主派路線所挫敗的訴求進行情感投資的對象。社民連的話語操作一方面對政府進行激烈的批評，另一方面，社民連也批評民主派的傳統路線。其中，社民連 2009 年發表的《五區總辭，全民公決，2012 年雙普選政治說帖》（下稱《說帖》）是一個有力而整全的文本。此事源於 2007 年人大否決 2012 雙普選的可能，特區政府將於 2010 年提出政改方案，社民連指這一方案將無路線圖及未能帶來普選，2009 年 9 月社民連建議發起「五區總辭」運動，讓人民表達他們 2012 雙普選的意願，社民連發表了《說帖》以說明這一行動的背景、理據及方法。

《說帖》劈頭便寫道「香港民主運動舉步維艱，主因之一是缺乏民眾的廣泛參與。民眾未有廣泛參與的因素很多：...但一個更重要的原因是：本地民主運動往往停留在表面的代理層次，未能令民眾透過親身參與來實踐理念、進行反思，令他們明白群眾的力量，可以改變政府政策及改善自己的生活...」。內文進而指民主黨已失去活力：「議會內的民主派在本土民主運動的關鍵時刻，起不到帶頭的作用...當人民力量充分展現出來的時候，議會內的民主派人士並沒有以更強的姿態迫使特區政府收回廿三條立法...若非自由黨突然看出順應民意的巨大政治前景而陣前倒戈，廿三條立法草案若通過的話，這六年的香港真不知變成何種局面。」及後，文章指六年後「新政黨、新青年、新網絡，與及重拾活力的一些社運機構，及許多一如既往默默耕耘的非政府組織，便構成了回歸後，尤其是 03 年後香港新公民社會的主要畫面」，「取代逐漸老化失卻活力的民主黨」。

社民連的《說帖》是對「和平理性」及議會內爭取路線十分嚴苛的指責，直指過往路線的不足，是對過往路線的挑戰，也是一種獲取道德及知性領導的嘗試。我們可把這《說帖》視為兩種道德及知性領導的話語之間的角力。一種是傳統「和平理性」，議會內爭取的溫和路線，另一種是強調群眾力量的抗爭路線。於社民連的民粹話語操作中，對新的、激進路線的渴求是民粹訴求，其背後是一系列多元化的民眾訴求。接下來，本研究將會把目光移到社民連如可操作他們的政治話語，使人們可把他們的訴求投資到社民連這「激進派」上。

5.4 我們是「激進派」－「社民連」所承載的能量

社民連常於傳媒訪問中自詡為「激進派」，而不少人都指責社民連「激進」，但這一字眼甚少被清楚定義。威廉士（Williams 1985）曾對「激進」一詞作的整理，指出激進一詞具多重意義。於英語中，激進（radical）一詞於十四世紀開始成為形容詞。其詞根為 *radix*，意為「根」，因歷史原因，「激進」一詞意義多元，政治光譜上的左與右、行動綱領由改革到革命都可被稱為「激進」，於華語世界，**Radical** 多被譯成「激進」一詞，但「激進」多具負面含義，「激」就有「激動」、「（過於）激烈」等負面含義，於八十年代末的台灣，傅大為等一批左派學者，借用了當時美國一本台灣地下左派雜誌的譯法，把 *radical* 譯為「基進」（傅大為 1995），以強調 *radical* 中 *radix* 的詞源，對傅來說，「激進」表現的是「心理狀態」，而「基進」所指的是與當時台灣盛行的自由主義有別的社會位置，多年來「基進」一詞漸漸普及，成為不少港台

「基進」人士的自稱。

而在香港「基進」為一些民間社會的參與者所使用，但我不會在此詳述「基進」於香港的意義，因社民連多以具「激動」、「激烈」含義的「激進」自我表述。透過分析社民連的自我表述，社民連口中的「激進」有四種含義：

1. 一種以街頭抗爭為藍本，粗野的政治行動風格；
2. 對政府及中央政府不妥協，要求它們立即滿足市民政治訴求要求的政治姿態；
3. 與「溫和」泛民不同的運動模式－反對參與現有而不公的機制，強調動員民眾的運動模式；
4. 偏向基層的政治理念。

下文將略述社民連如何建立這一激進的形象

5.4.1 一種以街頭抗爭為藍本，粗野的政治行動風格

於社民連成立以前，社民連其中幾個政治明星都有「惡人」之名，黃毓民是以說語狠辣聞名的電台名嘴，陳偉業出身自民主黨的少壯派，以常罵人聞名，

「長毛」梁國雄及「阿牛」曾健成長年參與社會運動及多次因此被捕，而曾健成也是多次被指為非法的民間電台台長。於《蘋果日報》的專訪中，陳偉業指社民連是「『香港最激進的組織和左派，是旗幟鮮明的反對派』，不排除用合

法公民抗命，以衝擊法例手段爭取公義」，強調陳以往衝擊警方防線的往績，專訪指陳偉業及其黨友為「惡人」，與中央對著幹⁴⁷，社民連立黨後，就多次向政府擺出強硬的態度。社民連也不時以遊行表達訴求，並因不時與警方衝突，如 2007 年 3 月 10 日，警方罕有地引用《公安條例》⁴⁸，反對社民連舉行了一場反特首選舉的集會，社民連無視警方反對，於違法的情況下舉行該次集會，警方於當晚以鐵馬包圍遊行的集合地點維園，及後和平散去⁴⁹。於 2007 年 12 月 29 日，2012 普選被人大否決後，禮賓府門外發生示威，梁國雄於現場焚燒車胎，後警方以襲警罪拘捕梁國雄及陶君行。除街頭抗爭外，社民連不時以粗野的方式抨擊政府官員，2007 年 7 月，政府發表政改綠皮書，黃毓民出席港大學生會的街頭論壇時，就以粵語髒話指綠皮書「搵笨 X」⁵⁰，數日後，梁國雄就同一件事，以假魚眼潑向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林瑞麟，黃毓民更進一步說梁國雄不夠「激」，要是他，他會潑糞⁵¹。

這直接而粗野的表達，於 2008 年立會選舉令黃毓民得到更大的支持，2008 年 8 月 19 日，now 新聞台所舉辦的立會選舉論壇中，民建聯的鍾港武在提問環節以匯標事件（一宗懷疑騙取議員津貼的醜聞）質問涂謹申，但當涂要發言時，卻遭鍾打斷，並要求與涂同名單的林浩揚回答，結果涂在整個環節都沒機會回應事件。之後黃毓民就民建聯推薦的副局長及政治助理中有人持外國護照

---

⁴⁷ 〈中環有落...當年「滿江紅」〉，《蘋果日報》，專欄專論／A23，10/8/2006。

⁴⁸ 警方以照明不足為由反對該遊行，但晚上遊行並非罕見，該遊行人數不多，因此城市大學專業進修學院學術統籌未立功就指警方的安排不合理。〈警方禁社民連今晚遊行 指造成塞車 梁國雄寧犯法如期遊行〉，《明報》，港聞／A08，10/3/2007。

⁴⁹ 〈警包圍 社民連遊行難產〉，《明報》，港聞／A10，10/3/2007。

⁵⁰ 李八方，〈隔牆有耳：毓民爆粗鬧綠皮書〉，《蘋果日報》，專欄專論／A19，16/7/2007。

⁵¹ 李八方，〈隔牆有耳：林 D9 巴之閉〉，《蘋果日報》，專欄專論／A21，30/7/2007。

質問民建聯，黃以同一的手法不斷打斷民建聯候選人的回答，並明言「一分鐘你哋都唔畀涂謹申講，我做乜要畀你答呀？」⁵²這一片段後來於 youtube 上瘋傳，黃毓民的表現大受好評。於 2008 年選舉後，發生了上文所述的擲香蕉事件，社民連的議會也常於議會中喝罵官員。

如前文所言，社民連的政治話語企圖以一種肢體及語言上的激進的姿態來取代傳統泛民的道德領導地位，而道德領導是建基於社民連吸納訴求的能力。那末，社民連粗野的行動風格吸納了什麼訴求呢？我們可在互聯網上的討論找到答案。

不少支持社民連粗野的行動的人不滿的是特首曾蔭權本人及對現行政制未能制衡曾氏的的權力而忿怒，高登用戶「天下 Jer 霸。」於擲蕉事件後就開了一以「支持 毓民 掙蕉 既 人 入 黎 – 三大理由」⁵³為名的帖子，他留言道「一：首先，毓民佢掙蕉冇掙到其他人 / 二：掙蕉既意義係充份表演出毓民認為特首既無能，不能容忍， / 於是用行動代替說話，這更顯示出當時毓民對特首處事方面既忿怒 / 三：大家睇野唔好睇表面，事出有必，如果唔係特首咁型搵，毓仔點會掙蕉先 / 有時既野，法律規舉（按：矩）是很重要，但（逆）（按：應為「亦」，「天下 Jer 霸。」不會輸入此字）不可以凌駕於人性上既情感表達」，用戶「ky454」表示「選佢都係要佢鬧曾特狗班仆街 / 呢次佢交到野，我好滿意」⁵⁴。

---

⁵² 〈九龍西直選論壇民建聯抹黑兼霸道社民連斥無恥〉，《蘋果日報》，港聞 / A08，20/8/2008。

⁵³ <http://forum7.hkgolden.com/view.aspx?message=1409383>

⁵⁴ http://forum7.hkgolden.com/view.aspx?type=BW&message=1409443&page=2&highlight_id=0

正如上文所言，香港政治的一大難題是立法未能有效制衡行政的施政，社民連的行動風格成爲了一個制衡行政的表演，讓「制衡行政」的訴求得不到滿足的人能把他們對行政的憤怒投資到社民連之上。但實際上黃氏的行動不能改變曾氏原來的政策，這只是忿怒的表達，正如「ky454」所言「選佢都係要佢鬧曾特狗班仆街」。但對社民連的行動風格的支持所帶來的不只是對這種悅目的表演的追求。一些對這些風格的支持帶來了一些可持續的行動。於高登討論區中一個商討是否當社民連義工的帖子中，有人表示「只想激進,不想派傳單」⁵⁵，上文提到「激進」有多種不同的含義，這裡的「激進」又指什麼呢？同一篇帖子中，其他用戶有以下的對話「要做 d 咩（問號圖示）」（強力膠子）；「燒車胎（舔舌圖示）（按：表示喜歡）」（新雲達不來梅）；另外用戶「昂久」則表示要「屌柒班維園阿伯」⁵⁶。

雖然「屌柒班維園阿伯」看來與社民連粗野的行動風格相似，兩者都是以直接而粗俗的方式向對象表達不滿，但「屌柒班維園阿伯」與社民連的風格不一定有聯繫，社民連的這一風格針對的是政府、建制派甚至是「溫和民主派」，但在互聯網上的社民連支持者卻因社民連粗野的行動方式而把他們對社民連的支持與他們對「維園阿伯」的不滿扣連起來，形成要求激進路線的民粹訴求。

互聯網上的「燒車胎」及「屌柒班維園阿伯」也許是人們對更有效的行動的渴望，也許是長久以來對「維園阿伯」厭惡的一種誇張表達，於現實的實踐，對

---

⁵⁵ <http://forum5.hkgolden.com/view.aspx?message=1173105>

⁵⁶ 同上

更有效的行動的渴望演化成一種對政府運作有更強干擾性 或更能挑戰政府權威的街頭行動，如近兩年六四燭光晚會後的中聯辦門外集會、七一遊行後於政府總部門外的留守，其中都不乏社民連的支持者及黨員。對「維園阿伯」厭惡演變成著名的「維園行動」。所謂的「維園阿伯」是一群活躍於香港電台製作的《城市論壇》的長者，他們不少立場親建制。於 2009 年十二月一群年輕人開始現身城市論壇，立場多是反建制，其中一些人是社民連的支持者及黨員，如著名的任亮憲後來加入了社民連（後來跟隨黃毓民退黨），這些行動把多元的聲音帶到《城市論壇》這一公共空間中，也讓更多的年輕人參與公共生活。

社民連這粗野的風格為香港固有強調「和平理性」的政治秩序帶來衝擊，開啓了另類行動的可能性。當然開啓這些可能性的不只社民連，如「本土行動」、「八十後反高鐵青年」群體等也開啓了這些可能性。但不少 人對更有效的行動的渴望與對「維園阿伯」、民建聯（見於黃氏斥喝民建聯候選人片段的瘋傳）等群體的不滿都被投資到社民連之上。

5.4.2 對政府及中央政府不妥協 要求它們立即滿足市民政治訴求的政治姿態

於《明報》張寶華 2006 年訪問黃毓民的專訪中就已用激進形容社民連，這一專訪中「激進」有兩個面向，一方面激進是指一種政治理念，指偏向基層的政治理念、福利主義等，另一方面，指向把事情「推向極端」，要求「要求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百分之百的民主，不會跟政府在普選問題上拉鋸，我們不需要時間表，是要你立即做得到。」，並與北京對話而妥協的其他黨派作對

立⁵⁷，因此社民連的不妥協具體可體現為兩方面，其一，社民連強調以社會運動而非協商爭取民主，其二，社民連拒絕參與他們攻擊的特首選舉及功能組別選舉。

於 2007 年的立法會港島區補選的補選論壇中，是否妥協成為了勞永樂與陳方安生間的差異，陳方安生拒絕明言是否堅持平反六四，指 2012 普選議題有妥協的餘地，並指爭取普選「上街不是唯一的行動」，但「一定要取得中央的認同」，這顯然是針對社民連街頭抗爭及與中央對著幹的形象，而勞永樂則堅持平反六四、2012 普選不可妥協⁵⁸。勞強硬的語氣及立場，被指為「忽然長毛」⁵⁹，意味勞永樂一改以往溫和甚至親政府的路線（勞於 2003 年 23 條立法一事支持政府），加入社民連後，走其黨友「長毛」梁國雄立場鮮明而強硬的路線。

陳勞辯的內容被 myradio 上載到 youtube⁶⁰，我們可從一些評論中看到人們把什麼感情投入到他們對社民連的支持中。youtube 用戶「halimax」評論道「大陸人..／香港當時只係殖民地..用用你的腦袋..殖民地會有普選嗎?／既然一黨專政那么好,你有本事就刪除特區政府..／是不是以前沒有普選,現在就不應該有?／重有,大陸供港既"所謂"淡水全是尿水..要經過多重過濾..／香港中你地幾十年發展..你們現在還是落後...生活在沒有人權的地方有資格批評我們嗎?有 13 億人可惜沒有質素..經濟在近年才有一點成績不覺得慚愧嗎?」，他的發言一方面是

---

⁵⁷ 張寶華，〈為香港，補上一個基層黨〉，《明報》，世紀 人文·關懷·視野／D04，26/9/2006。

⁵⁸ 〈泛民初選論壇戰勞永樂陳太：2012 普選可妥協〉，《明報》，要聞／A02，25/9/2007。

⁵⁹ 〈被指當年傾斜大財團陳太：從不攀附權貴〉，《明報》，港聞／A03，25/9/2007。

⁶⁰ <http://www.youtube.com/watch?v=gAg247EBU4I>

回應另一用戶「WhenTheBellRings0908」，他以簡體中文指港英時代沒有普選，只要中國切斷香港的淡水供應，香港就遭殃。另一方面，我們也何看到 halimax 對中國政府的不滿，他強調中國落後，香港先進。以香港抵抗大陸這一論述並不是新的論述，但社民連的論述卻表現出對大陸的不退讓。九十年代後，隨著中國經濟成功，香港的民主運動失去對抗大陸的信心（Sing 2004）。溫和民主派的話語也強調「要取得中央的認同」，因此未能吸納一些對中央強烈不滿的情緒，強硬而不妥協的社民連的出現正好可吸納溫和民主派未吸收的對中央不滿情緒。

5.4.3 與「溫和」泛民不同的運動模式－反對參與現有而不公的機制，強調動員民眾的運動模式

除了以強硬的手段攻擊政府及建制派外，社民連也多次高調地攻擊其他泛民政黨，甚至於《蘋果日報》的報導亦有「一向不咬弦的社民連與主流民主派」之說⁶¹，社民連多次抨擊公民黨的梁家傑參加由選舉委員會投票的特首選舉，於特首選舉委員會提名期結束之時，《明報》就刊出了社民連的陳偉業、梁國雄及前線的劉慧卿以「不參與小圈子選舉」為由，表明不會於 2007 年的特首選舉提名梁家傑⁶²，及後，《明報》刊登了社民連主席黃毓民以「自相矛盾、自毀城牆」批評公民黨和民主黨參加選委會選舉，並批評他們是「是出賣了 03 年參加 7.1 大遊行、爭取 07 和 08 年普選的市民！」，聲言「我們不應該為

---

⁶¹ 〈出席泛民武林大會放下歧見參加協調 黃毓民擬出戰硬撼葉劉〉，《蘋果日報》，港聞／A06，22/8/2007。

⁶² 〈1107 人爭 708 選委席位 泛民 156 人搶灘戰況空前〉，《明報》，港聞／A14，9/11/2006。

（民主派）團結而相同，而應該因相同而團結起來！」⁶³，後來黃再批評公民黨及民主黨參選是出賣民主，增加小圈子選舉的認受性，「飲砒霜杜老虎」

⁶⁴。

除了社民連以激進自居外，這一論述於香港的政治脈絡中漸漸普及起來，以致公民黨與民主黨以溫和民主派自居。人大常委會於 2007 年年底否決 2012 普選，於數日前的街頭論壇，黃毓民就指如其他泛民成員接受 2017 年普選，不如「返屋企瞓覺」，同日，公民黨湯家驊和民主黨黃成智均表示，如 2017 有普選可接受，湯並揚言，如人大不提 2017 有雙普選，他會加入社民連，香港再無溫和民主派⁶⁵。在此可見溫和民主派與以社民連為代表的激進民主派的分野已確立起來。

在溫和及激進民主派這一基礎上，社民連於 2008 年的立法會選舉建立了他們攻擊「溫和民主派」的政治話語。黃毓民於報名參加立法會九龍西選區選舉時，就出言批評公民黨參加功能組別及特首選舉，是「面目模糊的民主派」，並以「不要面目模糊的民主派」為口號，批評同區的其他泛民議員，質疑民主黨涂謹申和劉千石在立法會的工作及民協馮檢基「又傾又砌」的政治立場，公民黨反擊這些指責時，都離不開這「溫和」與「激進」的對立，同於九龍西選區出選，公民黨的毛孟靜指，公民黨溫和理性，針對社民連的風格，她指公民

---

⁶³ 〈曾蔭權梁家傑支持度 6 比 1 社民連不滿梁參選揚言「踩場」〉，《明報》，政情／A15，24/11/2006。

⁶⁴ 〈社民連線燒通知書堅拒小圈子選舉〉，《明報》，港聞／A11，8/12/2006。

⁶⁵ 〈泛民周六遊行入境大樓止步批評警方限制表達自由〉，《明報》，要聞／A03，26/12/2007。

黨不輕易「抬棺材、燒車胎」，並說希望泛民主派不要自相殘殺⁶⁶。

於 2008 年立法會選舉前後，互聯網上不同社區的討論其實沒有很多人攻擊民主黨及公民黨是「面目模糊的民主派」。反之，互聯網上一些對民主派路線的批評都來自對「和平理性」路線的質疑。高登討論區的用戶「Vivant」於一討論黃毓民擲蕉事件的帖子中表示「有人話抗議無用，又話對事件無幫助，係香港人同野（原文如此）唔俾得人鬧，古時皇帝就可以咁做。」⁶⁷；有些社民連的支持者則表達了默默工作的但被別人抹黑的沮喪：「唔偏激點引起你地注意，你認為默默做事有用咩？一樣被民 x 聯（按：民建聯）抹黑」⁶⁸。

和平無用論所針對的對象不但是溫和民主派，還有建制派，人們一方面感嘆民主派過往的工作無用，一方面對被民建聯抹黑感到惋惜。社民連透過把自己表述成有效的行動者以吸納這些支持，如黃毓民的「飲砒霜杜老虎」與「接受 2017 普選不如返屋企瞓覺」都是批評民主派的行動沒有效果。透過這一話語操作，社民連把這些感嘆及惋惜統合到對有效的行動方式的共同訴求中。

5.4.4 偏向基層的政治理念

威廉士（William 1985）指 1950 年代美國的政治脈絡把左翼政治稱為「激進」，這左翼政治強調社會低下層利益，由政府進行調節及再分配，社民連的政治論述也受這一發展影響。社民連一直以左派自居，黃毓民於接受張寶華的

---

⁶⁶ 〈黃毓民斥公民黨面目模糊〉，《明報》，港聞／A10，30/7/2008。

⁶⁷ 同上。

⁶⁸ <http://forum5.hkgolden.com/view.aspx?message=1354945>

訪問時就把為基層打拼與「激進」掛鉤，以之為社民連定位。如第四章所言，社民連把自己塑造成基層黨，把對新移民的「妒恨」、對領匯的不滿、對公共房屋政策的訴求、勞工權益的訴求等多元訴求統合起來。這些訴求沒有一致性，由為新移民爭取福利到妒恨新移民，由小商戶利益到到紮鐵工薪金到貧困家庭福利，有些訴求互相矛盾，但社民連的論述都以基層之名統合這些訴求。無論社民連的政治論述也好、互聯網上支持者的討論也好，他們也把社民連說成能代表基層的政黨，如黃氏指「我們是基層主導，為基層打拚，為弱勢發聲。你說民主黨也一樣？兩者的分別是我們有一套理論。社民連的理論基礎是社會民主，在歐洲已盛行多年了。」社民連的政治論述與民主黨及早期的公民黨不同。舉例說，在領匯問題上，民主黨對領匯上市表示支持，但當時仍是獨立人士的社民連政治明星梁國雄就表示反對領匯上市，令梁氏代表了民主黨以外的經濟理念的代表。社民連立黨時的政治論述就因民主黨及公民黨的經濟政策把它們說成中間偏右，社民連就以左派、或「激進派」這一名字吸納民主黨及公民黨的經濟政策未能吸納的訴求。社民連的支持者因社民連的話語有「親力親為支持立法最低工資只有長毛等人／為淫照受害人站出來說話和幫請律師的又只有長毛等人／站在立場可以最能夠幫到香港基層市民的只有社民連這股不怕強權、政府的政黨」⁶⁹、「長毛係議員中真正了解及關心基層的」⁷⁰等說法。

社民連的政治論述把照顧貧困家庭、為新移民爭取福利、憎恨新移民、為紮鐵工爭取加薪、為淫照案被起訴的人討公道等多元而有時矛盾的訴求統合成一種

---

⁶⁹ <http://forum5.hkgolden.com/view.aspx?message=1320982>

⁷⁰ http://forum5.hkgolden.com/view.aspx?type=BW&message=1187304&page=7&highlight_id=0

強而有力的聲音，這種聲音指向大企業與基層之間的衝突，讓打倒官商勾結成為民粹訴求，讓上述一眾訴求投入到反官商勾結中（雖然上訴的一些訴求，如憎恨新移民也許和官商勾結關係不大），如第四章所言，社民連建立了大商家與基層間的對立，這對香港來說有獨特的意義。自九十年代初起，雖然本港商界極力阻攔香港的民主化，但民主派害怕針對商界的話語看似階級政治，讓港人的恐共情緒轉移到民主派身上，因此極力避免攻擊商界（Pepper 2008）。社民連則直接攻擊商界，直接參與紮鐵工運，指責政府政策向商家傾斜，打破了香港政治長久以來的禁忌，令反官商勾結成為香港民主運動中的重要組成部分。

然而，這一形式的民粹主義是危險的，其中一個為人所熟識的問題是，排斥新移民有機會成為統合其他訴求的民粹訴求，令新移民成為代罪羔羊，雖然這與他們的政策綱領違背，但社民連的民粹話語未能阻止這情況發生，不少社民連的支持者都排斥新移民，二零一一年的派錢爭議中，新移民遭到無理的指責。甚至出現了一些長久以來支持社民連的人指責社民連的情況，如高登用戶，一直以來支持社民連的「路人甲 xxxx」⁷¹就指責社民連為新移民爭取 6000 元特惠金⁷²。這一例子能把這民粹扣連的危險性充分地顯露出來：一個政黨能透過民粹扣連獲得支持，不等於它的意識形態得到認同，以社民連來說，左翼的社民連成功透過民粹扣連獲得支持，不意味社會思潮的左轉。

5.5 激進的重要性

---

⁷¹ 關於「路人甲 xxxx」對社民連的支持，可見參考第六章。

⁷² http://forum7.hkgolden.com/view.aspx?type=CA&message=2920379&highlight_id=0&page=7

於民粹主義分析中，對立陣線是一個必需的前提。這圍繞「激進」的民粹主義的第一特點是以「溫和」為對立面的「激進」。這可充分地於社民連最成功的「沒有抗爭，哪有改變？」口號中體現出來。這句口號的「抗爭」對象固然是特區政府及中央政府，而「沒有抗爭，哪有改變？」則是對「溫和民主派」的詰問，我們可把這口號翻成一句否定句—「沒有抗爭，沒有改變！」，那就是社民連對「溫和民主派」的直接攻擊，同理，我們也可把這一口號翻成肯定句—「有抗爭，有改變！」，變成社民連所許的承諾。

社民連的「激進」路線對社民連支持者的重要性是什麼呢？「激進」的重要性，並不在於是改變現狀的有效計劃，就算社民連有其獨特風格的抗爭方式，社民連本身都未能指出這一方式如何能成功爭取民主或滿足各式各樣的訴求。最明顯的體現可見於《五區總辭，全民公決，2012 年雙普選政治說帖》，如上文所述，由於人大於 2007 年否決了 2012 年普選的可能，泛民中已有總辭舉行變相公投之說，社民連於 2009 年把這一建議再度提出，建議以五區總辭作手段，讓五個立法會選區的議員辭職，令政府舉行補選，民主派可派人參選，並以 2012 普選這單一議題為政綱，把補選視為這一議題的變相公投，讓人民展示其意願，爭取 2012 年雙普選，文章中，我們可發現一個吊詭之處：五區總辭似乎是一個沒有方法的方法。於「『五區總辭，全民公決』答客問」一部份，回答「為何必須以五區總辭的方式來製造全民公決？沒有其他方法實現全民公決嗎？再搞民間全民公決不可行嗎？」一問時，說帖回答這是因資源及代表性問題而別無他選，在於回答「假設民主派在『五區總辭，全民公決』都勝

出了，下一步又該怎樣？」時，帖中的下一步行動付之闕如，只答其時會有新形勢。文章提出的英國北愛統派總辭及大倫敦議會總辭的例子都是以勝出公投，抗爭失敗結束，可見社民連本身對其行動如何達到目標尚沒有完整的論述。

情感在這裡進入我們的視野，社民連的「激進」的重要之處不在於它是一個帶來民主自由、改善政府施政的有效方法，而是一個讓人們把情感投資到「社民連」的策略。對拉克勞（2005）來說，情感的政治不是病態，拉克勞指對民粹主義的否定是社會科學對理性重視的結果，他寫道：

「（我們要）把（民粹主義）從它於社會科學話語的邊緣位置拯救出來——社會科學的話語把民粹主義置於不容思考（*unthinkable*）的領域，簡單地以此對立於尊貴的完全理性的狀態。我該強調只有從開始的時候，我們以強烈道德指責元素去思考民粹運動，這（對民粹主義的）貶謫才可能發生。民粹主義不但被矮化：它被詆譭了。對它的排斥是一種以排斥危險的邏輯，以禁慾主義政治領域（*political universe*）為常態的話語建構的一部分。」（Laclau 2005, p.19）

他不視包含情感的政治為病態，雖然情感的政治可能危害自由，導致多數人暴政，但拉克勞認為情感是認同過程（*identification*）與政治必須的元素，認真了解情感的運作才能認真了解政治。社民連的激進行動的重要之處在於這些行動能把不同不被滿足的訴求進行情感的轉移。

上文引用拉克勞（2005）指民粹主義的誕生是一個訴求變成超越名字本身所指的過程

。社民連的「激進」開始時，也許只是指一種對另類的行動模式的要求，但社民連的政治話語卻為「激進」賦予新的意義，上文「激進」的四種意涵令激進的涵蓋範圍擴闊至一系列對傳統泛民行動的沮喪及失望、對建制派的不滿、對維園阿伯、香港人、被抹黑、曾蔭權、「佔道德山頭」的不滿、對一份更好財政預算案的要求、對更強姿態的渴求等民眾訴求，以採取激進路線這一民粹訴求表現出來，使人們把情感投資到作為「激進派」的社民連上，生成「激進派」這一主體。

我於第二章寫道，學界一直以來把民粹視為民主的對立，不可簡單地套用到香港的情況，並引用阿爾迪蒂的分析（Ardit 2004），開啓了民主與民粹關係的三個可能性的討論，第一個可能性視民粹主義與自由民主制度為兼容而非等同；第二個可能性視民粹主義作為對政治禮儀的決裂；第三個可能性視民粹主義作為對民主的危害，導致威權政治。於香港的脈絡中思考這些可能性，我們必須思考社民連的民粹主義催生了什麼主體及實踐，這些實踐又於香港產生了什麼衝擊。社民連的民粹主義透過質疑民主派過往行動的效用，生成了「激進派」這一政治主體，衍生出「維園行動」及異於「和平理性」的社會行動，開啓另類行動的可能性；透過建構基層與商家的對立，社民連的政治論述打破了批判商界的禁忌。在香港政制無法自我修正的畸形制度中，社民連的話語操作改變了香港的政治文化，一改過往民主運動停留於代理式運動的困境，讓人們投入公民實踐中，並突破禁忌，攻擊本土資產階級，催生新的政治話語。社

民連的民粹主義可被理解為對政治禮儀的決裂，對民主運動的衝擊，讓人們能更大程度參與到民主運動當中。當議會內的運動因政制所限而無寸進之時（Sing 2004），這些運動開啓了另類的運動途徑。成名（2004）比較香港、台灣與南韓的民主運動後，判斷香港民主運動的成效不大是因為政黨沒有決心，也無能力動員群眾參與到民主運動之中。社民連的民粹主義也許是這一困局的突破點。

5.6 小結

本章分析了社民連如何統合不同的訴求，令人們支持社民連。拉克勞指人們可產生集體身分不是因為他們分享共同的特質。他指集體身分形成是源於社會中一些訴求得不到滿足，而這些得不到滿足的訴求會把他們的情感投資到一個可統合一眾訴求的空洞能指之中，形成政治主體。

回歸後，香港政府施政混亂，泛民卻未能負起監察及改革政府的作用，社會上出現了對建制、建制派的支持者或泛民的不滿。社民連一方面對建制派擺出強硬的姿態，另一方面猛烈評擊泛民爭取民主的策略，把不少訴求得不到滿足的原因歸咎於民主派的行動欠成效。透過這些策略，社民連重新定義了「激進」，並以「激進派」這一空洞能指表述社民連，讓人們對更有效的民主運動的渴求、對維園阿伯的厭惡、對溫和民主派要爭取中央政府信任的異議、對被抹黑的惋惜、對商界的不滿等情感投資到「激進派」之上，使他們成為社民連的支持者。

於香港的政治脈絡中，社民連的民粹主義不必然是病態。社民連的民粹主義是與政治禮儀的決裂，對民主運動的衝擊，令一些新的政治實踐出現，如「維園行動」、一些更能干擾政府日常運作及挑戰其權威的行動、挑戰本土資產階級的政治話語等。這些踐都突破了香港民主運動停留在無效的議會內爭取的困局。

於下一章，我們會把這一政治主體於放到互聯網與其他媒體互動的脈絡中，指出社民連與「網民」都受到大眾媒體的排擠，情感令兩者扣連成新的主體，成為香港政治中一個重要的板塊。

第六章 網民與另類公共

前兩章，我以拉克勞的民粹主義分析了社民連支持者這一集體身分的生成過程，這一章，我將集中分析一連串有關社民連的事件中，互聯網與大眾媒體的互動如何生成「網民」這一新主體。我會把拉克勞的模型複雜化，讓這一模型更適用於本研究。本研究將指出集體身分的建構是一個不停發生的過程，政治主體生成後，會出現新的訴求，這新的訴求再與其他訴求扣連，形成新的政治主體。

本研究發現，對社民連支持者來說，誰是敵人往往難以弄清，由「中央政府」到「特區政府」到「溫和民主派」，更甚者，不少社民連支持者視一些傳媒，如《明報》、親中方的報章、無綫電視等為敵人。由於社民連自創黨後不斷受傳媒的批評，以致不少人相信社民連被傳媒封殺。互聯網不但起了傳播訊息的作用，更是一個主體生成的平台。社民連支持者一方面利用互聯網這一平台與傳媒機構對抗，另一方面與其他互聯網上相遇的人群結盟，形成新的主體。

6.1 另類公共作為被排斥者的空間

發展自哈貝馬斯（Habermas）的公共領域概念，不少傳媒學者都以公共領域描述及評價大眾傳媒的角色。但傳媒並不是簡單的公共領域，於當代，一般人不能就日常的民主事務進行面對面的溝通，但透過媒體卻能參與到公共之中。達爾格倫（Dahlgren 1995）稱這由大眾媒體構成的思辯的公共領域為媒介公共領

域（mediated public sphere），但不是所有人也可以於這一公共中發言的，媒介公共領域因其的一些踐行方式，往往排斥社會上不同的社群。這裡我會先分析兩種形式的排斥，然後分析互聯網如何作為反公共，讓被排斥的人們參與到公共討論中。

第一種是「地位的排斥」，雖然大眾傳媒的專業守則強調公平、公正及客觀（Carey 1969），這些專業守則落實為踐行時，新聞從業員則要從「具公信力」的來源尋找「客觀」及「具權威性」的陳述，因此，傳媒多從社會「具公信力」的代表人物尋找資料，如於建制中具地位的人及專家等，於勞資衝突中，傳媒多會採訪僱主及工會代表（Hall et al 1978），因此這些具地位的人往往更能於大眾媒體發表言論。如此，不具社會地位的一般人，聲音不易被傳媒轉述。由於傳媒需依賴「具公信力」的資訊來源，這些資訊來源就成了定義事件的「主要定義者」（primary definer），社會上的其他群體要回應這一事件時，不得不回應主要定義者對事件的定義。在這關係中，傳媒就成了事件的「次要定義者」（Secondary definer）（同上）。這樣，政府可透過作為「主要定義者」之便，決定什麼是一件事件的核心問題，如 2009 年 3 月 24 日，發生了粗口罵官員事件，陳偉業於會議中指責唐英年不探望於內地被拘押的香港人，不是發言者的黃毓民在旁說「仆街啦快啲去（快點兒仆街吧！）」。政府於事後指責社民連的議員於議會中的行為不當，往後的不少討論都圍繞「議會語言」，而非問題的核心被拘押的港人。

地位的排斥令具社會地位的群體可在一定程度上控制公共的討論中的討論重

點，把另一些群體關注的問題排斥出討論之外。

第二種是「風格的排斥」。哈貝馬斯（Habermas）的公共理論強調於一個理想的公共領域，公民就社會事務進行討論，人們可於自由、平等及不受威嚇的環境中進行討論，於這環境中，邊緣（periphery）可與核心（Center）進行思辨（Ferree et al 2002），按哈貝馬斯所言，這一理想的公共領域從沒出現，現實中的公共領域尚未能令所有人可參與其中（Habermas 1989）。楊（Young 1996）指出，哈貝馬斯的公共領域模型提倡冷靜而抽離的言論、把頭腦對立於身體、理性對立於情緒，錯誤地把冷靜而不帶情緒的表達視為客觀，並視之為模範而排斥情緒性的、多用比喻的、多用語調及肢體語言的表達。這一種排斥，不但可見於哈貝馬斯的理論，更是傳媒專業守則的一部份（Örnebring and Jönsson 2008），因此傳媒不時會排斥上述的表達方式。

南茜·弗雷澤（Nancy Fraser）批判哈貝馬斯的公共領域理論時，指於十九世紀，除了布爾喬亞的公共空間外，社會上還有其他不同的公共，例如女性雖然一直以來都被排斥於布爾喬亞公共領域之外，但北美不同階級的女性都曾以不同的方式建立他們的公共政治生活，例如布爾喬亞女性建立了一些只容許女性參與的義工做組織，弗雷澤以反公共指稱這類排斥於主流公共以外的人的公共實踐（Fraser 1990），在這些反公共中，人們可以不同於主流的風格投入公共生活（Ryan 1992），反公共容許被主流公共排斥的人透過在反公共領域，使用獨特的風格及慣用語生出其新的身分認同。

弗雷澤的論點開啓了理解互聯網的新進路，互聯網的運作方式與傳統媒體不同，其使用、參與、接收的方式不是傳統媒體的一對多溝通，而是多對多溝通（Jenkins & Thorburn 2003），這一特性，令很多因言說風格及社會地位而被排斥於主流公共中的個人，參與到公共生活之中。多對多的溝通方式讓人們的聲音更易被聽到。

但香港的媒體生態剛好與哈貝馬斯與弗雷澤所分析的社會不同，香港傳媒以小報為主流（楊少騏，2003）。一九九五年創刊的《蘋果日報》，處理新聞的手法以娛樂化為尚，頭版多使用聳動的跨板大標題、大圖片（彭家發，2002）。其以聳動及娛樂性為主的新聞報導手法，打亂了香港的媒體生態，當時銷量第一，本身也是小報的《東方日報》也開始採用大標題、大圖片的手法處理新聞，各大報章也走向「小報化」，或有人稱為「蘋果化」。「蘋果化」的傳播強調煽情血腥及娛樂性（楊少騏，2003），媒體的議題設定以此為中心，政治新聞多帶有娛樂性的花邊新聞。《蘋果日報》的李八方專欄、《明報》的〈女記者手記〉都以這類手法報導政治新聞，很多重要的政治、政策的討論往往被忽略。因此，被傳統媒體所排斥的往往是欠娛樂性的政策討論，而非情緒性的表述，情緒性的表述正是這些媒體的實踐的一部份。

與此相反，以互聯網為基礎的反公共，不只讓人們的聲音被聽到。正如第三章所述，反公共可讓人們一）表述他們被邊緣化的利益（Siapera 2004）、二）進行另類媒體的報導（Hamm & Zaiser 2000 quoted in Wimmer 2005, Harding 1998）及三）批判現行的媒體報導。同時，由於互聯網會催生新的話語，此話

語往往與主流傳媒的不同，因此，有可能產生主流傳媒所不能催生的身分認同（Dahlberg 2007）。米勒與史萊特（Miller and Slater 2000）指，由於互聯網可使使用者超越地理界限地接觸不同的人，把他們置放於不同的文化、社群之間，因此往往使他們重新為自己定位。人們只可以透過於他們身邊存在的資源以建構自己的生活及自我之感（sense of self）（Couldry 2000: p.54），於互聯網上，由於人們可流通主流傳媒不願流通的話語，因此人們可產生主流媒體所不能產生的身分。達爾柏格（Dahlberg）分析互聯網與反公共時借用拉克勞及穆芙基進民主的理論，認為要民主更進一步，社會中要有反公共讓有別於現存的集體身分的新身分形成，因此理想的公共必須包含下列三個元素：

1. 反公共的發展，好讓被邊緣化及對立的話語可被培養；
2. 這些多樣的反話語可被扣連起來，令強而有力的對立身分及元話語（meta-discourse）可被建立起來；
3. 接下來，反公共可與主流公共領域的主流話語進行爭辯（Dahlberg 2007, p.141）。

這裡我不會深入基進民主的討論，因這已超出了本研究的研究範圍。對本研究來說，達爾柏格的觀點的重要性在於指出了反公共的作用不只是一個思辯的空間，而是一個讓被排斥於主流公共以外的人培育反話語，以對抗主流話語及生成新主體性的空間。雖然互聯網有這些作用，但正如第三章所言，我不打算把本研究中的網上社群直接稱為反公共。因為人們不需有特定的身分才可參與這些社群（Hands 2007），而這些社群的參與者不一定處於社會邊緣。因此我採

用另類公共（alternative public）代替反公共來表達這公共領域。另類公共的核心是其另類媒體的實踐，它不但提供主流媒體沒有提供的話語，它還提供不同的生產模式讓人們發聲（Wimmer 2005, p.96），於一系列有關社民連的爭議中，我們可見到人們以互聯網進行另類公共的實踐。人們不滿主流媒體及其所提供的話語，並自覺地使用互聯網這一媒介，傳播主流媒體不願傳播的資訊，於陳偉業及黃毓民粗口罵官這一事件中，媒體的討論多圍繞「講粗口」這一聳動的行為，而跳過陳偉業及黃毓民正討論的政治問題，但互聯網上的討論卻要把政治拉回討論中。

事緣 3 月 24 日，社民連的陳偉業議員於財務委員會特別會議期間指責內地及政制事務局局長林瑞麟沒有派人探訪內地被拘留港人，期間黃毓民議員在旁罵林氏：「仆街啦快啲去！（快點兒仆街吧！）」，香港各大報章都以〈黃毓民立會辱罵林瑞麟〉⁷³、〈惡言辱罵林瑞麟 社民連立會爆粗〉⁷⁴一類強調粗口的標題報報事件⁷⁵，無綫電視翡翠台於 3 月 25 日的晚間新聞報導以《唐英年投訴議員用粗言穢語》為題⁷⁶，報導唐英年投訴「社民連的陳偉業及黃毓民，先後用粗言穢語指罵局長林瑞麟」；立法會財委會主席劉慧卿議員解釋為什麼沒有制止二人；陳偉業解釋自己說的不是粗口及曾鈺成表示會回信政府。此一片段於當晚被上載到 YouTube，並被重新命名為《只許煲咗講狗噏，不准毓民鬧仆

---

⁷³ 〈黃毓民立會辱罵林瑞麟〉，《成報》，A09／港聞，25/3/2009。

⁷⁴ 〈惡言辱罵林瑞麟 社民連立會爆粗〉，《文匯報》，A23／香港新聞，25/3/2009。

⁷⁵ 例外的是 3 月 25 日的《東方日報》及《新報》以〈港人被扣內地促派員探訪〉及〈林瑞麟透露與內地部門商討無結果 擬派員北上探被拘港人〉為題，但有關內地被扣押港人的消息再無被傳媒跟進，但各大傳媒者在跟進有關的粗口爭議。

⁷⁶ <http://mytv.tvb.com/news/newsroundup/19079>，檢閱於 30/4/2009

街, 唐英年老屈社民連爆粗 @ TVB NEWS 2009-03-25》⁷⁷, 上載者亦於片段中加入註解 (Annotation, 即短片中連結到其他 youtube 片段的文字框框), 三個分別名為《煲呔講狗噏》、《唐唐扁扁 Fing》及《毓民鬧仆街》, 分別連接到《曾蔭權:「唔想同湯家驊狗噏辯論...」 @ 行政長官答問會 (2009-01-15)》、《司長: Guo 班友 條條 fing》及《陳偉業-激! 林柴同意阿爺只准探畜生(熊貓)不准探人的所謂共識@24MAR09》三條 youtube 短片。時至 4 月 11 日, 該片段的觀看人數近 5 萬 7 千人, 總回應數 118 條, 多數回應對社民連的行動表示支持, 其中包括指責政府官員只許自己粗言穢語、指二人所說的不是粗口、指責政府表現不濟, 應有此報, 亦有人指翡翠台報導「斷章取義」, 甚至有人指出事情發生時與會議員正討論什麼問題。

《毓民鬧仆街》的註解連接到新聞報導所指的事件的現場直播 youtube 短片 (當時由有線電視播映), 該片被名為《陳偉業-激! 林柴同意阿爺只准探畜生(熊貓)不准探人的所謂共識@24MAR09》⁷⁸, 社民連支持者的觀點一部份和《只許煲呔講狗噏》的回應分別不大, 另一部分則指向政府的政策:「局長點解探熊貓唔探人呢..」(用戶: banzaofking), 及更多的是對林瑞麟本人的指罵。

於 youtube 上, 我們不難發現這些立法會討論的剪輯片段中, 不少社民連於會議中斥責官員的短片都有上萬的點擊率, 其中不少回應都對政府的相關政策作批評, 這和不少大眾媒體著重社民連議員的「出位」行為大為不同。例如一條

---

⁷⁷ <http://www.youtube.com/watch?v=t1l97QhnyfA>, 檢閱於 30/4/2009

⁷⁸ http://www.youtube.com/watch?v=sbEKal_Kcok&annotation_id=annotation_484674&feature=iv

名為《黃毓民-國語激辯!怒批特衰正苦“不該的仆街”九宗罪(2/2)2009 年 4 月 2 日》的短片就收錄了黃毓民指責財政預算案未能幫助弱勢社群、貧困學生等的發言，黃主要以普通話發言，發言指財政司司長曾俊華、香港政府「不該」，令香港人成了「poor guy」⁷⁹。翌日《明報》就以〈用普通話說「不該」 黃毓民：無講粗口〉⁸⁰為題報導這篇演辭，並寫道「社民連主席黃毓民昨在預算案辯論中，突然以普通話作約 13 分鐘發言，批評預算案九宗罪，更多次批評政府真的很『不該』，聽來似『仆街』的諧音。」⁸¹正當《明報》在斟酌黃氏是否在說粗言時，youtube 上的討論就直接用「仆街」批評政府，如用戶「yoxiakin」發文道「特區官僚拒絕民主普選，同時又壓制民生，d 狗官真系仆街！」；用戶「hotohihi」不但批評政府，甚至批評傳媒：「毓民就算費盡心機話呢個政府都有用／傳媒既焦點都係不該同 poor guy／政府仍然仆街……／但係就算咁，社民連既意念終有一日係市民會明白，加油」。

這切合了達爾伯格所言有利民主發展的公共的第一個條件：反公共的發展，用我的話來說，是另類公共的發展，這可讓被邊緣化及對立的話語可被培養，如上文被拘留港人及黃氏發言的例子中，一些針對政府而粗鄙的表達於大眾媒體中被視為病態加以貶抑，並取代政策討論，成為議題的中心。但互聯網上的討論則直接以這粗俗的語言來表達對官員及政策未能滿足市民需要的不滿，甚至抨擊傳媒只會把焦點放在粗口上。另類公共讓一些不能被大眾媒體表述的話語相遇、扣連，催生超越社民連支持者的新主體。接下來，本研究會描寫香港傳

⁷⁹ <http://www.youtube.com/watch?v=znyVdTytUa>

⁸⁰ 〈用普通話說「不該」 黃毓民：無講粗口〉，《明報》，政情／A16，3/4/2009。

⁸¹ 《明報》同版的另一篇報導題為〈多黨批紓困力度不足 民主黨促財案加碼 200 億換 9 票〉，以「社民連主席黃毓民炮轟預算案有 9 宗罪，包括冷血、守財和欺騙市民等。」一句總結並報導了黃的發言。

統媒體與新媒體之間的衝突，使我們能了解新主體的生成背景。

6.2 當主流媒體喪失信譽，人們在網上相遇...

除了小報化，傳媒自我審查也是社民連的支持者不滿的原因。自 1997 年回歸以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或香港特區政府雖然沒有直接收緊對傳媒的審查，但中央政府卻透過一系列巧妙的手段加強對香港傳媒的操控，例如回歸後親中資本家擁有更多的傳媒機構，以影響機構的編採方向，如出版《星島日報》、頭條日報的星島報業集團由全國政協委員何國柱擁有；同時中央官員也多次批評香港傳媒，如 2003 年七一遊行後中方官員批評一些傳媒鼓動市民上街；中央官員亦多次警告香港傳媒，不可宣揚如「台獨」一類與中央政府視為禁忌的主張（Lee 2007）。雖然很難查證中央政府的手段在多大程度上影響了香港傳媒的報導，但不少傳媒人與公眾都認為香港傳媒存在自我審查的問題（同上）。

於 2009 年六四事件二十周年前後，對傳媒自我審查的質疑及不滿到達了一個高峰，於 2009 年 5 月 14 日，特首曾蔭權於立法會答問大會被吳靄儀議員問到是否支持平反六四，他回答中國自六四事件以後多年的發展取得驕人的成就，「香港人對中國的發展會作出客觀的評價」，並把它說成是代表多數香港人的想法，與會泛民議員為此集體離場抗議⁸²；同日，前中國總書記趙紫陽的回憶錄出版，書中反駁中央政府多年來指六四事件中的學生由西方政府支持的論調，及指控鄧少平於事件中的責任（鮑樸 2009）。同日無線電視翡翠台的

---

⁸² <http://www.youtube.com/watch?v=jwOvyitzFQc>

《六點半新聞》把曾蔭權的發言的新聞放到該日的第二條，而對趙紫陽回憶錄出版一事隻字不提，只於《晚間新聞》稍作報導。有人對此大表不滿，並把無線電線的台徽中間的紅、藍、綠三色長條換成紅底黃五星標誌⁸³⁸⁴，並以中央電視台的英文簡稱 CCTV 改成 CCTVB 諱稱英文簡稱為 TVB 的無線電視。

同年 6 月 4 日，無視電視翡翠台沒有把當日的六四燭光晚會放在首位報導，惹來一些非議⁸⁵，同日的《六點半新聞》直播六四燭光晚會期間，有人於鏡頭前高舉「無線新聞，事事旦旦」的紙牌⁸⁶，此一片段被上載到影片分享網站 youtube，無線電線以版權為理由，要求 youtube 刪除有關片段，於高登討論區，有人發起把該片段集體上載到 youtube 的行動⁸⁷，以致 youtube 上有多個相同短片的檔案。往後無線電視的採訪多次受到干擾，youtube 上就有一段社民連成員於城市論壇後向來採訪的無線電視記者大叫「cctvb」⁸⁸；於 2009 年 7 月 24 日的本地免費電視節目服務牌照中期檢討公聽會，不少人質疑無線電視的新聞報導自我審查⁸⁹。

《明報》也因對社民連的「激進」行動批評及在高鐵論爭中支持政府而飽受批評。於 2009 年 2 月 27 日，《明報》發表題為〈縱容議會暴力升級 葬送議員香港形象〉⁹⁰的社評，指香港的多元化社會格局基本成形，泛民陣營在立會有 23 席，任何政治主張都會找到園地發表，所有政黨、政客都有可能在媒體露

---

⁸³ 〈網友惡搞無記變中央台〉，《明報》，Emily 女記者日記/B15，16/5/2009。

⁸⁴ <http://evchk.wikia.com/wiki/CCTVB>

⁸⁵ 同上。

⁸⁶ <http://www.youtube.com/watch?v=zsNuWLuEJb4>

⁸⁷ <http://forum7.hkgolden.com/view.aspx?message=1734741>

⁸⁸ http://www.youtube.com/watch?v=gTatIW8zFq0&feature=player_embedded

⁸⁹ 〈公聽會上現身舉紙牌嘲諷「事旦男」狂質陳志雲〉，《蘋果日報》，港聞/A10，25/7/2009。

⁹⁰ 〈縱容議會暴力升級 葬送議員香港形象〉，《明報》，09/10 財政預算案-民望/A04，27/2/2009。

臉。『社民三子』以遭到封殺為由，在議會搞激烈抗爭來傳播主張，不能成立。」社論指社民連的行動會破壞立法會及香港的形象，並提出重視議會程序是議會文化成熟的表現，指責社民連的議員以被趕出議會為榮是「本港民主、議會生活稚嫩」的表現，《明報》這種強調聳動效果的手法，把整個政治討論還原成一個道德討論，排斥了認真的政治討論，惹來社民連支持者的不滿。高登用戶「paulymh」就開了一個題為《"暴力"的明報！ - 評 27/2/09 明報社評》⁹¹的帖子，指「社民連和朱高正所處政治時空，的確不同，但極度相似，這一點很重要。現在香港一直處於偽民主時代，在立法會內代表 60% 市民的議員只得 1/3，加上基本法 74 條、分組投票的限制，有廣大選民基礎的民選議員在這制度下，根本起不了作用，共產黨幾乎控制所有資源，社民連等人被媒體，尤其是《明報》一類傳媒封殺，其議事、主張根本得不到報道。」並指《明報》沒報導社民連的 2009 年度財政預算案建議書，「paulymh」引用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實踐的邏輯》（1980, 1990），指《明報》把社民連行動指為暴力，是《明報》施行暴力。「paulymh」的文章有相當詳盡的分析，而於這一帖子中，回應相對較簡單，如「日月邪報（向左的射擊圖示，表示對明報的敵對態度）」（曲線召集代理）、「係 d 鶻鳩鳩既中學生先信公信力第一既 日月邪報」（阿當的誘惑）、「日月邪報已同大公文滙睇齊囉。」（Suga）⁹²等⁹³。好些時候，互聯網上的分析比大眾媒體更能取信於人，並批判現行的媒體報導（Wimmer 2005）。「paulymh」的討論把針對社民連的討論轉化成針對媒體暴力的討論，形成對媒體本身的不滿，「paulymh」的評論重

---

⁹¹ http://forum7.hkgolden.com/view.aspx?type=BW&message=1605042&highlight_id=0&page=1

⁹² 同上

⁹³ 同一帖子也有一些對「paulymh」的論點的駁斥，這裡不詳述。

要性在於於互聯網上提供了一種異於主流媒體的話語，讓人們以另一種方式思考社會，產生新的訴求，其中包括對媒體本身的不滿。於 6.3 一節我會描述這不滿與其他訴求的合流。

我借用蔡子強一篇名為《當主流媒體開始喪失了信譽》的報章評論描述香港媒體與互聯網的互動，蔡子強於文中精簡地描述了主流媒體喪失信譽而令人轉向使用新媒體的原因。文章刊登於反高鐵運動後，不少記者於反高鐵運動期間進行採訪時被阻撓，有示威者高舉「事事旦旦」的標語向無綫電視表達不滿⁹⁴。蔡子強指媒體十分倚賴政府提供訊息，而官方抓緊了這一點，有效地控制了何時、如何及該向傳媒發佈什麼訊息，因此往往受官方政治化妝（*spinning*）的擺弄，可惜大眾媒體對此欠缺批判，而且樂此不疲，令其有關高鐵的報導有如政府政策的廣告，如《明報》報導高鐵體驗時竟有「讀書看報打稿像在家中一樣平靜；如果放一支熒光筆在座位的可折疊小桌板，雖然時速 350 公里，但，熒光筆屹立不倒，車廂之平穩可見一斑。」如同高鐵廣告的描寫⁹⁵，倚賴權威地位的排斥於香港成了政治化妝的踏腳石，因此示威者對於高鐵爭議中對大眾媒體不滿，並選擇信任網上新媒體⁹⁶。

蔡氏文章未有仔細的討論人們如何使用這些新媒體，這也不是他的目的。對本研究來說，這卻是理解互聯網與社民連的支持者互動的關鍵。借達爾伯格的討論（Dahlberg 2007），我欲指出另類公共是邊緣化話語傳播的空間。社民連的

---

⁹⁴ 〈示威者阻採訪 燒記者背包裝飾〉，《明報》，高鐵爭議/A03，18/1/2010 年。

⁹⁵ 張健波，〈有飛機之快無機票之貴——武廣高鐵坐後感〉，《明報》，港聞/A01，6/1/2010。

⁹⁶ 蔡子強，〈當主流媒體開始喪失了信譽〉，《明報》，MP+觀點/A29，28/1/2010 年。

支持者對大眾傳媒的不信任，他們有意識地使用新媒體作為他們吸收及發放資訊的渠道。而這些話語會與其他話語扣連起來，透過拉克勞（Laclau 2005）所言的民粹邏輯，人們可把他們不同的訴求扣連起來，產生新的身分認同，形成新主體。接下來的篇幅，我們會分析社民連的支持者如何借助互聯網動員，與其他群體合流，以產生一種新的主體。

6.3 「網民」與社民連的支持者：身分互換與合流

達爾伯格（2007）有利民主公共的第二個條件是「多樣的反話語可被扣連起來，令強而有力的對立身分及元話語（meta-discourse）可被建立起來」，於2009年的政改討論中，紛紜的話語於互聯網上的討論中被扣連起來，生成了「愛國愛港網民」這一集體身分。

2009年11月19日，高登會員「HK 均富卡」發表了題為《「一人一蚊」登報反番叮政改》的帖子，發表時內容只有「唔知籌唔籌到登 A1 全版一星期呢」⁹⁷，另一會員「膠動戰士」回應支持，自發捐 500 元，並提議進行登廣告的行動步驟，後來不少會員除了捐款外，更加入統籌、設計廣告、借出 PayPal 戶口等，經過個兩個月的籌備，一眾高登會員成功籌得所需的二萬元款項，於2010年1月28日，這一廣告成功於 AM730 以全版刊出，圖片為一只成人的手掌托著一只嬰兒的手掌，右側寫著「未來是個怎樣世界 視乎今天怎樣表態」（附件一），下方以更大的字體寫著「反對偽政改 爭取真普選 落實全面雙直選 廢除功能組別」，而廣告落款則為「一眾愛國愛港網民」。這「一

---

⁹⁷ <http://forum3.hkgolden.com/view.aspx?type=CA&message=1993087>

眾愛國愛港網民」不一定是社民連的支持者，但參與這次行的「網民」不少是社民連的支持者，如 HK 均富卡、膠動戰士、膠洲灣、吊高曾蔭權、痴拾左線、路人甲 xxxx、五港德、「李澤楷」等就曾於「長毛－社民連支持者揮手區」中表明自己的長毛或社民連的支持者⁹⁸。

社民連的支持者的訴求與其他訴求於互聯網上的另類公共空間相遇，社民連的支持者與非社民連的支持者需要一個新的名字來為他們命名，讓他們把情感投入到其中，如我於第五章所言，一群尚未有集體身分的人們能凝聚成一政治主體是因命名讓人們把別人或自身獨特的訴求視為共同的訴求，產生新的主體（Zizek 1989, Laclau 2005）。登報的「一眾愛國愛港網民」以此為自己命名，產生新的身分。

以「網民」為名是一個細心選擇的結果。參與是次登報的人選擇以「網民」有兩個原因，一是避免使用「高登網民」這一被污名化了的名字（有參與者稱外界認為高登網民「做親都無好嘢」）⁹⁹，二是因為不希望自己被標籤為小眾，在設計廣告其間，本來有人提議以「高登網民」為名，但不少人都不同意以此為名，因對外人來說太「小圈子」，為了表達他們民主可救國救港的理念，因此參與這一行動的人們以「一眾愛國愛港網民」為名。

於廣告中，「網民」的共同訴求被統合描述成「反對偽政改 爭取真普選 落實全面雙直選 廢除功能組別」，但於廣告的籌備工作中，有個別人士提出了

---

⁹⁸ <http://forum5.hkgolden.com/view.aspx?message=2097814>

⁹⁹ http://forum1.hkgolden.com/view.aspx?type=CA&message=2033316&page=3&highlight_id=0

不同的訴求，如「香港人唔好再龜縮喇」¹⁰⁰，當有人問到沒有付款可否參與登報事務的討論時，則有人回應道「無夾錢都可以出聲，我地唔似政府，無經濟能力都可享有平等參與權利¹⁰¹」。「愛國愛港網民」對傳媒的諸多不滿也在行動中顯露出來。於籌備期間及事後，參與者曾經考慮過把廣告刊登於發行量更高的《頭條日報》上，但這一意見隨即遭到反對，用戶「計惑」就稱《頭條日報》為「四大共狗報之一」¹⁰²，用戶「陳素馨」（社民連的支持者¹⁰³）則指《頭條日報》質素不濟，他／她批評 2010 年 1 月 27 日《頭條日報》以白韻琴對社民連的攻擊為頭版¹⁰⁴是「弱智」。同日，《明報》報導了這一事件，以《高登網民登報撐普選》¹⁰⁵為題，該報導指「似乎為 5 區『公投』造勢。」，這次登報的發起人之一，社民連支持者「HK 均富卡」於高登留言「有造勢咩？」後再加上表示嘲笑的圖示¹⁰⁶。「愛國愛港網民」作為一政治主體，統合了社民連支持者對傳媒的不滿、「享有平等參與權利」、「香港人唔好再龜縮」等訴求。透過反對政府的政改方案，這一身份暫時穩定下來，產生出「愛國愛港網民」這一集體身分，雖然這一廣告並沒有創新之處，但「愛國愛港網民」於後來相當活躍，在政改爭議中，他們再於 6 月 21 日一口氣在《am730》上刊登了兩個反對政府方案及指責民主黨的廣告（附件二、三），把自己的聲音帶到主流傳媒之中。前者的主題為反對政府的方案、要求真普選

¹⁰⁰ http://forum1.hkgolden.com/view.aspx?type=CA&message=2033316&page=5&highlight_id=0

¹⁰¹ http://forum1.hkgolden.com/view.aspx?type=CA&message=2033316&page=6&highlight_id=0

¹⁰² http://forum1.hkgolden.com/view.aspx?type=CA&message=2033316&page=5&highlight_id=0

¹⁰³ <http://webcache.googleusercontent.com/search?q=cache:L9bR4W1-Ac4J:forum6.hkgolden.com/view.aspx%3Fmessage%3D2130972%26page%3D1%26fanti%3D1+%E9%AB%98%E7%99%BB+%E9%99%B3%E7%B4%A0%E9%A6%A8&cd=3&hl=zh-TW&ct=clnk&gl=hk&source=www.google.com.hk>

¹⁰⁴ 〈社民五子遞辭職信 白姐姐辣招 搶鬥毓民〉，《頭條日報》，要聞／頭條／P01，27/1/2010

¹⁰⁵ 〈高登網民登報撐普選〉，《明報》，MP+Emily／A28，27/1/2010

¹⁰⁶ http://forum1.hkgolden.com/view.aspx?type=CA&message=2033316&page=5&highlight_id=0

並召集人們 6 月 23 日到立法會門外示威；後者則指責民主黨支持政府方案，大標題為「民主黨出賣香港 違背爭取二零一二雙普選、廢除功能組別之競選承諾」。於 6 月底幾乎所有媒體一致唱好民主黨方案時¹⁰⁷，後者更突顯互聯網上的另類公共所起的作用，人們不但於那裡能建構反話語，甚至如達爾伯格所言「與主流公共領域的主流話語進行爭辯」，在此我們可看見另類公共在培育反話語與新主體的作用。社民連的影響是這一新主體的誕生的多種因素之一，但這一主體受到社民連的激進話語的影響。於政改論爭中，這一群「愛國愛港網民」與社民連不妥協的激進路線接近，不接受民主黨的妥協路線。

在上述事件前後，網上還有不少的動員，如 2010 年 2 月，一批高登用戶集體創作了一系列諷刺民建聯的汗衣，如其中一款就把民建聯的黨徽上「民建聯」三個大字改成「禮義廉」三字，以諷刺民建聯「無恥」。高登討論區的用戶把這些汗衣放到社民連的年宵攤位寄賣。與上一例子一樣，高登討論區的用戶的行動也受到社民連的激進話語所啓發，以直接而粗野的方式表達到建制的不滿。

互聯網於這一系列的行動展現了強大的動員能力。我並非要把「愛國愛港網民」這一主體的出現與網絡的動員力歸功於社民連，但社民連的出現令互聯網的動員以一種獨特的形式出現，令網絡動員的話語不時與社民連的激進話語暗合。如「愛國愛港網民」就與社民連的「對政府及中央政府不妥協，要求它們立即滿足市民政治訴求要求的政治姿態」一致，反民主黨放政改中的妥協路

---

¹⁰⁷ 除了《太陽報》及《英文虎報》外，幾乎香港所有報章都於 6 月 20 至 23 日的社論都指民主黨方案是民主邁出第一步。

線。

6.4 小結

香港大眾媒體的運作排斥社會上沒有地位的人及一些表達風格，並把一些重要的政治議題約化為一些娛樂或道德議題，加上中央的操縱及港府政治化妝。令不少人對傳媒持不信任態度。

在這背景下，互聯網上的一些另類公共扮演了兩個重要角色，第一，另類公共提供了一個批判傳媒、異於主流傳媒的話語流通的空間，讓新的話語產生；第二，有著不同訴求的人們可於另類公共相遇，並把他們的訴求扣連起來，形成新的主體。

社民連的支持者於粗口事件中對一些傳媒機構的報導手法十分不滿，因此他們利用互聯網生產新的話語對抗主流媒體，同時間，社民連支持者對傳媒的不滿可與其他訴求相遇，形成新的政治主體。在政改爭議的背景下，一連串對香港政府、功能組別、傳媒的不滿被投資到「偽政改」身上，形成「反對偽政改」的「愛國愛港網民」。

第七章 總結：主體的故事

7.1 回顧：民粹主義與主體

第一章我回應了一些對社民連的興起的評論。首先是簡單的階級論，這一論說認為社民連的興起是因為打著「基層」名號的社民連得到「基層」的支持，這評論不但與事實不符，而且無助於理論化社民連的興起。另一種是簡單的激進論，這理論簡單地把社民連的成功視為人們認為香港需要抗爭來改變，這一理論沒有小心地注意「激進」的多元含意，以及人們為什麼把他們的情感投資到激進之上。

回顧香港政治的研究，實證化的「文化理論」（見 Lau 1984）及階層分析（見 Wong & Lui, 1993）都有著去脈絡化的問題，以實證化的形式定義階級（Wong & Lui, 1993）及以去脈絡化的形式及問題調查受訪者的行動（Lau 1984）。這做法往往會令我們錯過具體歷史脈絡中各種力量的互動。

緣自對傳統階級理論的反思，荷爾指政治中的工人階級及資產階級實證上從來沒有出現，現實政治的分類往往更多樣化，並以「人民」對「權力集團」的對立出現，而「人民」的形成是因為人們把不同的利益群體扣連到自己的政治議程之中，這些群體因其理性的考量而被呼召成「人民」（Hall 1987）。但「群體的理性考量」暗示了這些群體的集體身份是先於統識的存在，這令荷爾的理論陷入本質論之中。

緣自對本質論的不滿，拉克勞以民粹主義作為集體身分形成的理論（Laclau

2005），他的民粹主義以「訴求」作為社會分析的最基本單位，集體身分的形成是一系列訴求被話語扣連起來的結果。先建立一個對立陣線，再以空洞能指來表達多元的訴求及人們的身分，最後以一個意義系統鞏固這民粹訴求。

民粹主義這一詞長久以來都有負面含義，而且所指含糊不清（Mazzoleni 2003），因此我在第二章展開了關於民粹主義是什麼的討論，以說明我們該如何評價民粹主義。雖然不少有關民粹主義的討論都把民粹主義對立於民主，但於香港的政治脈絡，這些圍繞民粹及自由民主制的關係的討論可能有不適用之處。我們於社民連的媒體論述幾乎看到了所有民粹主義的特徵，但社民連的其中一個目的是爭取自由民主制，因此，把民粹主義與民主對立的框架是不足以理解社民連的成功，重新理解什麼是民粹主義是必須的。

拉克勞對民粹主義的理解不是把民粹主義對立於自由民主制，而是把民粹主義理解為一種政治邏輯。他不滿意社會學分析中要麼視一個群體為分析的基本單位，要麼則以功能主義（Functionalist）或結構主義（Structuralist）的範式把這單位先驗化。因此他以訴求為基本單位來解釋集體身分的生成，而民粹主義就扣連這些訴求以產生集體身分的邏輯：「第一是形成一個內部的對立戰線，把「人民」（people）與掌權者（power）分開並對立起來；第二是把「人民」的紛雜多樣需求，扣連成一種共同的需求（common demand）；最後是鞏固這民粹需求，成為一個穩定的意義系統（system of signification）。由於「人民」本身極為多元紛雜，不同的具體訴求難以統一，因此操作話語的人以意義含混的空洞能指（empty signifier），例如「基層」、「激進」等，「統合地表述「人民」特定而具體的、千差萬別的訴求。」（Laclau, 2005; 許寶強 2007）。

以此為基礎，拉克勞指所有政治也是民粹的。阿爾迪蒂（Arditi 2004）對拉克勞的民粹主義的討論進一步的說明了民主及民粹之間的關係，他指拉克勞的民粹理論指民粹及政治是兩個可互換的詞語，這說法雖然有一定的吸引力，他直覺上也認為所有政治都含有民粹的成分，但他認為把政治和民粹劃上等號無助於了解政治，但同時我們沒有必要把兩者明確分開，反之要接受兩者具互通的部分。因此民粹主義不一定危害民主，兩者或可兼容、民粹或可作為對精英民主／民主精英的不滿、或可危害民主。只有脈絡化的觀察才可理解兩者產生了什麼互動。

我開始這一討論的目的是為了開啓民粹主義多元的可能性，以說明民粹主義不一定危害民主，如拉克勞所言，民粹主義是危險的邏輯，但不一定是病態。以此為基礎，我們可重新理解社民連對香港政治的影響，於往後的章節我把目光放到社民連的民粹主義所產生的主體，以了解香港政治脈絡中社民連的民粹主義會產生什麼影響，並了解這影響與民主的關係。

第三章我疏梳理了一些關於互聯網的討論，以展開方法學的討論。我借用了威爾遜及彼得遜（Wilson and Peterson 2002）的分析指互聯網不是獨立於線下世界的賽博空間，線上與線下的關係密切，因此研究互聯網必需研究兩者之間的關係。互聯網的特性令媒體中的發訊者（Transmitter）及收訊者（receiver）的分野變得模糊（Enzensberger 1970, Quoted from Wimmer 2005），其運作模式由以往一對多的溝通演變成多對多的存取、參與及相互性（Jenkins & Thorburn 2003）。因此互聯網能促進一些反公共的實踐，人們利用互聯網表述他們被邊

綠化的利益（Siapera 2004）、進行另類媒體的實踐（Hamm & Zaiser 2000
quoted in Wimmer 2005, Harding 1998）及批判現行的媒體報導。這些互動都可
令互聯網成為另類話語流傳的空間，令互聯網與線下媒體之間互相影響。我雖
然借用了反公共的理論，但我並不是直接把互聯網上的一些社群視為反公共。
由於這些群體不一定是由弱勢群體組成，而人們也不需特殊的身分參與其中
（Hands 2007），因此我稱之為另類公共（Wimmer 2005）。另類公共的生產
方式為大眾媒體所排斥的人提供發展他們的話語的空間。

對另類公共的分析可讓我們了解互聯網上的空間如何讓人們產生新的話語及表
述他們沒有被主流媒體表述的多元訴求。因此，我把研究的眼光放到大眾媒體
的話語，以理解媒體提供了什麼話語讓社民連的支持者建構他們的身分。我也
把眼光放到互聯網上的討論，觀察主流媒體沒有表述的多元訴求，並觀察這些
訴求如何被扣連到社民連之上，生成新的集體身分，並分析這集體身分在香港
的脈絡中的重要性，如這集體身分把什麼以往的政治話語不能吸納的訴求吸納
其中？開啓了什麼政治實踐的可能性？只有透過這些分析，我們才可全面了解
社民連的民粹主義的具體作用。

第四章開始是實證研究的部分。與賴特（Wright 1976）等人實證化的階級研究
的進路不同，拉克勞的研究沒有把人們的身分與他們於經濟的位置扣連起來。
他以訴求作為社會分析的最基本單位，集體身分的生成是不同的訴求被扣連
的結果（Laclau 2005）。這過程的第一步是建立一個內部的對立把「人民」及
「當權者」分開，再以空洞能指把不同的訴求統合起來形式集體身分。

以此為基礎，我認為雖然社民連強調他們是基層黨，但他們的成功不是因為社會上有實證存在的基層支持他們。社民連致力打破傳統的建制派（左派）／民主派對立，意圖把「左派」的「道德高地」奪取過來，以「基層」黨自居，並與「中間偏右」的民主、公民兩黨分割開來。「基層」不是一個經濟的分類，而是「空洞能指」。空洞能指本身沒有所指（Laclau 2005），即「基層」沒有本質上的相同，只有透過建構共同的敵人，不同的訴求才可被統合到「基層」這一旗幟之下。

透過新移民的例子，我展示「基層」內部矛盾重重，社民連只得借助政治傳統中泛民對建制的對立或左與右的對立，把「基層」的內部矛盾暫時穩定到與建制派或他們的政治話語中與右派對立的「基層」之下。

我透過分析「基層」這一空洞能指，指出階級分析不足以理解社民連的成功，第五章我進一步伸展民粹主義的討論，以探討社民連興起的原因及對香港政治的衝擊。我以主體生成作為這一章的主軸，拉克勞指人們可產生集體身分不是因為他們分享共同的特質。他認為集體身分形成是源於社會有訴求得不到滿足，而這些得不到滿足的訴求會被空洞能統合起來形式集體身分。而這一過程是一個情感投資的過程，即只有人們把他們的情感投資到這一空洞能指之中，政治主體才可能形式。

把這一分析放到香港的時候，我們必須了解香港的政治脈絡。回歸後，香港政府施政混亂，泛民卻未能起監察及改革政府的作用，社會上出現了對建制、建制派及泛民的不滿。社民連對建制派擺出強硬的姿態，並猛烈評擊泛民爭取民

主的策略，把不少訴求得不到滿足的原因歸咎於民主派的行動欠成效，制造溫和民主派與激進民主派的對立。透過這些策略，社民連重新定義了「激進」，並以「激進派」這一空洞能指表述社民連，統合社會上的各種訴求。

我以民粹主義分析社民連並不是希望指社民連的興起是病態，我希望說明社民連為香港政治帶來的轉變。借用阿爾迪蒂（2004）的分析，社民連的民粹主義是與政治禮儀的決裂，透過與過往議會爭取、「和平理性」的行動模式決裂，社民連的民粹主義產生了能動性更強的主體，社會上出現了一些新的政治實踐，如「維園行動」、一些更能干擾政府日常運作及挑戰其權威的行動、批評本土資產階級的政治話語等。

我於第六章把拉克勞的理論複雜化，我把主體的生成視為一個不斷發生的過程，而不是單一的過程。政治主體生成後，他們於社會上的互動會使他們生出新的訴求，這新的訴求會再與其他訴求扣連，新的民粹扣連過程會令他們生成新的主體。

我把這分析放到香港的媒體運作當中。香港大眾媒體的運作排斥社會上沒有地位的人及一些表達風格，並把一些重要的政治議題約化為一些娛樂或道德議題，加上中央的操弄及港府的政治化妝，令不少人對傳媒抱不信任態度。我以黃毓民於立法會內說粗口的事件的報導與社民連的支持者於網上的討論為切入點，社民連的支持者對一些傳媒機構報導粗口事件的手法十分不滿。互聯網不但提供了容許社民連支持者發聲的空間，讓他們表達對傳媒的不滿。互聯網也成為訴求相遇以產生反話語的空間，於互聯網上，社民連支持者對傳媒的不滿

可與其他訴求相遇，形成新的政治主體。

2009 年年底開始的政改爭議刺激了這個新主體的生成過程，高登討論區上有人以「愛國愛港網民」之名登報反對政府的政改方案，指責這一方案為「偽政改」。於這一廣告的籌備過程中，一連串對香港政府、功能組別、傳媒的不滿都被呈現出來。「愛國愛港網民」的反偽政改的民粹訴求背後，正是這一系列的民眾訴求，而高登討論區是這些訴求互相扣連的空間。

這一新的主體不但是社民連的支持者的訴求與其他訴求扣連起來的產物，而且有著與社民連的激進話語暗合的話語，如他們同樣地不接受民主黨向中央妥協的策略。另類公共上的這一實踐，於 2010 年 6 月底所有媒體也唱好民主黨的政改方案之時，有著另類聲音的位置。

7.2 超越道德譴責的分析

拉克勞於他的 *On the Populist Reason* 的最後寫道：

「知性的工作有一倫理的規訓，達文西（Leonardo da Vinci）稱之為『絕不妥協的嚴謹』。於實際的實踐中——特別當一個人處理充滿情緒的政治議題的時候，他需要抵抗幾種誘惑。一言蔽之：不要屈從於文字的恐怖主義。如佛洛伊德寫道：人不可對懦弱讓步，『我們不知道路會把我們引領到哪裡，我們（只能）先以話指出方向，然後一點一點的實踐』（Freud 1921, 2001）。於我們的時代，懦弱的其中一個形式是以道德譴責代替分析」（Laclau 2005, 249）。

這也是這個研究的寫照。自創黨之初社民連就受到不少攻擊，包括指責社民連是民粹主義或福利主義。這一抨擊不但沒有仔細整理「民粹主義」或「福利主義」所指為何，也沒有分析社民連會對我們的社會帶來什麼影響。民粹一定是壞的嗎？換句話說，民粹主義會危害我們從沒得到過的民主嗎？我以第二章的理論探索表明民粹主義有著多樣的可能性。社民連是民粹的嗎？我以第四、五章的實證分析指出社民連的確以一種民粹主義的邏輯贏得支持。那社民連的民粹主義是壞的嗎？我在第四至六章把社民連的政治話語放到香港的脈絡中去分析。在香港的畸形政制中，立法未能制衡行政、立法會的組成不民主、民主派的行動路線缺乏效果，社會上有著多元的民眾訴求不能被滿足，社民連的出現統合了這些訴求，而且以「激進派」的姿態與人們把情感投資到它身上。這過程令一些能動性被釋放出來，產生如維園行動的實踐。於生生不息的主體生成過程中，社民連的支持者與其他的訴求合流，生成「愛國愛港的網民」，於政改爭議中為自己發聲。

因此，我認為社民連的民粹主義產生了具行動力的政治主體，這些主體並不是對民主的危害，而且是民主運動重要的參與者。這是一個關於此時、此地、此一民粹主義的判斷。如 7.1 所述，香港的溫和民主派未能透過立法會制衡行政，中央政府亦有力控制傳媒，香港的民主運動缺乏有效的論述及行動綱領。由 2006 年開始，社民連的民粹主義產生新的政治話語，解放了社會上的能動性，令「維園行動」、更能干擾政府日常運作及挑戰其權威的行動、批評本土資產階級的政治話語等實踐變得可行。這些踐行挑戰了現行的政治秩序，產生更能切中事弊的話語，產生新的政治行動主體，把民主運動停留在不公平的議

會內的討價還價的情況扭轉過來，第六章的例子中，人們更反對這一路線。如果我們相信成名（Sing 2004）的判斷是對的：香港的民主運動寸步難行是因為香港的民主派欠動員的決心及能力，那末社民連的民粹主義正改變這一情形。總的來說，社民連把民主運動的模式由過往的強調議席轉化成強調動員的運動，並開啓更多元化的行動模式的可能性。社會上也出現了一些攻擊本土資產階級的話語，相對過往泛民不敢攻擊本土資產階級的話語，社民連的話語更能切中本土資產階級故意拖延香港民主化的現實。

雖然民粹主義讓社民連為香港政治帶來衝擊，但這民粹主義也埋下了社民連分裂的種子。社民連在 2010 年年底分裂。社民連分裂的一個主因是以黃毓民為主的一派，堅持因民主黨支持政改方案而要於區議會選舉中派人與民主黨對撼，而當時社民連主席陶君行持反對意見。這觸動了社民連的民粹主義內部不可修補的矛盾。第五章我為社民連的「激進」下了四個定義：

1. 一種以街頭抗爭為藍本，粗野的政治行動風格；
2. 對政府及中央政府不妥協，要求它們立即滿足市民政治訴求要求的政治姿態；
3. 與「溫和」泛民不同的運動模式－反對參與現有而不公的機制，強調動員民眾的運動模式；
4. 偏向基層的政治理念。

黃與陶兩派的不同就是對激進的不同演繹，前者強調與「溫和」泛民的對立，並要與民主黨進行鬥爭，但後者沒有把這對立上升對犧牲泛民區議會議席總數以與之鬥爭的程度。

當兩者企圖釐清「激進」這一意義不清的空洞能指所指為何、企圖為這個能指加入具體的所指，「激進」就不再空洞。因此「激進」統合不同訴求的能力消失了，黃與陶兩派不能分享共同的身分認同，社民連因此而分裂。

社民連的民粹主義的另一個缺點是其話語未能為民主運動指出一條明確的路線，香港的民主運動前途仍不容樂觀；更危險的是社民連雖有支持者，但不代表社民連的左翼話語已落地生根，對中共的攻擊是可被右翼挪用，對中共的憎惡可轉化成對新移民的妒恨，為反新移民打下基礎。

雖然社會民主主義是一套具體的意識形態，社民連的政策綱領明言「社民連一貫立場是政府應積極扶助新移民融入香港社會。新移民實為香港社會持續發展與社會流動的動力源頭，我們必須以平等、公義、互信、共融的態度，促使各階層市民與新移民一起創造及分享社會的資源。」（社會民主連線 2009），但從第四章的例子中，我們可看到一些社民連的支持者沒有認同這一點。

本研究對這一點的強調一方面源自本研究的關注：呈現社民連的支持背後多元的訴求；另一方面這源自拉克勞的理論框架的不足與方法學上的不足。

拉克勞的 *On the Populist Reason* 出版之後，齊澤克撰文批評拉克勞的理論（Zizek 2006）。齊澤克批評拉克勞未能分辨共產主義與民粹主義。齊澤克指拉克勞把政治邏輯的內容掏空，只是把對立視為實證的主體。他進一步論斷說共產主義並不是民粹主義，就算作為共產主義的分支，但以斯大林為認同的斯大林主義也不是民粹主義，因斯大林不是多樣的訴求的化身：

「（佛洛伊德）開啓把群眾凝聚起來的共同認同可從對領袖的認同過渡到對非個人的意念的可能性後，（他）續道『這抽象化是或多或少，我們所說的間接領袖的化身，因此產生了意念與領袖的關係的有趣變化』」（Freud 1921），這不正是斯大林式領袖的特別之處？相對法西斯領袖來說，斯大林式領袖是間接領袖，是共產主義的化身。因此共產主義運動及政權不可被歸類為民粹主義」（p. 557）

社民連一直以來都面對齊澤克模式與勞克拉模式間的張力：一方面它是一個以社會民主主義——一套完整的意識形態——作綱領的政黨；另一方面民粹主義的操作使社民連成為多樣而互相矛盾的訴求進行情感投資的對象。以訴求為分析的基本單位的民粹主義強調的是政治集體身分中不同的矛盾是如何被統合的，這往往會錯過政治邏輯的內容，因此在本研究容易忽視社會民主主義的推展：也許對一些社民連的支持者來說，他們的確是因社民連的社會民主主義綱領而支持社民連，但本研究一直全力展示社民連的支持者的多元訴求，因而沒有分析因社會民主主義而支持社民連的社群如何看待社民連的施為；社會民主主義如何影響社民連的支持者；作為一個質性的研究，本研究也沒有量化地分析有多少人是社會民主主義的支持者，未能對這一意識形態的未來作評論。這些是拉克勞強調多元訴求的框架未能處理的問題。

界定民粹主義的分析的具體作用也許是本研究在拉克勞與齊澤克的論爭中的位置：如果民粹主義只是一個集體身分形成的過程，那麼，我們難以說清這一連串矛盾重重的訴求於社會上多元化的話語操作中會促成怎麼樣的政治。也許正

如齊澤克所說，我們不能以拉克勞的理論分辨正在興起的是法西斯主義還是社會民主主義。但這不代表我對這一連串的訴求的展示是無用的。齊澤克於他的文章最後的部份批評拉克勞的民粹不能成為解放政治的基礎，對他來說，解放政治是要人們需要跳出理性行政的精英為他們選定的是與非的對立選項，做他們所希望做的政治選擇（p. 574），本研究對互聯網的引入展示了人們對社民連的支持背後有什麼多樣的訴求，把表面看來一元的現象的多元性呈現出來。我們從這面向開始分析社民連的話語操作如何回應香港的政治問題，這一拉克勞的框架恰好為齊澤克的政治議程鋪路：把一連串隱沒在民粹訴求下的的多元訴求呈現出來，開啓是與非的對立選項以外的多元可能性。

雖然民粹主義是危險的邏輯，但正如拉克勞所言，我們不可對其妄加道德譴責，具體的分析是知性工作的中心。我不希望過度浪漫化社民連的民粹主義或其生產的主體。文中我也指出社民連的政治話語充滿不足，社民連似乎未能為香港的民主運動指出一條道路；社民連於其高峰時期也只是一個有三個立法會議員的小政黨，影響力有限，2010 年底更有不少黨員退黨，進一步削弱社民連的影響力；但對民粹主義的分析所重視的不是一政黨的成敗，而是展示於民粹主義的扣連過程中，被隱沒的多樣訴求，我希望指出指責民粹主義只會讓我們錯過社會上多樣的可能性。從事知性工作的人不應該迴避民粹主義帶來的危險，而是以分析找出它的可能性與危險，讓我們跳出精英為我們準備好的對立選項：要麼激進，要麼和平理性。我們或許可問，我們該如何統合激進與和平理性背後的訴求，開展新的政治實踐？民粹主義的確是危險的，我們也不知道眼前的路會引領我們去哪，我們沒有走對路的保證，但知性工作的目的就是思索我們的每一步該如何走下去。

功能組別勢將再添5席！ 功能組別的「貢獻」， 港人沒齒難忘！

民主自由	官商勾結	漠視民生	貧富懸殊	勞工權益
捍衛新聞自由 普選行政長官 落實一國兩制 平反六四事件	反對官商勾結及利益輸送 反不公平競爭 市區重建策略檢討 立法加強保障 巽樓人士消費權益	回購領匯股份 小班教學 監管健康食品 辦公室全面禁煙	成立基金應付人口 老化及扶貧需要 「在職貧窮」問題 破除財閥壟斷、 促進社會和諧	最低工資・標準工時 創造就業機會 切實保障僱員法定權益 僱員休息時間及休息日

議案全數否決

基本法附件一附件二列明，到了2007年，
港人係有自由決定立法會將會點樣組成，
我深信到時候，港人係會要求有**六十席直選**。

——唐英年・1994

6.23 說好的普選呢？ 立法會見

民主黨出賣香港

違背爭取二零一二雙普選、廢除功能組別之競選承諾

合理化「功能組別」
即使新增區議會5席，並非公平普及
特權可以有三十票（選29席），大多數市民卻只得兩票（選6席）
背離港人民主訴求，以換取新增區議會議席，只為己黨利益

數據（已刪除委任議員）：

政黨	席數
民主黨	62席（包前線）
公民黨	8席
社民連	6席
民協	17席
民建聯	117席
自由黨	14席

為鞏固自己既有泛民最大黨既利益而離棄港人民主
廿三條、最低工資、復建居屋……
市民以後還有聲音可以表達嗎？

6.23立法會外守護香港最後的民主
在香港進入黑暗前發出最後的光芒

參考書目

中文參考書目

- 鮑樸編著（2009）《改革歷程》，香港：新世紀出版社。
- 陳光輝（2008）〈探針：選舉就是爲了變〉，《蘋果日報》，論壇／A24 09-09-2008。
- 陳智遠，沈旭暉（2005）〈是民間還是政府走向民粹？〉，《明報》，論壇／A26 29/8/2005。
- 蔡子強（2008a）〈社民連只有草根擁躉？〉，《明報》，觀點／精裝君王論／A23 11-9-2008。
- 蔡子強（2008b）〈從 Catch-All-Party 到政治分眾〉，《明報》，觀點／精裝君王論／A30 25-9-2008。
- 蔡子強（2010）《當主流媒體開始喪失了信譽》，明報，2010年1月28日。
- 周魯逸口述，阿古整理（2008）〈訪周魯逸：從社民連談香港左翼發展之路〉，基層大學，（<http://www.grass-root.org/college/modules/wfsection/article.php?articleid=766>）更新於12/10/2008，檢閱於6/12/2010。
- 選舉管理委員會（2004）〈附錄十一：二零零四年立法會選舉換屆選舉結果：地方選區〉，《2004年立法會選舉報告書》，（http://www.eac.gov.hk/pdf/legco/2004/ch/report/lc2004appendix11_c.pdf）2008年10月3日修改，2011年3月7日閱讀。
- 選舉管理委員會（2008）〈附錄八：二零零八年立法會選舉換屆選舉結果：地方選區〉，《2008年立法會選舉報告書》，（http://www.eac.gov.hk/pdf/legco/2008/ch/report/2008lce_appendix8_c.pdf）2008年12月9日修改，2011年3月7日閱讀。
- 傅大爲（1995）〈我與「台社」十年〉，《台灣文藝》，第10期，8月20日，50-55。
- 港大民意網站 2011《市民對特區政府的滿意程度》，（http://hkupop.hku.hk/php/chart.php?filename=chinese/popexpress/sargperf/sarg/month/Q32_month.txt&range=70&startdate=20030701&addinfo=chinese/popexpress/sargperf/sarg/month/addinfo.txt），更新於2011/5/11，檢閱於2011/5/13。
- 香港網絡大典，2010，高登討論區（<http://evchk.wikia.com/wiki/%E9%AB%98%E7%99%BB>），2010年8月5日更新，檢閱於2010/8/14。
- 許寶強（2002）〈小心民粹政治－有香港特色的「西部大開發論述談起」〉，國際邊緣。（<http://intermargins.net/Headline/2000/Westward%20development/20020302.htm>）檢閱於18/1/2009。
- 許寶強（2007）〈民粹政治與犬儒文化〉，《文化研究@嶺南》，第六期，（http://www.ln.edu.hk/mcsln/6th_issue/criticism_05.html），檢閱於3/9/2010。
- 孔誥烽（1997）〈論說六七：恐左意識底下的香港本土主義、中國民主主義與左翼思潮〉，羅永生編《誰的城市？》，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 葉蔭聰（1997）〈‘本地人’從哪裏來？—從《中國學生周報》看六十年代的香港想像〉，羅永生編《誰的城市？》，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 葉蔭聰（2010）〈語言的秩序與戰爭〉《文化研究@嶺南》11月
（http://www.ln.edu.hk/mcsln/21th_issue/criticism_09.shtml）更新於2010/11/29，檢閱於2011/5/18。
- 莊士弘，2010《Affect 情感素；情動；動情 affect》，英文文學與文化資料庫，
（http://hermes.hrc.ntu.edu.tw/lctd/List/ConceptIntro.asp?P_No=&C_ID=232），更新於7/2010，檢閱於26/4/2011。
- 谷淑美（1999）《香港文化：從本地研究探索「香港人」的身分意象和政治定位》，香港：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
- 林輝（2008）〈為什麼你動不了青年票？〉，《明報》，觀點／A30 17-9-2008。
- 羅永生（2007）《殖民無間道》，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 社會民主連線（2009）《政策綱領2008(初稿)》
（[http://lsd.smahk.com/files/lsd%20policy%202008\(Brief\).pdf](http://lsd.smahk.com/files/lsd%20policy%202008(Brief).pdf)）。檢閱於18/1/2009。
- 社會民主連線（2009）《五區總辭，全民公決，2012年雙普選政治說帖》
（www.scribd.com/doc/26703010/社民連五區總辭說帖）檢閱於10/6/2011。
- 立法會內務委員會（1998）《1998年7月24日內務委員會會議文件，議事規則委員會，《基本法》第七十四條所規定處理議員提出的法律草案的程序及《基本法》第四十八(十)條的詮釋》，立法會CB(1)45/98-99號文件，檔號：CB1/R/1/1。
- 梁漢柱（2001）〈香港的妒恨政治與移民排斥〉，《政策通訊》第十三期，香港理工大學社會政策研究中心。
- 呂大樂（1998a）〈中產階級在想些什麼？〉，載於呂大樂、黃偉邦編《階級分析與香港（九八年增訂版）》，香港：青文書屋。
- 呂大樂（1998b）〈香港新中產階級的特色與前路—與張炳良先生商榷〉，載於呂大樂、黃偉邦編《階級分析與香港（九八年增訂版）》，香港：青文書屋。
- 呂大樂（2009）〈思考「九七前」與「九七後」香港〉，謝均才篇，《我們的地方，我們的時間—香港社會新編》，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 馬嶽（2008）〈大家齊齊向左轉！〉，《明報》，觀點／A32 11-9-2008。
- 明報（2008）〈激進現象：疑慮不在議題 關鍵視乎手法〉，《明報》，港聞／A03 11-9-2008。
- 三浦展著；吳忠恩譯（2006）《下流社會：新社會階級的出現》台北市：高寶國際有限公司。
- 吳峻安（2003）“從三個傳播要素檢視網路溝通的初步形成”，《資訊社會研究》，第5期，南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台灣資訊社會研究學會。
- 彭家發（2002）〈香港傳媒「蘋果化」·台灣傳媒「香港化」說從頭—壹集團進軍台灣引起媒介震撼〉，《傳媒透視》，2002年10月號
（<http://www.rthk.org.hk/mediadigest/200210.html>），檢閱於31-5-2011。
- 斯拉沃熱·齊澤克著；季廣茂譯，2002《意識形態的崇高客體》，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

- 奕民 (2008) 〈港人投票心態的改變〉,《蘋果日報》,論壇/A13 13-09-2008。
- 楊少騏 (2003) 〈95 年,香港「蘋果」的那場腥風血雨.....〉,《新新聞》, 843: 37-39。
- 余柏全 (2008) 〈自由黨社民連何去何從〉,《大公報》,大公社評/A18 17-9-2008。
- 卡爾·馬克斯及弗里希里希·恩格斯著 (1894) 〈第五十二章 階級〉《資本論第三卷》出自《馬克思主義文庫》
(<http://www.marxists.org/chinese/Marx/capital/marxist.org-chinese-marx-capital-vol3-54.htm>), 檢閱於 4-9-2011
- 卡爾·馬克斯 (1852) 《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
(<http://www.xiachao.org.tw/ccdb/data/Classics/ME/1852/Brumaire/Brumaire.html>), 檢閱於 10/9/2011

英文參考書目

- Abts, K. & Rummens, S. (2007) 'Populism and Democracy', *Political Studies*. Vol 55, 405-424.
- Anderson, B. (1991)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New York: Verso.
- Appaduri, A. (1991) 'Global Ethnoscapes: Notes and Queries for a Transnational Anthropology'. In Fox, R. (ed.), *Recapturing Anthropology: Working in the Present*, Santa Fe, NM: Sch. Am. Res. Press.
- Arditi, B. (2004) 'Populism as a Spectre of Democracy: A Response to Canovan', *Political Studies*: vol 52, 135-143.
- Artieri, G. B., Rossi, L. & Giellieto, F. (2009) Analysing User Generated Content for social science. Generational "we sense" in the Italian blogosphere.
(http://web.mit.edu/comm-forum/mit6/papers/Giglietto_Artieri_Luca_full_paper.pdf), accessed on 3/9/2011
- Barthes, F. (1992) 'Towards Greater Naturalism in Conceptualizing Societies'. In Kuper, A. (ed.), *Conceptualizing Society*,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 Betz, H-G. (2002) 'Conditions Favoring the Success and Failure of Radical Right-Wing Populist Parties in Contemporary Democracies', in Y. Mény and Y. Surel (eds), *Democracies and the Populist Challenge*. New York: Palgrave, pp. 197-213.
- Betz, H-G. & Johnson, Carol. (2004) 'Against the Current-Stemming the Tide: the Nostalgic Ideology of the Contemporary Radical Populist Right', *Journal of Political Ideologies*, Oct 2004, 9(3), 311-327
- Blaikie, N. (1993) *Approaches to Social Enquiry*, Cambridge, Oxford: Polity.
- Bourdieu, P., (1990) *The Logic of Practice*, trans. Nice, R. ,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Brown, J.S. & Duguid, P. (2000) *The Social Life of Information*. Boston: Harvard Bus. Sch. Press.
- Canovan, M. (1999) 'Trust the People! Populism and Two Faces of Democracy', *Political Studies*, 47, 2-16.
- Canovan, M. (2002) 'Taking Politics to the People: Populism as the Ideology of Democracy', in Y. Mény and Y. Surel (eds), *Democracies and the Populist*

- Challenge*. New York: Palgrave, pp. 25–44.
- Carchedi, G. (1986) "Two Models of Class Analysis." *Capital and Class* 29:194-215.
- Carey, J. W. (1969) 'The Communications Revolution and the Professional Communicator', *Sociological Review Monograph*, vol. 13.
- Cloudry, N. (2000) *Inside Culture*, Sage: London.
- Correll, S. (1995) 'The Ethnography of an Electronic Bar: The Lesbian Cafe'. *Journal of Comtempory Ethnography*. Vol.24 (3), SAGE.
- Dahlberg, L. (2007) 'The internet and Discursive Exclusion: from Deliberative to Agonistic Public Sphere Theory', in Dahlberg, L. and Siapera, E. (eds), *Radical Democracy and the Internet*,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 Dahlgren, P. (1995) *Television and the Public Sphere*, London: Sage.
- Dawson, M. (1990) "Revamping the Sociology of Class."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s*, 33:419-422.
- Derrida, J. (1994) *Specters of Marx*, London: Routledge.
- Enzensberger, H. M. (1970) Baukasten Zu einer Theorie der Medien. *Kursbuch*, 40, 327-344.
- Felski, R. (1989) *Beyond Feminist Aesthetic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Ferree, M. M., Gamson, W. A., Gerhards, J., and Rucht, D. (2002) 'Four Models of the Public Sphere in Modern Democracies', *Theory and Society*, Vol. 31, No. 3, June, 289-324.
- Fisher, B.A. (1978) *Perspectives on Human Communication*. New York: MacMillan.
- Fiske, J. (1989) *Understanding Popular Culture*, London: Unwin Hyman.
- Freud, S. (1921, 2001) Group Psychology and the Analysis of the Ego, in The Standard Edition of Psychological Work of Sigmund Freud, Volume XVIII, London: Vintage.
- Foucault, M. (1972) *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and the discourse on language*, Smith, S. (trans),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 Fraser, N. (1992) 'Rethinking the public sphere: a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actually existing democracy', in C. Calhoun (ed.) *Habermas and the Public Sphere*, Cambridge, MA: MIT Press, pp. 109-42.
- Freeden, M. (1998) 'Is Nationalism a Distinct Ideology?', *Political Studies*, 46 (4), 748–65.
- Gadamer, H-G. (1989) *Truth and Method*, rev. 2nd edition. New York: Crossroad.
- Garfinkel, S. (2000) *Database Nation: the Death of Privacy in the 21st Century*. Beijing; Cambridge: O'Reilly.
- Giddens, A. (1994) *Beyond Left and Right*, Cambridge: Polity.
- Grosz, E. (1990) Jacques Lacan: A Feminist introduction,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 Habermas, J. (1989) *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An Inquiry into a Category of Bourgeois Society*, translated by. Thomas Burger with Frederick Lawrence Cambridge MA: The M. I. T. Press.
- Hakken, D. (1999) *Cyborgs@cyberspace?: an Ethnographer Look to the Future*.
- Hall, S. (1996) 'Introduction: Who Needs "Identity"?', in du Guy, P. & Hall, S. (eds) *Questions of Cultural Identity*. London: Sage.
- Hall, S. (ed.) (1997) *Representation: cultural representations and signifying practices*. London: Sage in association with The Open University.
- Hall, S., Critcher, C, Jefferson, T., Clarke, J. & Roberts, B. (1978) *Policing the crisis: mugging, the state, and law and order*, London: Macmillan.
- Hands, J. (2007) 'Between Agonistic and Deliberative Politics: Towards a Radical E-Democracy', in Dahlberg, L. and Siapera, E. (eds), *Radical Democracy and the*

- Internet*,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 Hamm, M. & Zaiser, M. (2000) com.une.farce und indymedia.uk – zwei Modi oppositioneller Netznutzung. *Das Argument* 238, 5/6.
- Hands, J. (2007) 'Between Agonistic and Deliberative Politics: Towards a Radical E-Democracy', in Dahlberg, L. and Siapera, E. (eds), *Radical Democracy and the Internet*,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 Harding, T. (1998) 'Video Activism and the Protest Movement' in McKay, G. (ed), *DIY Culture, Party and Protest in Nineties Britain*, London: Verso.
- Hine, C. (2000). *Virtual Ethnography*. Sage Publications Ltd. London.
- Huntingtons, S. (1991) *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Norma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 Jenkins, H. (2006) *Convergence culture: where old and new media collide*,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 Jenkins, H. & Thorburn, D. eds. (2003) *Democracy and New Media*.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Johnson, R., Chambers, D., Raghuram & Tincknell, E. (2004) *The Practice of Cultural Studies*, London: SAGE.
- Kazin, M. (1995) *The Populist Persuasion: An American History*. New York: Basic Books.
- Kertzer, D. (1988) *Ritual, Politics and Power*, Cambridge: Yale University Press.
- Krotz, F. (1998) 'Gegenöffentlichkeit', in O. Jarren, U. Sarcinelli & U. Saxer (eds), *Politische Kommunikation in der Demokratischen Gesellschaft. Ein Handbuch mit Lexikonteil*, Opladen/Wiesbaden: Westdeutscher Verlag.
- Ku, A. S. M. (1999) *Narratives, politics and the public sphere : struggles over political reform in the final transitional years in Hong Kong (1992-1994)* , Aldershot: Ashgate.
- Laclau, E. (1996) 'Why do Empty Signifiers Matter to Politics?', *Emancipation(s)*, London: Verso.
- Laclau, E. (2005a) *On Populist Reason*. London: Verso.
- Laclau, E. (2005b) 'Populism: What's in a Name', in F. Panizza. (eds) *Populism and the Mirror of Democracy*. London: Verso.
- Laclau, E. & Mouffe, C. (2001)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 2nd edition*, London, New York: Verso.
- Larmer, M. and Fraser, A. (2007) 'Of Cabbages and King Cobra: Populist Politics and Zambia's 2006 Election', *African Affairs*. Oct 2007, Vol. 106, (425), 611-637. Oxford.
- Lau, S. K. (1984) *Society and politics in Hong Kong*,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 Lau, S. K. & Kuan, H. C. (2002) 'Hong Kong's Stunted Political Party System', *The China Quarterly* 172: 1010-1028.
- Lee, F. L. F. (2007) "Hong Kong Citizens' Beliefs in Media Neutrality and Perceptions of Press Freedom: Objectivity as Self-Censorship?", *Asian Survey*, Vol. 47, Issue 3, pp. 434-454.
- Young, I. M. (1996) 'Communication and the Other', *Democracy and Difference: Contesting the Boundaries of the Political*,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Lee, P. S. N. & Chu, L.L. (1998) 'Inherent dependence on power: The Hong Kong press in political transition', *Media, Culture and Society*. Vol. 20, 1, p.59-78.
- Lefort, C. (1986) *The Political Forms of Modern Society. Bureaucracy, Democracy, Totalitarianism*. Cambridge: Polity.
- Lefort, C. (1988) *Democracy and Political Theory*. Cambridge: Polity.

- Luke, S. (1985) *Emile Durkheim, his Life and Work : a Historical and Critical Stud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Ma, N. (2007)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Hong Kong : State, Political Society, and Civil Society*,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 Mater, MA (2001) A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for a Global Public Sphere? The Use of New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by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and United Nations: In Asen, R. and Brouwer, DC. (eds) *Counterpublics and the State*.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Albany. 211-234.
- Mazzoleni, G. (2003) 'The Media and the Growth of Populism in Contemporary Democracy', in Mazzoleni, G, Steward, J. & Horsfield, B. (eds), *The Media and Neo-populism: a Contemporary Comparative Analysis*. Westport, CT: Praeger.
- Miller, D & Slater, D. (2000) *The Internet: an ethnographic approach*, Oxford; New York: Berg.
- Mouffe, C. (2000) *The Democratic Paradox*, London: Verso Books.
- Mouffe, C. (2005) *On the Political (Thinking in Action)*, New York: Routledge.
- Oakeshott, M. (1996) *The Politics of Faith and the Politics of Scepticism*.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 Örnebring, H. and Jönsson, A. M. (2008) 'Tabloid Journalism and the Public Sphere: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on Tabloid Journalism', in Biressi, A. and Nunn, H. (eds) *The Tabloid Culture Reader*, Maidenhead: McGraw-Hill/Open University Press.
- Palczewski, C. H (2001) 'Cyber-movements, New Social Movements, and Counterpublics' in Asen, R. and Brouwer, D. (eds) *Counterpublics and the State*.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 Panizza, F., Miorelli, R. (2009) 'Populism and Democracy in Latin America', *Ethics & International Affairs*; Spring 2009; 23, 1 pp.39-46.
- Pepper, S. (2008) *Keeping Democracy at Bay: Hong Kong and the Challenge of Chinese Political Reform*,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ing, INC.
- Pye, L. (1985). *Asian Power and Politics: the Cultural Dimensions of Authority*. Cambridge, Mass. : Belknap Press.
- Rheingold, H. (1993) *The Virtual Community: Homesteading on the Electronic Frontier*. Reading, MA: Addison-Wesley.
- Riley, P., Klumpp, J. & Hollihan, T. (1995) 'Democratizing the lifeworld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Evaluating new democratic sites for argument. In *Argument and values*, edited by Jackson, S. Ananadle, VA: 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 Ross, M. (1997) 'Culture and Identity in Comparative Political Analysis' in Lichbach, M. and Zuckerman, A. (eds) *Comparative politics: rationality, culture, and structure*. Cambridge, U.K; New York, US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Ryan, M. P. (1992) 'Gender and Public Access: Women's Politics in Nineteenth Century America,' in Calhoun (ed.), *Habermas and the Public Sphere*, Cambridge MA: The M. I. T. Press.
- Schedler, A. (1996) 'Anti-political Establishment Parties', *Party Politics*, 2 (3), 291–312.
- Schmitt, C. (1928) *Verfassungslehre*. Berlin: Duncker & Humblot.
- Schmitt, C. (1976) *The Concept of the Political*, New Brunswick,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 Schmitt, C. (1988 [1923]) *The Crisis of Parliamentary Democracy*. Cambridge MA: IT Press.
- Schmitt, C. (1996 [1932]) *The Concept of the Political*. Chicago IL: The University

- of Chicago Press.
- Schrøder, K & Phillips, L. (2007) 'Complexifying Media Power: A Study of the Interplay between Media and Audience Discourse on Politics', *Media, Culture and Society*. 2007; 29; (860), SAGE.
- Seligson, M. (2007) 'The Rise of Populism and the Left in Latin America'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ume 18, No. 3, pp.81–95.
- Siapera, E. (2004) Asylum Politics, the Internet and the Public Sphere: The Case of UK Refugee Support Group Online. *Javnost-The Public* 11, 1.
- Sing, M (2004) Hong Kong's tortuous democratization : a comparative analysis, New York, London: RoutledgeCurzon.
- So, A. Y. and Hikam, M. (1989) "Class in the Writings of Wallerstein and Thompson: Toward a Class Struggle Analysis."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s*, 32:453-468.
- So, A. Y. (1991) "Class Struggle Analysis: A Critique of Class Structure Analysis",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s*, 34, No. 1, pp. 39-59.
- Snow, D., Rochford, E., Worden, S. and Benford, R. (1986) 'Frame Alignment Processes, Micromobilisation and Movement Participa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1 (4), 464–81.
- Sparks, C. (1992) 'Popular Journalism: Theories and Practices' *Journalism and Popular Culture*, London: SAGE.
- Taggart, P. (2000) *Populism*. Buckingham: Open University Press.
- Tarchi, M. (2002) 'Populism Italian Style', in Y. Mény and Y. Surel (eds), *Democracies and the Populist Challenge*. New York: Palgrave, pp. 120–38.
- Valentine, J. (2006) 'Cultural Studies and Post-Marxism', in Hall, G. and Birchall, C. *New Cultural Studies: Adventures in Theory*. Athens: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 Warner, M. (2002) *Publics and Counterpublics*, Cambridge: Zone Books.
- Wimmer, J. (2005) 'Counter-public Sphere and the Revival of the European Public Sphere', *The Public*, 12 (2), 93-110
- Williams, R. (1985) *Keywords: A Vocabulary of Culture and Societ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Wilson, S & Peterson, L. (2002) 'The Anthropology of Online Communities',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2002, Vol. 31, Annual Reviews.
- Wong, T. W. P. (1992) "Personal Experience and Social Ideology: Thematization and theorization in Social Indicator Studies," S. K. Lau *et al.* (eds), *Indicators of Social Development: Hong Kong 1990*. Hong Kong: Hong Kong Institute of Asia-Pacific 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Wong, T. W. P & Lui, T. L. (1993) *Morality, Class and the Hong Kong Way of Life*, Hong Kong : Hong Kong Institute of Asia-Pacific Studies,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Wright, E. O. (1976) "Class Boundary in Advanced Capitalist Societies." *New Left Review* 98:3-41.
- Young, I. M. (1996) 'Communication and the Other: Beyond Deliberative Democracy' in Benhabid, S. (ed.), *Democracy and Difference of the Political. Contesting the Boundaries of the Political*, 67-94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Zizek, S. (1989) *The Sublime Object of Ideology*, London, New York: Verso.
- Zizek, S. (2006) 'Against the Populist Temptation' *Critical Inquiry*, Spring, 551-574.
- Zúquete, J.P. (2008) "The European extreme-right and Islam: New directions?" *Journal of Political Ideologies* 13 (3): 321-44.